

巴山夜雨

抢救记忆 追寻真相 交流信息 积累资料

第 11 期 2011 年 11 月 10 日

目 录

【按“Ctrl”键+鼠标点击篇名选择】

祖父李肇甫（杜欣欣）	2
修当代史也要有《酷吏列传》（甘犁）	11
来自中国古拉格群岛的报告（严家伟）	17
两次走出鬼门关（王开泰）	24
阎简弼老师受难 42 周年祭（倪艮山）	31
右派·老干部·艺术家——缅怀父亲宋清涛（宋晓涛）	34
忆清涛爸二三事（宋濒）	45
“三忠于四无限”运动忆趣（陶渭熊）	47

《巴山夜雨》电子邮箱: bsyy1957@yahoo.cn

祖父李肇甫

杜欣欣

—

我原姓李，祖籍陇西。李氏家族曾几次迁徙，先至广东嘉应，后因“湖广填四川”再移民至四川巴县。

大约 1938 年，由我祖父李肇甫（字伯申）带领，李氏全家前往巴县冷水场祭祖。当时那里除了因曾祖李凤九中举所立的石坊，还有一间李氏祠堂。存于祠堂的族谱共计六代人，名号为四字一排。曾祖父至我这一代为“克肇显达”，素描家李克瑜女士为“克”字辈，比我祖父还高一辈。我父亲生于甲子年，因此名为“显甲”。对于这个名字，他自嘲道：“那是想让我显甲第，耀门庭。但我既未能显甲第，也未有耀门庭，还被打成右派发配东北 23 年。”

（右图：李肇甫生前留影）

曾祖李凤九的家境大约是中农或上中农，念私塾中举，到山东济宁府做官，后调至北京通州，曾任直隶省通县知事（注一）。据说李凤九还做过京兆尹（相当于北京地区的太守），因此我已故的大伯李显京的小名为“小兆子”。

我家的旧宅位于西四北大街太安侯胡同三号（今西四北七条五号）。这胡同本是纪念明朝的宁安侯，但为避某皇帝之讳而改名。

据我父亲说，旧宅的前门向南开在太安侯胡同的东口，后门已是北邻武安侯胡同。其门槛很高，黄包车出入需将当作门槛的方木抬起。当时大门口挂了“蜀东李寓”的铜牌，还坐着一对石狮子。文革中狮头被砸，80 年代中期狮身也消失了。

旧宅分为东西两院。东院建有南北两栋小楼，分别居住着曾祖父母。两楼之间架有长廊，廊上镶着暗花玻璃。院内还有花园，假山和鱼池。那个鱼池很深，邻家小孩曾不小心跌进去，后来那孩子的祖母还到池旁烧香祷告。南楼屋檐上的雕塑主要是鹤和鸟。在北京建设高楼之前，我乘无轨电车经过那里，还能望见那些砖泥雕塑。

我祖父母与他们的孩子都住在西院。那里又分成前后两院，前面有回廊环绕的青砖大院，花坛和客厅。后院北房前立着很粗的柱子，柱子上挂着泥塑描金的对联。虽然我父亲不记得写的什么，但他知道那都是曾祖父过整生日时收的寿礼，送礼的人一般是都督，其中有李烈钧和黄郛等。后院的客厅墙上挂着孙中山以及民国议会开会的照片。我父亲说当时只有最尊贵或亲近的客人才会请到这里来。

我大伯李显京年轻时思想左倾，曾参与学生运动，并经常演戏。当时的导演是戏剧家余上沅，大伯与后来知名的演员白杨、蓝马一起演过戏。父亲小时候也参加演出，角色是车夫家的小儿子，白杨曾饰演那个角色的姐姐。

大概在 1933 或 1934 年的中秋，李显京因从事学生运动被捕。他被捕时，有一位陈姓女同志来家，告知其床下有两网篮共产党的宣传物。我祖母赶快找佣人将它们转移出去，然后又亲自把大伯保出来。保出来的当晚，祖母给大伯化妆，将他打扮成一个老人，然后与他手挽手走出家门，乘火车去天津。当时祖父已在上海，他在报纸上看到大伯被捕的消息，就决定让大伯和大姑去上海。祖父说：“我不



反对你们革命，也不反对共产党，但你们要先念书。”

父亲每次来北京都会去看西四的旧宅。2004年，我们再次探访旧居，院门槛还是很高，但院内已是面目全非。门房和长走廊都被辟为住房，小厨房覆盖了整个院子并把走道切割得弯弯曲曲。虽然老住户还清楚地记得带暗花玻璃的走廊、合欢、紫藤树、月亮门、鱼池假山，却都已无踪迹。我们获准进入东院北楼一层，室内还能看到天花板上的雕花，但也因隔间而被分割。最初住户以为我们是来索要老房子，当我们告知房子早在1935年卖掉，他们齐声说：“卖了好，否则也会被拆迁，已经拆到前面的胡同了。”

虽然那处房子早已非李氏所有，但看到损败至此，仍心有戚戚。离开时，我数了数院门口的电表，一共有16个名字，估计院内至少住着三五十人。

二

为什么李家要卖掉祖产？主要原因是祖父李肇甫不愿为官，为了维持家计而迁至上海做执业律师。

李肇甫生于1887年。据载其父“风九督教严，肇甫奉命维谨，自幼以孝闻。初入私塾，渐长喜读经史，不屑规规于科举业。时西学东渐，国内译述日多，肇甫搜求研习，尤浸淫于法学书籍，以为改革政治始基，非倡明无以建新邦也。”（同注一）1905年，李肇甫考取官费生进入日本东京的明治大学法科。同年8月20日，同盟会成立，到会百余人。据黄复生回忆：“孙先生归自欧美，组织同盟会于东京，开大会于赤坂区灵南坂。吾川人与会者熊君锦帆克武，黄君文琴宠章，李君伯申肇甫（时名于通）。”

孙中山于7月30日在赤坂区桧町三番地内田良平宅举行会议，黄兴起草同盟会章程，并当场发展会员。由此推算李肇甫可能于那时就加入同盟会了，同盟会成立时是作为会员参与，而廖仲恺和胡汉民则于同年9月1日加入。

我祖母江伯鸾（字为佩）是安徽徽州人氏，她的父亲与我曾祖父同在山东作官，其官阶高于曾祖，据说是看上李肇甫的人才而将女儿许配。我祖母并未去日本，祖父回国成亲时，直到入洞房，祖母才看出祖父戴着一条假辫子，由此猜出他是革命党。祖母形容祖父是一个非常白净的光头书生。据说祖父回去成亲时还对曾祖父说：“我把头发还给你。”他的意思是“我把身子还给父母，我去革命了”。很多年之后，他对我父亲说：“我们当时也是革命的，头别在腰带上去干，革命总要死人的。比如去山东济宁府，给黄花岗运军火等。共产党来，对我如何，我也不知道。既然我那时候要革命不怕死，现在也没什么可怕的。”

祖父加入同盟会之后曾担任执行部书记，后来又担任了四川同盟会支部的负责人。据同盟会资料，李肇甫曾任职于同盟本部的书记科。自1907年1月中旬至辛亥革命爆发后，同盟会本部重要职员有外务科的廖仲恺，评议议长汪精卫，议员包括秋瑾等27人。其中与我祖父相熟的有廖仲恺，曾任过本部议员的熊克武、但懋辛和康宝忠。但家与我家是世交，我家与他留在大陆的两个女儿但功涵和但功涛一直有联系，而康宝忠就是康心孚，他二弟康心之的长子康国干娶我大姑妈李显华为妻。

田桐、胡汉民、但焘曾与李肇甫为书记科同事，他们都年长于我祖父，而后来的道路也各不相同。湖北人但焘长于我祖父7年，参加革命时以及其后的经历与我祖父类似。革命后他出任过唐绍仪的国务院秘书，1914年袁世凯推行帝制，他当即辞去一切职务，蛰居上海。其后他也曾参政，但多担任秘书监察等职，后来潜心文史得以善终。同为湖北人的田桐因反对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与之决裂，因此并未担任过官职，主要是办报和著述，而胡汉民辛亥之后官职最高，在上述几位都退出政界之后，还活跃至1936年去世。

至于为何加入同盟会，李肇甫并未留下只言片语，但同时代的康心如（1890-1969）曾在回忆中提到：“1902年，心孚兄（1884-1917）到西安应乡试回来，谈起戊戌变法维新的经过，谈得眉飞色舞，对康梁无限的敬仰佩服。我弟兄三人取别号，孚兄号素徒，康长素之徒也。我号希任，希从梁任

公也。之弟号望复，仰望谭复生也。”（注二）康家当时居于四川彭山，上海出版的报纸要一个多月后才能读到。地处偏僻的年轻人受变法影响是如此之大，更不必说生活在北京的祖父了。

1907年，李肇甫与四川籍同盟会员雷铁崖、邓絮、董修武等在日本东京创办了革命刊物《鹃声》杂志，后被日本当局查封。在日期间，他购买运送军火支持黄花岗起义。李肇甫于1910年从日本回国。据我父亲说，武昌首义之后，祖父曾与另一位革命党人同去济宁直隶州府。他以手枪威逼济宁州府向革命党投降，还逼着知县知州挂白旗。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李肇甫为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处总务组长，另一说法是他曾任总统府秘书（同注一）。据吴玉章回忆：“1911年12月2日，江浙方面的革命军队攻克了南京，于是各省代表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在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备过程中，各派势力之间又因为争夺权势，闹得不可开交。直到孙中山先生于12月末回到上海，才打开了僵局。接着，孙中山先生被推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12年元旦正式宣告成立。但是，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临时政府只设立五个部，粥少僧多，怎能容纳这么多要作官的人呢？这时，有一个叫李肇甫的同盟会员，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他出身于官僚家庭，懂得旧式官府的那一套组织，于是由他提出一个扩大政府组织的办法来，把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安置下来了，因此大家都很满意。这个临时政府，既有立宪党人，也有官僚军阀，但革命党人还是占着主要的地位。”（注三）后来吴玉章接替李肇甫辞去的总务组长一职。据我堂哥回忆，李肇甫与吴玉章关系相当密切。吴到李家来，可以直入我祖母的卧室，并揭开帐帘，高呼“李江伯鸾”。据我查到的资料，不管政治态度，当时的各党派都赞赏我祖父为政清廉为人高洁。当然也有例外，某个与我祖父关系密切的人后来发达了，在回忆录中提及我祖父就颇为不敬了，一阔脸就变，看来是常态。后来我听堂哥说，那人曾在日本嫖妓，并因此找我祖父要过钱。

另有野史说，同盟会密谋刺杀宗社党头目、清禁卫军第一协统军咨使良弼时，原打算派我祖父去，但会上有人说李肇甫还没有后代。这时彭家珍站出来说：“我妻子已经怀孕了。”1912年1月26日，彭向良弼投掷炸弹，当场牺牲，良弼被炸成重伤后。临死前曾哀叹：“杀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我死，清廷也随之亡也。”

1912年1月28日，国民政府参议院成立，李肇甫由“蜀军政府选任为参议员。照参议院规定：设全院委员，以全院参议员充之，置全院委员长一人，其职位仅次于议长副议长，选肇甫任之。……同年四月，随参议院北迁。”（同注一）在1912年的政治舞台上，李肇甫是“春秋鼎盛，已誉重一时。”（同注一）他参与了国民党改组。“国民党之改组也，实系遁初（宋教仁）一人主持，而胡瑛、张耀曾、李肇甫、魏辰组及某某君等为之奔走密谋，皆与有大力。”（注四）

1912年2月，为继续制订约法，参院召开了第二次临时约法起草会议。据《参议院议事录》记录，参议院决定将临时约法案先交审议会审议，李肇甫为审议会主席。审议结果，决定将原案内的总统制，增改为责任内阁制。（注九）临时约法的讨论涉及国民政府定都何处，因袁世凯不肯南来，谷钟秀和李肇甫提出定都北京，并在表决时获得多数票赞成，而孙中山和黄兴反对此举。据说孙中山和黄兴得知此事极为生气，当晚就把李肇甫叫去大骂一顿（同注三）。反对定都南京的还有章太炎、宋教仁等，黄兴甚至要带兵去抓同盟会的议员。此事标志着同盟会内部的分裂。

1912年8月16日张振武被杀害。这位武昌首义元勋未因创建共和而战死疆场，却死于革命成功后的政治阴谋。张案遂成为民国史上的奇案。张振武案发后的第三天，参议院开会，讨论相当热烈。议员大多认为副总统以非罪要求杀人，大总统以命令擅改法律，均是违背约法。参院认为此案关系国本，要求维护法律尊严。于是参议员联名质询政府，要求大总统袁世凯与副总统黎元洪予以答复，有些参议员甚至提出弹劾副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陆征祥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在参议院的压力下，袁世凯为了保全自己，要黎元洪承担责任。黎不得不从湖北发来长电，命陆军总长段祺瑞到参议院答复。

8月23日上午段祺瑞登台答辩，声言按黎副总统来电，选择可以宣布的内容，只答复质询案所提

的七方面问题。实际上他是以张振武为军人为由，不能捕送审判厅，犯罪的事实均在其任军务部时所为，无一事不关系军务，所以军法从事。他欲以军法为借口，绕过国法，其答复显然不能让参议员们满意，导致参议员追问迭至。

参议员李肇甫追问：“本席只就简单事实质问。请问杀张振武之先，曾开军法会议否？”

段祺瑞：“方才曾经报告，集合高等军官讨论数次。”

李肇甫：“是否开军法会议？”

段祺瑞：“军法会议亦系由高等军官研究罪状。”

李肇甫：“请问开会议之时，究系何日？”

段祺瑞：“本月 13 日曾经开会讨论，14 日亦开会讨论。且总统亦曾经在座。”

李肇甫：“请问开军法会议，大总统应否在座？”

段祺瑞：“系在大总统府开议，府中房屋皆系毗连，故大总统亦在座。”

李肇甫：“杀张振武之证据，除此湖北两电报之外，尚有何项证据否？”

段祺瑞：“所谓证据，不过即系他所犯之罪状，除此电报之外尚有公文。”

最后段祺瑞说：“总之，现在政府以国家为前提，自不能不以临时之办法。不然，于国家大有危险。至此危险之时，将若何维持耶？手续虽有错误，祺瑞身当其咎，亦未为不可。”

从以上一问一答中可以看出，李肇甫总想将张振武案纳入法律视野来探究，包括军法会议与高等军官会议的区别，大总统作为行政长官是否有权参与审判，杀张振武的确切法律证据等，都是直关法律问题。最后问得段祺瑞露出了破绽，承认“手续错误”。只得一再声明不依法杀张是以国家为前提，不得不如此。段还表明态度，情愿自己认错，参议院如果能原谅政府就无须再三质问，不能原谅即行弹劾。（注五）

这是一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而孙文在张振武一案中进退失据。“张案发生在 8 月 16 日，孙文按原计划于 18 日北上会见袁世凯。当时很多人劝他取消行程，他不但不接受，还说：“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眼光。”到了北京后，袁氏稍加解释，他便轻信了，而且力促颇有疑虑的黄兴立即赴京。“……这些材料表明，孙文当时根本未意识到这是支持还是破坏民主、法治制度的严肃斗争。这是制度问题，只有把各方人士的政治活动都纳入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让制度管着这些人的手脚，民主共和制度才有可能巩固，而孙文却把它看作某个人‘可疑’或‘可信’的问题。因为认识停留在如此低下的水平上，他根本没有发表过谴责此案的任何声明，在这么重大的斗争中丧失了民主主义政治家应有的斗志。……没有在张振武案中受到应有教训的袁世凯及其追随着，半年后悍然刺杀宋教仁；孙文又一次处置不当，民主共和制终于被推到名存实亡的境地。”（注六）

1913 年，李肇甫回到四川后当选为省第三区众议院议员。他“先后在临时参议院及众议院中，凡有主张，均卓然自见，倾动朝野。又以隶籍国民党，遂为袁世凯所深忌讳。”（同注一）同年，爆发二次革命，他与熊克武一起讨伐袁世凯称帝。讨袁时，熊克武的蜀军已改为革命第五师，李肇甫任师党代表，当时刘伯承是其中的一个团长，因此他与刘伯承也早就相识。二次革命失败后，熊克武则被迫解散军队，逃往日本，“（袁）世凯拘捕国民党籍议员，肇甫亦与其列；时凤九正官通县，与世凯有旧，往避得免。”（同注一）

辛亥革命后，四川成立了蜀军政府，夏之时是副督军。我祖父与夏之时相熟，1934 年董竹君在上海与夏之时离婚，由我祖父担任她的离婚律师。这件事在董竹君的《我的一个世纪》有较详细的记述。那本书后来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其中有祖父的镜头，我一看真是面目全非。父亲年幼时也与夏之时的家人相当熟悉，称他们的大女儿夏国璋为八姐。当时流行《秋水伊人》，夏之时的侄女夏国彬等特别喜欢听我父亲唱这首歌。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议会中分主战主和两派。马君武议员主和，而祖父是主战派。

他们开始辩论，马君武辩不过我祖父，他就一边辩论，一边拿手杖打祖父。祖父边退边辩，马还追着打，后来议院的警察过来干涉。祖父说：“这是我们议员之间的辩论，你们不能干涉。”据说那时候，为了防止议员在辩论时动武，议院的墨盒砚台都钉在桌上。祖父回家后，祖母打水给他洗脚，看到他的腿都是青紫色，一问才知是被马君武打的。

据我父亲回忆，祖父回家后很少讲话。他的自制力很强，年轻时抽烟喝酒，但30多岁时，突然全都戒了。我祖母喜欢打麻将，她曾和张勋打过牌。祖母还谈起过当时官员交际常去打茶围，其中有妓女出场。当妓女靠近时，祖父就用报纸挡脸道：“我吃醉了。”我父亲是家中幼子，祖父有时抱他坐在摇椅上，边摇边唱日本歌。家中原有记账的折子，可以拉得很长，他还用折子舞龙给父亲看。父亲长大后，有时写些歪诗，半文半白，而且还是情诗，祖父也会读。祖父的生活简单整洁，非常讲个人卫生。每天清晨，他都在地上铺一张报纸，拿着梳子，头朝地，开始梳头，把所有的头皮屑都梳下来。梳好了，拿去倒入纸篓。收拾干净后，他才吃早饭。早饭一般是牛奶蛋花汤，吃过饭后就坐下来读报，多年如此。祖父还有个外号叫“抠门大爷”，他虽穿得很整洁，但一顶呢帽子戴几十年。后来在上海坐黄包车，呢帽被抢走，他才买了新帽子。有一次孩子们跟祖父外出，碰到站街妓女，祖父用四川话说：“你不就是要钱嘛？”掏出五块钱就匆匆忙忙离去，孩子们都在背后笑。

1915年4月，张培爵密谋讨伐袁世凯，并严厉拒绝袁世凯的利诱，被杀于天津。当局不许人收尸。张培爵是老同盟会员，曾与祖父同组“乙辛学社”，后来他与及学社成员发动了辛亥革命中的重庆起义。祖父和张的私人交往已不可查，但据父辈回忆，当时祖父在北京，听说此事后即向曾祖借了五百大洋去为张培爵收尸。袁世凯因此而悬赏一千大洋抓捕李肇甫，但他逃脱了。这是二次革命之后，李肇甫再次逃脱袁的抓捕。

讨袁之后，据史料载，祖父曾担任了国民党交际干事，具体信息如下：“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孙中山同意恢复‘国民党’的这个党名，以后改组始终沿用这个名称，就是因为其影响深远。当时选出的干部更是一时之选，总务部主任干事魏辰组、殷汝骊，干事任鸿隼。交际部主任干事李肇甫，干事覃振、顾维钧。政事部主任干事谷钟秀、汤漪。选举科主任干事杨永泰，干事张东荪、沈钧儒、徐傅霖、罗文干、张耀曾、伍光建、仇鳌等。文事部主任干事杨光湛。政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干事张耀曾、刘彦，干事冯自由、石志泉、吴铁城、张东荪。这些人学有专长，熟悉欧美和日本的政治、学术，不仅当时是佼佼者，而且在后来几十年复杂多变的中国政局中也都发挥了重要影响。”（同注四）

自1912年任临时参议员和1913年当选众议院议员之后，李肇甫于1916年和1922年恢复国会时仍任议员。“五年（指1916年）国会复会，肇甫声采哗哗得如故。”（同注一）1920年，李肇甫任参议会作议长。1922年“曹锟贿国会选举案发生，肇甫联合同志，反对无效，愤走上海……遂留执律师。”（同注一）据我所知，祖父退出政坛之后，因曾祖父还在世，李家仍居北京。除了居家的排场，还要不时接济姑祖母李小鸾一家。祖父虽为律师，其事务所也颇为有名，但他因普通话和上海话不够好而影响了个人业务。1922—1935年，李家主要靠变卖房产维持家计，1925年曾祖父去世之后，祖父又将住家的一部分出租。

自1905年投身革命至1922年，李肇甫已从一个热血青年变为四个孩子的父亲。作为一个革命党人，他曾是反对清朝的密谋者，革命中和革命后的行政法律官员。他还参与了组织公开的政党，而那个政党后来在全国选举中获胜。杜元载主编的《革命人物志》第十集中曾这样评价李肇甫：“自民国十六年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军政当局多肇甫旧友，乘时宦达，易如反掌。顾每约出任公职，辄以体弱不胜繁剧辞。”为何他拒不为官？斯人早已逝去，其心态无人可知，我猜也许他看到了政治的黑暗和民主的倒退。

我都知道祖父1922年之后的主要社会活动是参加孙中山移灵。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曾停灵北京西山，于1929年移灵南京。移灵时，李肇甫为持绋人之一。我父亲对此还有印象。他说祖父戴着大礼帽，穿燕尾服，孙的棺材是用青天白日满地红包着，有两条很长的黑缎子。据说当时有六十四个

人簇拥棺材，包括抬棺和持绋者。持绋人中还有吴玉章，谢无量，赵铁桥等，这三人与李肇甫关系都比较接近。我父亲还记得家中悬挂张善子的画和谢无量的打油诗。

据我祖母回忆，孙中山去世之后，汪精卫和蒋介石曾请祖父去北海公园仿膳吃饭，要祖父出来做官，但他以“丁夫忧”（丧父）婉拒。虽然退出政坛，李肇甫依然被当作“有功劳于国家资格的”。1925年，段祺瑞摄政，决定召开善后会议。段就此事于元月一日分别致电孙中山，黎元洪，同日又电上海分致唐绍仪、章炳麟、岑春煊，另电李肇甫（伯申）。这件事说明当时祖父虽在上海执业，仍家居北京。父亲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三岁时在北京得肺炎，当时何香凝正好来串门，看到父亲高烧，当即抱他去德国人开的医院，父亲还记得医生的名字叫科里。从那以后，何香凝就成为我父亲的干娘。在上海时，李肇甫与何香凝、宋庆龄、黄炎培等关系比较密切。1932年，他与黄炎培、张耀曾等人组织了新中国建设学会，出版《复兴》月刊。

1935年，曾祖母去世，祖父遂将北京房产全部出卖，举家迁往上海。这段时间，李肇甫除了做律师，他还去香港与赵铁桥一起搞实业。赵铁桥时任香港招商局长，正当祖父和他准备买一条船时，蒋介石暗杀了赵铁桥。

三

李肇甫与张耀曾、沈钧儒合办的律师事务所在上海英租界的白克路大通里。据父亲回忆，虽然祖父是律师，但他又不像一般律师，他不接昧良心的官司。有一次，一个流氓要打个官司，许愿说事成之后，给你一栋花园洋房，但祖父没接。当时李家在上海是租房子，祖母对祖父拒绝那个案子颇有怨言。再比如离婚官司，我祖父总先劝和。1936年底的一天，我祖父回家，全家当时已经坐定等候他吃晚饭。他走进来，边放公文包，边对祖母说：“今天有案子了。”我祖母问：“跟哪个打呀？”他答：“跟蒋委员长。”那个官司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七君子案。

七君子被捕后押至苏州。据张耀曾日记回忆，1937年4月5日，张耀曾“午前至事务所，候伯申不至。午后始得通电，请其代余赴苏访衡山，谈辩护事。伯申快诺。朋友患难相扶，可感也。写一信，托致衡山。”“衡山”即沈钧儒。当日李肇甫等几人就前往苏州探视。沈钧儒在4月9日至沈谦的信中说：“五日伯申偕张、俞、唐三位律师同来，并携有镕西先生函，附有意见，均甚切要。当日有几种决定……我的辩护律师除镕西、伯申外，已商定委任刘崇佑、秦联奎二律师，皆本来极熟之友”。当时沈钧儒有四位辩护律师，虽然张耀曾排名最前，但在实际辩护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却是李肇甫、秦联奎（注七）。

张元济也在日记中提到七七事变前后，他与李肇甫、沈钧儒、李公朴等人常有聚餐，并讨论国事，比如1937年9月3日的聚会为“李肇甫做东，共十三人。”

“八一三”之后，日本占领了上海的中国地界，祖父于1937年底离开上海回到四川。1938年夏，祖母带着孩子们辗转香港也去了大后方。1939年，李肇甫被选为四川省临时议会议长，1940年改任四川省政府秘书长。他的改任还有一段故事。抗战时，国民政府退守四川。最初四川的地方势力很大，中央势微，因此蒋介石亲任四川省主席。后来蒋的势力逐渐增大，遂辞去省主席。但中央政府对四川的地方势力依然不放心，蒋介石就委派当时的行政院长张群兼任省主席。因四川军阀多，张群说：“如果我要做省主席，一定要李伯申当秘书长，否则摆不平。”

蒋介石给李肇甫打了三封电报，最后一封很不客气。电报中说你是党国元老，同盟会员，有什么意见你可以提，现在是全民共同抗战，你不出来不合适。于是李肇甫答应出山，但却有言在先：“只要抗战结束，我就辞职。”

当时“四川省既为抗战根据地，所负兵额粮食重于各省，”李肇甫除大力协调当时的中央政府与省政府之间关系，还于1940年2月与绅粮代表严昌龄等人联名致电当时的最高部门，对四川和省府当年预算高达1亿元以上提出抗议。要求“中枢体民疾苦，核实紧缩预算，将一切不急之务明令罢免，俾创痛已深之川人得已稍苏喘息。”（注八）在此期间，祖父亦有若干兼职。时人大多兼职兼薪，但他

不但拒绝兼职公司，而且义务兼任四川省航空建设委员会主席等职。

祖父担任省秘书长期间，张群遇到棘手的事就让他出面处理。1944年10月底，成都闹学潮。成都市长余中英派警察局长方超亲率警察前往镇压，并打伤学生三十多名，抓捕四十多人。11月11日，成都爆发了学生万人抗议政府暴行的大游行。张群不敢与学生见面，遂派祖父前往。据说他的车子经过时，学生说：“李老太爷的车子来了，不要挡他。”当时四川开议会，有左，中，右，某些国民党右派经常挑衅欺压民盟，作为议长的李肇甫经常要求保护左派，喝止右派。李公朴和闻一多的追悼会也是李肇甫代表张群去参加的。据说徐中齐密令特务混入会场收集黑名单，并在追悼会上打伤张澜，因此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李就此事质问徐中齐，徐则以“中央指示”来搪塞，并要求祖父设法“搁平”。李肇甫在任上，曾保释康岱沙出狱，并应杨叔明和罗宇涵请求，亲自打电话给有关部门保释罗广斌。康岱沙出狱后就前往延安。中共建政之后，她任职外交部，并派驻柬埔寨和罗马尼亚。1980年，北京十一学校的张姓体育老师辗转找到我父亲原来的工作单位，其时我父亲恰好来北京被落实政策。张老师说：“你父亲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曾救过我父亲。”但我父亲自己的问题还未解决，也无心过问细节。

我父亲说，全家都把祖父看作圣人。据我92岁的姑父回忆：“我老丈人最清白。穿布鞋，蓝布大褂。一个普通办事员来找他办事，他都要亲自送下坡，再九十度鞠躬。我和你姑姑结婚用了他半天的汽车，第二天他就坐黄包车上上班。有一次他发现听差写私信使用公家信签，就让他还回去。”对于祖父用车，父亲也有类似回忆。父亲是祖母最疼爱的小儿子，他在灌县空军幼年学校读书时，祖母坐祖父的车去看他，并把父亲带回家住几天。父亲回家后的次日早晨，就听到祖父问司机：“她到灌县去看我儿子，花了多少汽油。那么我三个礼拜不坐汽车。”当时称为“一滴汽油一滴血”。当时的四川人也相当敬重道德文章皆佳的李肇甫，至今八九十岁的人提起他还很敬佩。

抗战结束，张群回南京。我祖父应时任四川省主席邓锡侯的要求，又在省府工作了三个月，于1947年离任。次年1月，国民党政府召开国民大会，李肇甫被选为立法委员。据我父亲回忆，那次并非全是选举，而是被圈选。祖父应立法委员一职而前往南京，当时居黄泥巷。同年8月，由蒋介石提名，李肇甫成为监察院大法官。

据父亲回忆，当时国民党政府设有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监察院内设有大法官委员会，大概有十二名大法官。大法官的地位很高，和美国有些类似，比如总统就职宣誓要由大法官监督，大法官有解释宪法的权力，但不直接审案，相对超脱于党派之争。大法官职位高，工资也比较高。当时李家的长子长媳长女都因病去世，留下一对遗孤，次子幼子还在上学，次女已经出嫁，家中的生活来源全部依赖祖父，因此他接受了大法官的职务。在南京时，陈立夫曾请祖父吃饭，用意是了解他是否会竞选立法院院长，其实祖父连立法委员都不愿做。有一回，祖父对我父亲说：“我现在要上庙了。”我父亲问：“去干什么？”他回答：“去当大法官。”

1948年，我父亲已从空军幼年学校毕业。因抗战胜利，空幼学员不再送往美国学习，我父亲就离开了航校。当时他想去投考民航，遂托祖父给戴安国（戴季陶之子）写信。祖父问他：“为什么要去民航？”他答：“为了挣钱。”当时民航赚美金。父亲还对祖父说：“阿爸你没钱，咱们北京的房子已经没有了。”祖父听了非常生气。父亲说，他从来没见过祖父发那么大的火。祖父拍着桌子，骂父亲混帐，说：“你就知道钱，不想多念点儿书。还有几个月，你一定要去考大学。”李肇甫对子女管教很严，不许他们跳舞，但祖母溺爱孩子，每次出去跳舞都是祖母把衣服偷偷拿出去，让孩子们换上。

国民政府于1949年2月迁往广州，李肇甫从南京回四川。他想叶落归根，但归根谈何容易，他当时连回家的船票都买不起，最后还是由卢作孚想办法，坐“夔门号”返川。自1938年回到四川，李家一直无钱买房子，曾先后借住租住过康心之（位于重庆领事巷）、胡子昂、向传义（位于成都吉祥街）、张群和唐式遵的房子，生活来源主要靠李肇甫做法官的工资，辞去法官之后，他担任了康心之主办的《国民公报》社长和唐式遵开办的南林学院院长、辅成法学院教授。四川即将易手之前，

蒋介石又来到四川，任命李肇甫为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的非常委员，但李肇甫拒绝为其工作。蒋介石又要他去台湾，他为了拒绝甚至避入南林学院。他还拒绝国民党要他做的反共广播发言。后来 CC 派曾派人监视李肇甫，据传还要暗杀他。

四川易手时，祖父依然借住唐式遵的家。有一天家里来了两个人，其中的一位我父亲称为吕五伯伯。吕五伯的哥哥是吕超，曾为国民党参军长，相当于蒋介石最大的副官，而吕五伯的女儿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来人对李肇甫说刘伯承想与他见面。祖父回答：“刘伯承是共产党，我是国民党，虽然我不是蒋介石那派，但毕竟是国民党。共产党一来就见我，对你们的声誉不好。”来人又劝了一阵子，但祖父还是拒绝。后来刘伯承带信请李肇甫去革大学习。李肇甫说：“我不去革大，我也不从政。抗日时，我从政。抗日胜利之后，我就不从政，我还是当大学教授或律师，或办报。”姻亲康心之迁往北京时对祖父说：“我有稀饭，也有你一碗。”但李肇甫仍决定留在四川，尽管他曾说过：“哪个革命党一开始不是很好，后来慢慢就有变化。再看十年二十年，几十年看看它会不会变成像国民党那样的。”

共产党在四川掌握政权之后，胡子昂做了重庆副市长，曹荻秋是书记。当时还没有政协或人大，某次会议邀请李肇甫作为当地乡绅出席。会议完了，祖父回家对我父亲说：“今天我说错了一句话，我说联俄、容共、扶助工农。”孙中山的政策原本就是联俄、容共、扶助工农，后被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次日报纸刊出祖父的发言，也被改为“联共”。除此之外，祖父就在家，很少参加政治活动。胡子昂和我们家是亲戚，我祖父当秘书长时，曾邀请他去做建设厅长。但胡做了官后，脸就有些变了，后来在祖父被捕一事上，有人猜想他起的作用，而另一些四川老人，如但懋辛、邓锡侯、刘文辉等对我祖父情分尚存。因唐式遵与共产党作战身亡，祖父借住的房子要被没收，于是李家不得不迁至俞际堂家。俞际堂、但懋辛、邓锡侯、刘文辉等人见李家没房子住，曾愿凑钱帮助买房子。一天我父亲回家，看到两个解放军站在门口。名义上是没收唐式遵的财产，但也抄了我的家。他们抄走两本通讯录，旧账本，还有一张要任命李肇甫为“非常委员”的信。此时当局已不再能容忍李肇甫的不合作。

1951年3月12日半夜，重庆全市戒严。13日清晨，我祖父李肇甫被带走。次日父亲从报纸看到祖父的照片，他穿着长袍，手里夹行李卷，那张照片在镇压反革命展览中也展出过。当时的政策是在国民党时期做过区长的都是反革命，何况祖父做过立法委员。据过来人回忆，“三一三”大逮捕那天重庆全城气氛非常恐怖，很多人被捕。著名学者吴宓时在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任教，当天日记中有如下记载：“阴，甚寒。近三日重庆城郊大捕反革命特务分子，据报载共捕二千余人。闻合川、隆昌等邑亦各捕千余人，捕去皆予枪毙。今日此间校内外亦戒严，警察断桥路，至废早餐。……下午寝息。林来，见缙系逮捕之人，累累过市云云。后闻李伯申，黄墨涵，黄仁中等，此次皆被捕。成诗一首。”吴宓的诗写的是：

捕系累囚缙骑纷，大都盈万邑千人。
但从顺逆别生死，焉识贤愚等秕尘。
情性反常魔胜道，冤仇重报果成因。
网开三面先儒梦，除恶务尽是今仁。
除恶务尽一作诛除异党。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续编》第一册，三联书店2006年3月第一版87页）

因当时关押的人太多，监狱已满，一些人就被关押在名为真缘堂的天主教堂。后来天气越来越热，被关押的人就住在席棚里。当时我的二表叔陈延龄因涉嫌倒卖鸦片也被关在那里。他获释后说，在真缘堂时，被关押的人都是蹲着吃饭，而且不许说话。吃饭时，他看到我祖父，就悄悄地蹲着挪到祖父身旁。我祖父轻声问他为何被捕，得知原因后，祖父说：“你的案子没事，他们会放你。如果你出去就去找刘伯承。”待我二表叔出来，刘伯承已经去了南京。

自3月被关押，父亲曾设法见我祖父，但都被拒绝。祖母去找过熊克武，但熊当时在北京。据黄

花岗烈士喻培伦的侄子喻鍾珏回忆，喻家和李家是世交。我祖父被关押时，因我祖母担心已工作的姑姑和我父亲被祖父牵连，就差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喻鍾珏为我祖父送换洗衣服。我祖父见到喻鍾珏，用手摸着他的头说：“没想到华为（喻培伦弟弟培棣的字）的孩子都这么大了。”

7月的一天，我家来了一个专案员。他让我父亲介绍祖父的情况，并要父亲和祖父划清界限。父亲说：“我没什么可划清界限。我了解我父亲。父亲参加了同盟会和二次革命。后来汪蒋都让他出来做官，他不出来。他做律师，还给七君子辩护。抗战时，为了民族利益才勉强出来维持，还营救过共产党人。”此人还问起“非常委员”一事，我父亲也如实说了。又过几天，那位专案员又来了，他跟我父亲说：“你爸爸病了，痔疮，流血很厉害。”并让父亲送药去。父亲送药去，但还是没见到祖父。

1951年7月20日，父亲正在演出，母亲还在台上独唱。我二姑姑找到后台，告诉我父亲，祖父去世了，让家人去收尸。

次日父亲去真缘堂，进去一看四周都是席棚。他来到一个办公室，办事人问了姓名，然后出示法医证明，上面写着心肌梗死，并让父亲签字。父亲问尸体在哪里，他说在一个小屋里。父亲来到那个小屋，看到祖父躺在那里，眼睛未闭。父亲用手将他的眼睛慢慢地闭上，雇了滑杆儿，抬回家去。

“据同狱逃出者云：肇甫被捕入狱时，已病感不支，每日食量甚少，而共党反责以扫地等苦役，肇甫遂绝食。或有秘劝其进食者，则曰：吾固求死而不得也。逝世之晨，禁锢狱中者均起，点名独不见肇甫；共党方斥骂，视之则早已气绝。”（同注一）

祖父的遗体被带回家后，祖母见了即嚎啕大哭。她边哭边诉：“他清白了一生，就这么没有了。”父亲说，如果让他睁着眼睛回去，祖母看了会更难过。二姑父出去买了棺材。祖父去世的第三天，家人在江北找了一处公墓下葬，墓碑上只写李伯申之墓。五十年代，父亲和堂兄去奠祭过，后来整个公墓都夷为平地了。

祖父死后，我二姑去北京，找到沈钧儒。沈听说我祖父去世，顿足大哭：“为什么不到北京来！到北京就一点事都没有啦！”其实祖父去世前，家里连去北京的车票都凑不出。

1953年6月初，重庆中级人民法院来人通知我祖父不是反革命，当时还问我父亲，你家有什么财产，比如土地可以全部发还。父亲答：“我家没有财产。现在可以还我父亲清白了。他一生清白，没有动产，也无不动产。但最要紧的是，我母亲很想不通，你们应该向我母亲解释清楚。”

1958年，祖母来北京。父亲告诉我：“我是在1958年3月初被正式宣布为右派的，也知道要去北大荒。我不敢告诉你奶奶，只说我要去参加十万军人建设北大荒，何时回来还不知道。你奶奶想到北京来，她从抗战之后就没来过北京了。我很想你，不知道这一去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就要求你奶奶把你从四川带来。老太太来了之后，我强颜欢笑一个星期。那天是1958年4月20日，我们这些人集中到前门坐火车，凌晨4点单位的吉普车来了。前一晚，我一夜没睡，娘也一夜没睡。娘那天要去送，我说你别送了。我看看你，再看看娘，就上了车。那天正好离你生日还有五天，当时你妈去朝鲜演出，离她回来还有十天。你妈回来时，我已经走了……”

那是我祖母最后一次来北京，而我对她唯一的记忆就是照片上那个面目严肃的瘦小老太太。祖母一生中，曾送走了我大伯大姑，后又送走了自己的丈夫。她在文革中死去。1984年我去国前，父亲把她的骨灰带来北京，我们将她撒在北海的湖水中。

我曾祖因官致富，而祖父则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败家子”。他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实践者，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理想而革命、作官和拒不作官。他的一生充满了理想，所以也注定要幻灭。

2005年初，我在印度阿旃陀石窟（200BC - 450AD）内观赏壁画。因当地气候潮湿，那些壁画残缺破损。2007年夏，我又去希腊克里特岛观赏克诺索斯时代（公元前2700-1450）的壁画，那些壁画原来也是残破的，但出土之后却被荷籍英人皮特·琼（1887-1967）修补重构。我记录的家世犹如阿旃陀石窟壁画那样，凡是记忆之外全部留白，后人读它，可自去想象。

注一：《革命人物志》第十集，杜元载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委员会出版，1972年2月（原载于《四川文

献》40期，1964年12月1日，台北)

注二：康心如：《我与报》，1968年手稿

注三：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卷一，P120

注四：傅国涌：《从革命党到普通政党》

注五：余衔玉，高冬梅：《张振武案中的真真假假》

注六：袁伟时：《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迷误看中国民主之路》

注七：陈夏红：《百年法律人剪影》——“沈钧儒私人记录的七君子事件

注八：孙挺信：《中日大决战》第四章——艰难岁月

注九：张国福：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起草日期和主稿人问题—北京大学学报

写于2010年3月28日，改于2011年2月22日

修当代史也要有《酷吏列传》

甘犁

“修当代史也要有《酷吏列传》”，这是富于历史睿智的老干部彭塞提出来的。我是他主持四川省党史工作时的下属，他提出这样设想时向我作过部署，期望通过探索，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党史人物列传，开出生面并有所突破。

彭塞15岁时就参加了抗日民族先锋队，17岁在延安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派回川从事地下工作中，先后在四川大学和华西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养成了讷言敏行、理性自持的思想作风。不想1957年那场劫难一来，竟被判为犯了既不恶毒也未传播的思想罪，受到连降两级的撤职处分⁽¹⁾。有幸的是，他凭着哲人气度，宠辱不惊，无论是身处庙堂之上或江湖之远，始终关心国事民瘼。

编纂党史人物传和革命烈士传，是地方党史工作中的一项内容，在有关的拟目与选题已下达给各专县党史部门之后，彭塞要我下去了解进度和人物传编撰中的问题，还以探讨口吻向我提出是否可以拓展立传思路，重点落在“修当代史也要有《酷吏列传》”上。

他认为，对中共执政后的代表性人物，为英模写传，按干部职级出传，诚然稳妥，但司马迁在为西汉开国至汉武帝时期的干部写传时，除了直吏、廉吏，还有《酷吏列传》，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效法前贤呢？照他的理解，“酷吏”就是不顾人民死活的“死官僚主义者”。他说，这并非他的发明，四川在纠正“五风”以求度荒的时段里，省委主要领导人就指斥过发生了非正常死亡的地区，说有的干部是“见事迟，转得慢，不关心人民死活的死官僚主义者”⁽²⁾。这不就是批的“酷吏”吗！正是因为有只知唯上命是从，毫不体恤下情的死官僚主义现象存在，四川三年大饥荒的后果才会如此严重。我们所撰写的执政时期党史人物传中如果一个这样的人物都没有，四川出现上千万人死亡的历史账⁽³⁾怎么向人民交代？向后代交代？“求实存真”是我们的治史原则，党性原则，不能直面现实，我们交出的本子如何能昭示四川历史的功过是非，如何能显示人民史笔可荣于华袞可严于斧钺的公正性呢？

彭塞的思路，对我来说，是一种震撼，感到这位老革命提出的问题非常严肃。空言“人祸”，无“人”何能鉴“祸”？

根据彭塞不要张扬、先下基层摸摸情况的指示，我跑了川东的达县地区和涪陵地区。因为当年死人多而知名的地方，就在涪陵地区的丰都县。省长李大章在回顾治川教训时说了，原因在缺粮，大跃进中的主旋律是“三高五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层层压，一个压一个，压到老实人也说假话，结果出了大问题。”并具体点了“风灾”严重地区之一为涪陵⁽⁴⁾。省委书记廖志高也讲了，在因“过头调粮已经出现缺粮和饿死人的情况下”，“有的地方就给一些基层干部甚至部分社员扣上‘私分’的罪名，到他们家里进行搜查，

打破坛坛罐罐，把社员长期节约下来的一点存粮统统拿走，有的地方甚至因此逼死人命。”⁽⁵⁾ 四川省委于1960年5月30日向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丰都、荣经、眉山三县违法乱纪，右倾倒退问题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引述报告内文时说：眉山“肿病蔓延，到今年3月中旬，肿病人近9万人，死亡1万人。”荣经干部违法乱纪“打死逼死253人，非正常死亡15000人。”可是列在首位的丰都县，此书只是存目，而代之以泛化性表述：“为了照顾灾区和国家需要，曾经在非灾区多购了一些粮食，加以这些地区原来流行病就较多，因而这些地区今年害肿病的人比去年增多，非正常死亡比例也较大。”⁽⁶⁾

丰都是名胜区，我到涪陵后，没等我开口，地区党史办就由冉光海同志陪同一道去作观光。在上名山看幽冥景象时，还有县文管办的干部同行。丰都本是四川物阜民丰的产粮县，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都曾到丰都视察，总路线制订后，自然要成为展示跃进成果的丰景点了。从而“三高”来得既快且陡。最初订高指标，县上的干部和群众还不失主观热忱，竟说天话。待到“高估产”时，务实的人已知事情不妙，开始说诨话了。丰都出的诨话是“亩产上万斤，没得秤砣称”，明明是反讽，但在当年的热昏中却被认为是豪言壮语。庐山会议后转入第二次大跃进，“高指标”、“高估产”发展为“高征购”，谁要再说“没有粮食会饿肚子”就难起作用了。

那天从名山上下来，大家即兴漫谈，我问了当年死人情况，才知道与谈者全都心中有数，也梳理过丰都县三高五风的资料，但是如何表述，既求真务实，又不被指责为刮“黑暗风”，很有些为难。冉光海给了我《丰都县严重违法乱纪始末》等专题资料，再加上那天比较深入自由的交谈，我对特殊年代的“丰都吏”和非正常死亡现象的发生，感性材料就多了。

大跃进的第二年，四川就已缺粮，在北京等大城市已出现供应紧张后，明知调过头粮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省上仍以锐减川民供粮标准（包括将居民储存的9600万斤粮票宣布作废）等措施，向专县强征，以保京津沪辽等地的粮食不脱销。1959年丰都的“跃进产量”本该按中央“压缩空气”的指示作核减，这年10月，省委主要负责人来涪陵检查八届八中全会决议落实情况，亲督调粮，高热膨胀的粮产数字就压不下去了。最后核定的结果，根据涪陵党史办给出的材料是：丰都县1959年全年粮食预产为二亿四千万斤（实产二亿三千万斤），上报地委为八亿三千万斤，虚报五亿九千万斤。地委按上报产量下达丰都县全年征购任务二亿二千万斤，是当年预计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一，剩下二千多万斤。全县五十多万人口，平均每人全年只有四十多斤。⁽⁷⁾

在粮食大减产下作大征调，还要连创粮食外调“绝对数量”与“份额比例”的两项全国第一，就只能让川民“作出巨大牺牲”⁽⁸⁾。最不堪命的是农民，全年留粮“人均只有100多斤”。“较全国平均水平还低100斤左右。”⁽⁹⁾ 丰都留粮又比全省标准少一半。明朗同志向中央写信说：四川农民口粮标准是由八两（十六两秤）向六、五、四两递减，“有的执行下来，农民一人一天只能吃二两、三两。”⁽¹⁰⁾ 更有甚者是留粮由公社统管，社员“吃多吃少甚至给吃不给吃，命运完全由食堂掌握，能起一点‘救命’作用的自留地又被收尽，长期不给恢复；即使有一点点自己可以掌握支配的粮食，也被反瞒产私分强行搜走。”⁽¹¹⁾ 这就是过头粮的内涵与外延。也就难怪丰都县以反瞒产来促征调，“斗争了近一个月，却没有反出多少粮食来。”⁽¹²⁾

省委要求的征购任务是刚性指令，在电话会议上一再强调：“按时按量保证完成，只能超过，不能短缺。”继涪陵地委于10月8日召开地委十六次扩大会，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之后，紧接着，丰都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和以区为单位的农村党员大会，布置推进全县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粮食产量涉及到“大跃进”、“总路线”的成绩、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公共食堂的巩固等一系列问题，催粮又急如星火。经过了大小会批判，县委在《关于农村党员大会总结报告》中说：“在当前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中心问题——粮食问题上辨明了大是大非。”会议认为：“右倾不反，干劲不来，瞒产不反，腰杆不硬。”⁽¹³⁾ 把拿得出粮食与否、能否完成征购任务、安排好群众生活，作为衡量基层党员、干部是否右倾的主要依据。正值风头上，谁都不敢说没有粮食，完不成征购任务。只

有拼命反瞒产了。⁽¹⁴⁾

关于“反瞒产”，中共中央和四川省委都是下过文的，认为“情况严重，必须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四川要征过头粮，当然更来得坚决。李大章省长讲了，在“层层高压之下虚报的产量和实际能交出的粮食发生严重冲突后”，“四川的反瞒产私分搞得乌烟瘴气”，而尤以“涪陵地区的反瞒产搞得凶”，“定性为敌我矛盾。”⁽¹⁵⁾

丰都城在长江边上，上级调运粮食的船只在码头靠起要粮。涪陵地委催收粮食入库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几次会上严厉批评丰都县委思想右倾，多次提到：“再搞不起来，是第一书记的问题要撤职，是其他干部的问题，要反他的右倾，要当机立断，该干掉的要坚决干掉。”⁽¹⁶⁾在省委加强了省、地、县三级和县、区、公社各级干部间的反右倾力度，为逼交征购粮不断加温的强大压力下，丰都县委干部只有“按照地委电话会上涪陵、垫江介绍的‘经验’，于12月19日在上游公社三合管区，召开了有县委委员，区、社党委第一书记，县级机关科局长参加的‘反瞒产’斗争现场会。会前，抽调四十多名积极分子组成斗争队伍。县委第一书记、地委工作组负责人亲自主持会议。会上，县委第一书记号召与会人员：‘要拿出淮海战役的劲头，要像土地改革一样，这是一场暴力革命，坚决反掉右倾。’并提出‘先打第一线（即管区支部书记、大队长、管区会计、管区保管员），再打第二线（即生产队长），后打富裕农民’。当场吊打了七个所谓瞒产私分的管区干部，其中打死一人。”⁽¹⁷⁾

所谓“组成斗争队伍”，就是安排好棍棒和打手，用暴力手段与民争粮。据《丰都县严重违法乱纪事件始末》称：在出了吊人和打死人的现场之后，就趁热“组织讨论，谈参加现场会的体会，要到会干部检查对‘瞒产私分’的人斗得狠不狠。而具有同情心的则受到严厉批评。”与会干部人人自危。第二天，会议继续进行，参加会议的人员扩大到部份党、团员、县级机关干部、生产队长、城镇居民，共八百多人。县委第一书记作了动员报告，一再强调：这场“反瞒产”斗争是一场暴力革命，要拿出“三、五反”打老虎的狠心来投入斗争，接着分两个会场斗打“瞒产私分”的管区、生产队干部二十多人，当场打死三人。最后，县委总结了这次现场会的“经验”，强调各区乡领导回去后召开现场会，把“反瞒产”斗争进行到底！⁽¹⁸⁾

司马迁笔下的酷吏无不严刑峻法，崇奉“三木之下，何词不得”。但他们的严酷主要用在惩处地方豪强，并不无理伤及黎庶。丰都吏的征敛之苛与手段之酷，则是直接对着基层干部和种粮百姓来的。层层打，厉行“棍棒之下何粮不得”！以下就是当年的丰都场景——

县委现场会结束后，各区、社、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厂矿、街道按照县委的布置分别召开了“反瞒产”斗争现场会。县委派出若干个工作组到各处坐阵指挥，督促检查。在“现场会”的影响下，全县违法乱纪行为普遍发生，其主要表现：

一、残酷迫害干部、群众

当时，捆绑、吊打、刑讯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的违法行为到处可见。被迫害者不但是所谓瞒产私分的干部和群众，而且对受害者有同情心的干部和群众都被加上“右倾思想”、“富裕农民思想”、“参与瞒产者”等罪名而遭到迫害，连因饥饿而偷吃东西的小孩也不放过，同样遭到捆扎、吊打。少数领导干部为所欲为，斗争会是走一处开一处，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干部就要遭殃。由于一些受害者经不起刑讯逼供，乱招供了一些所谓的同伙或粮食藏放地点，会议主持者又将被供者捉来斗争。这样就出现了“你今天打别人，明天你也可能挨斗，今天你是挨打，明天就成了打人的积极分子”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达数千人，被害致死八百八十三人。其中当场活活打死一百七十三人。参与“事件”的生产队以上干部有五千三百四十四人，占干部总数八千九百二十四人的百分之六十，在家工作的十七名县委委员有十六名参与了“事件”。一位县委副书记在三元公社管区亲自主持斗争会，打死基层干部七人。县级机关三百四十名干部，有三十二人被吊打过，当场打死三人，打后致死三人。政法干部五十九名，有五十六名不同程度搞过违法行为，占总数百分之九十五。如三元、茶元、社坛等区还成立了“打虎队”、“战斗组”等打人组织。打人的方式有吊打、拖拉、“打排

球”（把人推过去推过来），“打夯”（把人像筑土的石夯一样反复抬起抛下）。三元、社坛、虎威、上游、双路、栗子、包鸾等七个区五百八十八个管区支部书记，有二百六十三人被吊打过，其中十五人死亡。崇实公社七管区打死二十二人，最小年龄八岁。保合公社一共迫害致死四十三人，当场打死八人。县委点上的上游公社（现在的汇南、新建、湛普三乡所辖）四十八个脱产干部，有四十二人亲手打过人。生产队、管区两级干部五百五十三人，有三百六十八个参与过打人，致使这个公社因违法乱纪造成死亡一百零四人。财贸战线开展的“反贪污”运动，斗打过五十人，其中打死二人，怕挨打自杀二人，逃跑二人。⁽¹⁹⁾

二、抄家、罚款、“扫地出门”

经过对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残酷迫害，并没有反出粮食来。在当时极“左”思潮的压力下，就在全县农村开展了大清查。首先在县委点上的上游公社三合管区抄群众的家，将清出的大米、盐巴、面条、红苕片、衣服、被条等物资公开展出，以此证明粮食是有的，而被社员藏起来了。因此，就在全县农村开展抄家、罚款（赔偿瞒产款）、“扫地出门”（把全家人追出去，不准在屋里居住）。“全县共计罚款四千五百三十户，金额十一万七千八百多元，抄家一万一千九百户，没收现金五万二千多元，公债券二万四千多元，被条二千余床，毯子二千八百余床，衣服一万多套，大洋一千二百多块，粮食十六万多斤，棉布三千三百四十多丈，家具八千余件。高镇、茶元、双路、包鸾、栗子等五个区，被抄家的有八千多户，占这五个区总户数五万七千多户的百分之十三点二。其中，六百二十九户被全部没收家产扫地出门。虎威公社百平管区被罚款五十九户，金额八千五百多元。其中，赔偿瞒产损失款四十五户，金额七千五百多元，贫农社员何明发因偷吃了几颗花生和他保管的粮食被偷了一百五十多斤，罚款二百元。社员李国银被评为瞒产谷子一万斤，罚款一千二百元，扫地出门，没收全部家产，折价五百八十多元抵交罚款。观音公社一管区有四户社员偷吃了红苕种，被全部赶出家门，逼到山上居住。结果四户十五口人死了十一人。检察院一位副检察长在高镇公社催收征购任务，一个晚上组织人清了四百四十四户，到四管区五排没有清到谷子，就每个社员罚款五角。一位县委副书记在三元乡新光管区检查生产，到楠木沟看到柯世禄家大门外田里谷芽子撒得不好，不但当场打了柯世禄、柯世绪，并随即抄了柯世禄的家，将住房封了，追出三元境地。抄家没收的物资，有的低价卖给了少数干部或社员，有的送到伙食团做燃料，有的折价分给社员抵作工资，没收的食品被少数人吃了。⁽²⁰⁾

14

三、私设监狱、劳改队，随意抓人

“反瞒产”期间，许多无辜的干部、群众被送进了收容审查所强制劳动改造。被关押强制劳动的有两部分人。一是“反瞒产”斗争中被批斗过的干部、党员。二是社会上所谓的不法分子。全县私设监狱四十八所，先后关押七百四十二人，干部劳动农场九十二个（实际是集中劳动，审查问题），集中审查一千零八十八人。政法机关设收容审查所十所，先后非法关押二千三百零四人。县委第一书记批准县公安局制定了《收容审查十条规定》，内容是：1、无正当职业，游手好闲分子；2、思想不满分子（闹粮，说怪话，一贯对现实不满，调皮捣蛋者）；3、有犯罪嫌疑分子；4、盲目外流人员（包括农村进城没有手续者）；5、偷吃、混吃、抢吃、白吃者；6、偷摸、行盗、抓拿、赌骗者；7、来历不明分子；8、包庇坏人，违反政策者；9、造谣生事，叫嚣缺粮者；10、私刻公章，伪造印件，涂改证明者。根据上述规定，仅在县城城隍庙先后关押过一千一百四十九人。其中因冻、饿、吊、打致死三十多人。武隆县桐子公社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随同八人，去丰都县城买东西，以大队证明无效为由被抓到城隍庙关押审查七天。一个解放军转业干部到丰都探亲，随同爱人和两个妇女，就怀疑是逃跑，被收容审查二十一天，直到部队两次发电报证明后才放行。解放军北京某部一干部到丰都调查材料，住在县城旅馆，执勤人员查户口，查第一次他出示了证明，查第二次时，他提出质问：“既然是查户口的，为何不穿警服？”就不出示证明，也被抓去收容所审查了一天一夜才放出来。⁽²¹⁾

四、乱处分干部

县委一次电话会议可以宣布处分几十个干部。县、区工作组走一路处分一路干部。全县共处分干

部一千一百七十九人。上游公社四个总支书记（即现在的乡党委书记），以严重右倾、反不出粮食为由全部撤职。二十七个管区支部书记撤职二十二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一。三元、社坛、虎威、上游等四个区一百九十二个管区党支书，被撤职一百四十三个。⁽²²⁾

1960年省委的工作布置仍是以继续大跃进、深入反右倾为重点，因而丰都的“以打逼粮”迟迟未得纠正，等到问题暴露，才知号称“天堂橱窗”的各公社食堂不仅无米为炊，还严重丧失了自救能力。那个历来以丰饶著称的旅游城市，也就出现了“胖馆遍野”的新景观，这可不是名山上的木雕泥塑，而是尚存一口游丝必须出勤的劳动力啊！于是上级党委连连发令，要求将肿病现象连同“干娃儿”和妇女的子宫脱垂病“限期扑灭”！可是丰都等县刚办过反瞒产的成果展览，省长李大章说，涪陵地委向省上“声称在这次反瞒产运动中，反出了五亿斤粮食。”⁽²³⁾那还需要拨粮救济吗？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丰都干部爬在通天桥上下不来，上级没有拨粮，“限期扑灭”也就只能是任其自灭了。文管会干部还告诉我：“胖馆”和“干娃儿”是民间语言，在文件上为“浮肿病”和“三类儿童”，还有种收人的“蛇蚤风”，在文件上查不到。缺粮办食堂唯一的办法就是“低标准，瓜菜代”。丰都是菜头之乡，涪陵榨菜就是靠丰都菜头成批生产并大量外销的。可是当年的丰都反瞒产却是“两反”：既反瞒粮食，又反瞒菜头，“两反”后的“瓜菜代”，就只能是用芥菜根、甘兰梗、红苕藤、粉葛尖等切碎焖煮，于开锅后再渗入一两瓢米粉，然后由社员提着桶来领食。这就相当于养猪用粗饲料时段的标准了。如果焖熟得不好，猪吃了就会耳朵发蓝，口冒白沫，喉咙里发出低吼，几蹦几跳就死了。当年丰都食堂出现的常见病、多发病，就是这种症状。防疫部门检查说：菜汤中有氰氢酸，如不能如实道出这是老菜叶子焖出的毒素，那就是毒剂致祸了。于是当年的非正常死亡就找到了两个祸主：一是天气陡坏；再就是有阶级敌人投毒！

那次丰都行了解到的基本情况是：1959年冬主要为打死人，死亡情况可以量化；1960年后为饿死人，究竟“非正常”了多少，当地干部都说无法量化。不过还是有些数据可以参照，一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开会，向到会的组织部门干部问了死人情况，得知“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二百多万”。⁽²⁴⁾一是曾任四川省政协主席的廖伯康根据《四川省志·地理志·人口编》算了个账：“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是四百七十七万多人，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专区人口是三百七十二万多人。1964年比1953年人口净减少一百零五万。”⁽²⁵⁾

1959年至1960年春天，丰都不仅人逃不出去，连信件也因为邮检封锁发不出去。1960年3月廖志高到涪陵检查工作，在得知严重死人情况后，才以紧急电话通知各地立即停止反瞒产，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并在请示了省委后决定派调查组入县调查。4月25日，涪陵地委调查组到丰都，4月26日召开县委会，接着召开了县、区、社、大队四级干部会，全面揭发违法乱纪情况。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调查，获知丰都干部已被反得无心组织生产，怕沾了粮食的边，春耕时分竟无人出面领谷种。群众普遍产生活了今天活不了明天的悲观情绪。5月4日经省委批准，处分了一批干部，将必须问责的四人逮捕，并经过法庭公审判刑，以息民愤。这四人：县委书记刘维梓、县委副书记李志亮、县委农工部长杨坤山和县公安局长余家发。⁽²⁶⁾

把天府丰都搞得来近乎幽冥之地，地狱形现，莫说写酷吏列传，就是勒石纪事也不为过。不留鉴戒，何能体现信史的严正、民命的尊严，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党政机关怎么能重获公信力呢？但我向彭老说，真要往上捋，弄清“酷吏”产生的上层背景和历史条件，会碰到一些纠结而悖谬的机微。比如省委负责人批评死官僚主义者“见事迟，转得慢，不关心人民死活”吧，要点是在句首，“见事”实为“见示”，“关心人民死活”相对地具有第二义。如果“见示”与第二义相冲突，“关心”的就不是人民死活了。因而只要是在这样的组织链条中“见示”和“转”，纵然死人也很难清一个死官僚主义者出来。以丰都之案为例：入狱四人以执行责任作申诉，经地委复查后上报省委，得到了改判，经涪陵地区丰都法院和中级法院两级重审：“原判事实属实”，“撤销原判”，对刘维梓、李志亮免于刑事处分；对杨坤山、余家发宣告无罪。⁽²⁷⁾

“五风”是凭着“公”的名义向下贯的，发生问题也是“出以公心”，所以有这样的丰都判。因风灾日重。1961年1月，中央准备颁行《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明文要求保护人民的安全和自由，不准“随便罚人打人关人搜查”，“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抵命”。毛泽东认为“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作用”，公布时改为“办事要公道”。⁽²⁸⁾

在公私观念已经多年搅混，在破私立公中，许多当道者已是“劫财难舍”的情势下，煞得住风吗？四川就在解散公共食堂、划自留地等问题上，以维护“一大二公”为由，硬顶了半年到一年的时间。⁽²⁹⁾直到非正常死亡上升至八位数，省委主要负责人才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承认是“团结起来犯错误”。毛泽东及时帮助了他，一是会上提示他应检查“见事迟，转得慢”，再是会后又作了言约而旨远的批评，说他“只懂得大公无私，不懂得大公有私。”⁽³⁰⁾当代史是以事为经，以人为纬交织出来的。如果经纬紊乱，被根本颠倒了公私观念未作澄清，彭老所设想的人物传系列，就不知该如何着手了。

彭塞听汇报后，沉吟一会说：“还应该再调查。打死人的‘酷吏’要写，但那些有理想，有气节，在长期受委屈情况下，始终不变其操守的干部更应该写。这样的人相信不在少数。更值得为发扬他们花力量。”“我们应该写好‘直吏’、‘廉吏’，同时也写好一二‘酷吏’。”他还举了些例子，如深入川西农村调查，敢于为民请命，在中央会议上同四川省委那位负责人作抗辩的田家英；在大跃进中作了纠左努力，结果被批斗撤职的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以及不惜冒死也要向中央反映川情的明朗、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等等干部。彭老还向我鼓劲说，通过立传，将这些正直干部、廉洁干部排列成人物长廊，所体现的是党建进程中的光明面。我在这次川东行中，也听到许多基层好干部的事例，有的人甚至开仓放粮，在活民无数后不幸身殉。确实也应该为他们有所褒扬，以光史册。

彭老的考虑积极稳妥，只是他在位时已是满头银发，到七十岁离休后，“直吏”、“廉吏”与“酷吏列传”等课题就悄然搁置了。对于计划要拿下的史学高地没有攻克，彭老显然心有未甘。2002年春，彭老因病去世。我这时听到件事，在有次干部聚会上，有领导亲切致词：“祝老同志们健康！健康！健康！在职干部们高升！高升！高升！下海同志们发财！发财！发财！”彭老在感慨中竟大发伏枥之嘶：“我们人民遭了1957年的‘阳谋’，大跃进的惨烈牺牲，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等等，为什么大家不深思！深思！深思！灵魂深处不清扫！清扫！清扫！”⁽³¹⁾在感愧中，也就深感彭塞未竟之愿是留给我们的遗嘱。

注：

(1) 《深切怀念彭塞同志》纪念册第124页

(2) 《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3页

(3) 账有多本，全部肯定四川群众非正常死亡严重，但统计方法和得出的数据有参差，据《人民日报》记者萧风1962年入川调查后写给中央的《四川情况是1200多万人》。《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送审本），根据《当代四川粮食工作概述》，记述说：“1959至1961年三年全省人口死亡885.3万人”（197页），征求意见后的正本，据《四川省志·地理志》改述为“净减少618.7万人”（195页）。

(4) 四川人民出版社《远去的背影》第161页、167页

(5) 《关于四川调粮的回顾反思》，廖志高口述，曾庆祥整理，《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第76页

(6) 《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第20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

(7) 涪陵地区中级法院1981年度法刑申字第1号卷《刘维梓1979年4月28日申诉件》

(8) 《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二卷，中央党史出版社，第189页。

(9) 同上，第195页。“留粮标准”为原粮，100斤黄谷折成大米为75斤。

(10) 明朗〈一封匿名信的命运〉，《当代史资料》22期第8页。

(11) 廖志高《关于四川调粮的回顾反思》，《当代四川要事实录》77页。

(12) 冉绍权《丰都县严重违法乱纪事件始末》。这份报告在涪陵党史内部刊物上发表时，加有按语：“目的是

让人们吸取教训，进一步认识‘左’倾错误的危害性。”

(13) 丰都县委《关于农村党员大会总结报告》，存丰都县档案局 1959 年度档案 15 卷 1-4 页。

(14) 丰都县档案局县委 1959 年度档案 15 卷 1-4 页

(15) 《远去的背影》161 页

(16) (17) 丰都县档案局 1960 年度县委档案 229 卷涪陵地委工作组《关于丰都县严重违法乱纪的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和丰都县委《关于丰都县发生严重违法乱纪事件的情况反映》

(18) 冉绍权《丰都县严重违法乱纪事件始末》

(19) (20) (21) (22) 丰都县档案局 1960 年度县委档案 229 卷涪陵地委工作组《关于丰都县严重违法乱纪的调查处理情况的报告》和丰都县委《关于丰都县发生严重违法乱纪事件的情况反映》

(23) 《远去的背影》第 161 页

(24)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第 156 页

(25) 同上

(26) 冉绍权《丰都县严重违法乱纪事件始末》

(27) 刘维梓、李志亮、杨坤山、余家发四人严重违法乱纪案件，经涪陵地委复查认为原判事实属实。鉴于是在 1959 年“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应予纠正。报经四川省委批准，于 1983 年 5 月由涪陵地区丰都法院改判。

(2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417 页。

(29) 廖志高《关于四川调粮的回顾反思》，《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 75 页。

(30) 杨荫梧《深切怀念李井泉同志》，1990 年 4 月 19 日《人民日报》

(31) 《时代·岁月·人生》彭塞纪念册 156 页。

17

补记：拙稿写成后不久，又看到四川省新出的《艰难的奉献——杜心源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其中提到一事可为补充。1959 年冬，人命危浅之象已经呈现，一些地区以“疫情”上报。省卫生厅派医生去患区诊治，“做了几例尸体解剖，发现肠子薄得像纸一样，都萎缩了。”向省上报告说，这样的衰竭致死在于营养不良。谁知和上面的见解顶撞。省委主要领导人采信“流行病”之说，成立了由省委书记杜心源和公安厅长赵苍璧挂帅的除害灭病小组，专门派员去“疫情”流行区涪陵调查。“待了三周，走访了一二十个大队”，沿途见到路毙，还见到生者已无力收殓，只能以树枝遮盖，任其暴尸荒野。听汇报的涪陵地委副书记郑德明，对死因在于“役情”或是“疫情”，不作辩解，只是心情沉重地说：“对不起人民！”这次 1960 年的春荒调查，即已知道，原来人口逾百万的涪陵，“连死带跑，只剩下八十多万人了。”（见该书第 425 页）

来自中国古拉格群岛的报告

严家伟

在中国，因为言论、文字而招来牢狱之灾，流放充军，乃至杀身之祸的，不论受害人数及惨烈程度，肯定都是世界之冠。不过历朝历代都以个案为多。遭祸者少则一人、几人，多则全家，大不了株连九族，也就是几百人吧！这已经轰动一时了。然而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因文字言论招祸的竟有五十五万人之多。这恐怕是亘古未有。而上世纪一九五七年我们“伟大的”反右运动，竟然使五十多万民族精英，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牛鬼蛇神”，接着便是受不尽的折磨，无尽头的苦难，饿其体肤，辱其人格，连累妻子，祸及父母，如此史无前例的创举，即秦始皇再世，朱元璋复生，康熙、乾隆泉下有知，也会惊诧莫名，自叹不如的。所以难怪毛泽东也不无得意地说“秦始皇算老几？他焚书坑儒，一次不过杀了几百个儒生，我们镇压反革命一

次就镇压了 XXXXX 人”。这也可算是“伟大领袖”的“名言”吧！

个人作为这五十几万分之一，又列幸存者中一员，虽已年近古稀，也觉得有必要为这段历史作个证人，以便为历史的正义法庭，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一

一九五七年一月，在四川成都有个新刊物问世，名为《星星》诗刊，当时由于苏联已开始“解冻”，国内的文化专制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这个以白航、石天河、流沙河等为主力的诗刊，以崭新的面孔出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不再是过去那些老一套的“歌德”（歌功颂德）式的作品。它宣称“大江东去的豪放欢迎；小桥流水的清婉也欢迎”。这对铁桶似的文化专制显然是个挑战。就在这期创刊号上，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是一大亮点。若站在今天来看，这样一首咏物言志的诗，可说是普通极了。然而对于“万岁文学”、“歌德作品”已经读厌烦了的中国人，一读到这样的诗，犹如饿极了的饥民吃到了一块窝窝头，虽然粗粝一点，但还可充饥。于是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中）反响强烈。大家互相传阅、传抄，虽非“洛阳纸贵”，也是风靡一时了。

文化专制中，岂容如此“另类”声音出现？所以不久便有人在《四川日报》上开始发难，说这诗有问题，是宣扬什么“反动骨气”云云。今天我们在听一些民主国家的电台广播，如果它播出某人一篇文章时，往往都会加上一句“该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的立场。”本来作为新闻传媒，它只是有闻必录，客观报道。但是在中国却不是如此。特别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日报》就代表党中央，《四川日报》就代表四川省委，它上面发表的文章，就代表该“组织”的立场，所以一人发难层层加码。问题到了后来，根本不谈诗的本身，而是变成了对作者的人身攻击。尤其可笑的是，《四川日报》竟刊出一篇文章，说该诗作者流沙河是金堂县地主余家的九少爷，还请出一位农民来“控诉”。

当时二十岁的我，刚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个文学青年。对《草木篇》一诗很有好感。看到我喜欢的作品和作者被人如此糟塌，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假如这事发生在今天，我再生气，也会一言不发，躲得远远的。但可惜那时我还没有现在这么“聪明”，所谓血气方刚、疾恶如仇。而且更相信当时的宪法上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于是拿起笔来就向《四川日报》写信投稿，也不管说得说不得，只求一吐为快。更为愚蠢的是，不但不匿名，反而真名真姓真地址，生怕人家找不着你似的，所以最后都在“组织”的掌握之中，白纸黑字，“罪证”如山。《这是为什么》社论一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网打尽，在劫难逃。

所以我觉得我当右派，一点都不“冤枉”，没有谁来对我施展“阳谋”，动员我提意见。是我自己“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但我比武松、鲁智深差远了，而对方又比蒋门神、郑屠户强大一万倍，所以“出手”的结果，自然是我被打得鼻青脸肿——不，粉身碎骨！

二

今天，稍有点民主宪政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左派”、“右派”，不过是不同的政治派别，不同的政治观点与主张而已。“左”、“右”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关键要看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否能给民众带来好处，本身是否廉洁奉公。然而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所谓“左”便是“革命”、“进步”，“右”便是“落后”、“保守”。这还不算，1957年《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公然声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动派”。说“右派”就是“反动派”、“反革命”，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大帽子，往谁身上一扣，谁就立马被妖魔化，亲人不敢相认，朋友见而避之，这还算好一点的，更有甚者，为表现自己“革命”、“进步”，以求入党荣升，便马上反目成仇、落井下石，忘义灭亲，卖友求荣，什么出卖灵魂、出卖人格、不要脸的丑事都被当成“高尚之举”，大肆提倡加以施行。

所以我成为“右派”之后又爆出了一个在当时更是“大逆不道”的事——“收听敌台”。人类进入科学昌明的二十世纪，无线电、原子能是两大标志性的进步。有了无线电，世界变得更“小”，彼此距离更“近”，虽万里外发生的事，也朝“发”而夕“闻”。就在这人类飞速进步的历史潮流中，却有那么极少数人，偏要实行闭关锁国的愚民政策，对世界的进步和他自己的一切丑行，决不让民众知道半点。谁要不从命，那就是大

逆不道，“里通外国”，世界公认的新闻自由竟被如此玷污！

一九五六年在波、匈事件发生时，有天晚上，我无意中在拨弄一台收音机时，忽然听见一句“伦敦 BBC 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我出于好奇便听了下去，谁知这“一念之差”，便注定了自己日后要被钉上“十字架”的命运。虽然干扰音不断，但由于那台晶体管收音机质量不错，基本还能听清。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原来世界上竟有那么多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的重要事情，原来这些事情的真相竟被谎言完全颠倒。若干年后，通过历史资料大解密，终于证实当年那些“老外”，确实比我们的记者诚实。例如朝鲜战争的发动者，确实是尊敬的金日成先生，而非“美帝国主义”，又如 1956 年波兰、匈牙利人民是在反对苏联帝国的压迫，而不是“反革命动乱”。当一个人知道自己被人欺骗后，只要他正义感未完全麻木、便会感到恶心、愤怒，于是便想倾吐，何况年少气盛的我。于是便在私下闲谈中，朋友私人通信中，有意无意地吐露出来。一成右派，自然要深入揭发批判，落井下石者，纷至沓来，“有关人员”乘胜追击，最终便坐实了“收听敌台”之“罪”。

从事实上说，这并不冤枉。但从法理上说，则是大冤特冤。因为我做的这一切，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或曰天赋人权。公民有知情权，有权利知道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公民也有权利对这些事进行独立的思考与评价。也有权利以理性的、非暴力的方式加以表达，这是一切民主国家公认的人权标准。再说一九五四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此在字面上也予以承认了的。不过那时的宪法，还不如毛泽东写个便条，或随便说句闲话。因而在个人专制、一手遮天的情况下，什么公民权利、言论自由，在那些满脑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权贵们的眼里，几乎是一文不值。正应了那句俗话“秀才遇着兵——有理也说不清”。人家不是说了吗？“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就是独裁”，“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真坦白得好可爱、好可爱哟！夫复何言哉？只有进监狱了。

三

在受尽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在经受了逼供、诱供、手铐、脚镣、单独长期禁闭等一系列强有力的专政手段之后，我终于被迫选择了“坦白从宽”之路。“坦白认罪”之后，获得了宽大处理——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1958 年 9 月 6 日，我被送进了四川省泸州专区监狱。这在当时已是皇恩浩荡。据说人家是看我还年轻，还可以“改造”得过来，才如此高抬贵手——然而他们终究没有料到，我的思想、我的信念，他们是永远无法加以“改造”的。——用他们的话就叫“坚持反动立场”，用古人的话，则叫“匹夫不可夺志”。

当然，要做到坚守自己的信念，也没有这么轻松，要想坚持不让人家把你的大脑像病毒攻击电脑一样彻底搞垮，也决非易事。用现代的词汇叫“心理战”，那时却有个“新名词”叫“思想改造”。这“思想改造”据说是人人有份，乃至全民有份。但在“人民内部”是“自觉改造”，而对“阶级敌人”，则是“强迫改造”。至于“人民”与“敌人”是随时可以易位的，今天你服从“我”，你就是“人民”，明天你“逆我”（哪怕是无意的），马上就可变为“敌人”，你就该去享受“强迫改造”了。

怎么个“强迫”法呢？首先要彻底侮辱你的人格，毁坏你作为人的起码尊严。你是“敌人”了，你被“专政”了，特别是进监狱、劳改队了，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坏人”。这一点要强迫你自己去承认。要强迫你自己去痛骂你自己，你必须挖空心思，搜索枯肠，花样翻新，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进行侮辱性的痛骂。谁骂的词句越刻薄、越狠毒，谁把自己骂得不是人，不是个“东西”，甚至连畜牲都不如，那谁便是“认罪服法”、谁便是“深挖了犯罪思想根源”的“好表现”。而那些饱食终日的狱吏、劳改干部们，便坐在一旁端着茶杯，点燃香烟，有时还皮笑肉不笑地欣赏着囚徒们进行的自我侮辱的比赛。

这种对人的尊严的侮辱，可以说无处不在，比如开会、出工、学习、吃饭、甚至睡觉前，必须先集合唱歌。而对于歌却有特殊规定，除了歌颂所谓“大好形势”和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颂扬之外，其余的歌一律不准唱。更可悲的是，不知从那里弄来的词曲，给你编成一首首自唱、自骂、自侮辱的所谓“歌曲”，如“我们是罪人、罪恶污满身，获得政府宽大，劳动改造求新生，我们感恩不尽……”又如“劳改当中两条路，我们犯人要认清……”以下便是“抗拒改造、死路一条、接受改造、前途光明”等等之类，把圣洁的艺术美好的音乐，用来作这种贱踏人格尊严、摧残人性，从而使人心灵麻木的毒剂，真可谓“用心良苦”矣！

有人就说“什么白公馆、渣滓洞，说得那么可怕，国民党也只要求被捕的共产党人写个悔过书，就可释放你。我们从早到晚，悔了一千次过，把自己骂了一万遍了，还说思想没改造好。看来国民党还是很讲仁慈的。”这话，当然只敢在私下说，若被狱吏听见那还了得？也有人就因为一言不慎，便丢了性命，后面再讲。

其次，在尽情摧毁你人格尊严的同时，再进行所谓“正面教育”。这个“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用强大的谎言，对你进行疲劳轰炸。首先把过去的历史全部否定，所谓“旧社会”全是“人间地狱”。其次把世界其他国家也基本一概否定，于是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都在受苦受难，等着中国人民去解放他们。除了“欧洲的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和“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外，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政府几乎全是坏蛋。唯有中国形势一片大好，一天等于二十年，神奇的事情说不完。到了六十年代遍地饿殍，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吃得一肥二胖的劳改干部，还在说“共产主义在向我们招手了”。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已濒于崩溃了，监狱汪政委，还在谆谆教导我们，“看大好形势主要看政治，不要光看锅里头、碗里头。”当然，他老人家的“锅里头碗里头”是肯定有保证的，我们却在饥饿中干着超负荷的“强迫劳动”。

有人说“谎言重复一千次，就可以变为真理。”人家却有耐心重复一万次。更重要的是，人家把一切信息全部封锁，你根本不知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例如，连人类首次登上月球这样划时代的大事，因为是“美帝”创造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普通民众，也不得而知，更遑论关在劳改营中的政治犯了。先让你变成“聋子”、“瞎子”，然后让你时时刻刻只能去听他重复着的美丽的谎言，最后让你进入“催眠状态”，把你的大脑变成他的跑马场，任其践踏。于是他便说，你们这些犯人，就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孝子贤孙，你们就是“美蒋”的走狗，后来还加上“苏修”，你们就是妄想变天复辟，所以才犯罪。就这样胡搅蛮缠，把你正当的、合法的、正义的行为，加以莫须有的丑化，以便从精神上彻底打垮你。以便让你老老实实接受他的精神枷锁。

当然，监狱、劳改队里，确实也关押了一些恶人坏人，例如杀人放火、强奸、抢劫以及身为干部甚至共产党员，却贪污、堕落、违法乱纪最后被绳之以法，这些人理应受惩。但他们和我们这些因文字言论而受到政治审判的“良心犯”，完全是两码事。所谓“良心犯”，这是国际上的通用称呼，即这些人是因受良心和正义感的驱使，表达了和当局不同的主张、立场和态度，例如南非的曼德拉、南韩的金大中、缅甸的昂山素季……不管地位高低，事件大小，他们从来都不能与杀人、放火的刑事犯混为一谈。但在中国，当时政治犯却被视为比刑事犯更“罪大恶极”，不仅混在一起关押，而且还要受刑事犯的监督。甚至有的劳改干部，还对刑事犯说“你们是人民内部犯罪，和那些反革命有本质上的不同，要好好监督那些反革命，靠近政府”。于是有个叫李有恒的犯人，他是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为肚子饿，和他父亲争吃一条红薯，一怒之下，一棒子把他父亲打死了，被判无期徒刑。他竟公然在小组学习会上说“我是打死我父亲，是人民内部犯罪，不像你们这些反革命，要反对共产党，就凭这一点，我的本质就比你们好！”天下之无耻、荒唐事，还能有胜于此乎？

四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本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情况恰恰会倒了过来，民族里的许多优秀精英沦为阶下囚，不学无术，无德无能乃至寡廉鲜耻之徒反被奉为座上宾。听说在1980年审问江青的时候，她有一句堪称“经典”的供词：“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上个世纪，五、六十乃至七十年代，监狱劳改队里的干部大多数都是些不学无术乃至大字不识几个，不可理喻的暴徒。但人家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上司忠实，说白了就是：你叫他“咬谁”他就“咬谁”。这在当年还有个很摩登的名词叫“朴素的阶级感情”。就凭着这“感情”，他们对于政治犯，特别凶狠，一点不如他意，轻则耳光、拳头，重则吊打捆绑、手铐脚镣，不准吃饭，无所不用其极。北大才女林昭成为政治犯后，竟被反铐180天，上厕所都不打开，张志新枪决前被割断喉管，李九莲绑赴刑场时，用竹签把舌头和下腭钉在一起，死后还进行奸尸挖去乳房。这些丑恶之举若称之为兽行，都抬举了他们，野兽哪有这么坏？而且这些事都是见诸国内报刊，决非“美国之音造谣”。我在劳改营中目睹的，亲自领受的肉体折磨，可借用个成语曰“罄竹难书”。例如把手铐的一个铁圈铐在你左手腕上，另一个铁圈铐在右手膀上，不出几分钟，被铐人双手因血液循环障碍，由红而紫、由紫而青，受刑者撕心裂肺的惨叫，胜过任何恐怖影片。执刑人还给这种铐

法取了个很“艺术”的名称“左右开弓”。还有一种“土铐”，是用铁锻打而成，刚刚把一双手卡进去，中间穿进一根铁棍，外加一把锁。这种铐，铐上以后，吃饭只能像动物一样把嘴伸进碗里去一口、一口地“含”起来。有个姓何的囚犯，被绳子把双手双脚捆成一团，名曰“四马攒蹄”。这还不算，一个干部还把一碗水泼在绳子上，绳遇水而膨胀，最后，此人双手被捆成残废。酷刑成风五花八门，最后甚至惊动了毛泽东，他在1974年下了个禁止酷刑的批示，在监狱劳改队中公开传达，这其中有句话，我还记得，毛佯装不知地说：“这些法西斯方法是谁发明的？”1962年我因病不能出工，被一个姓孙的指导员打倒在地，用脚踩，踩了再踢，踢了再踩，直到昏死过去，一次在山上挑粪，一个姓宋的分队长，说我挑少了，“磨洋工”，用一根树条，劈头盖脑就给我打来，回去还不准我吃晚饭。有个姓甘的队长外号“甘扁担”，他经常手中拿着一根扁担，不是挑东西，而是哪个囚犯不合他意，就扁担“伺候”。无独有偶，还有个“余一脚”，此人经常穿双皮鞋，谁被他看着不顺眼，三句话不对头，就给你一脚。这些家伙难怪毛泽东都说是法西斯。最近电视上大炒特炒美军在伊拉克虐待、虐囚，比起我们伟大的劳改干部来，美国人那两手只能算“小儿科”，不过人家那“小儿科”被他们的“自家人”——美国记者揭露出来(这就是新闻监督的力量，这就是民主制度的优越)以后，美国政府公开向全世界道歉，相关责任人判刑。我们呢……

当然，在劳改队干部中，也有一些人是通情达理比较文明，有一定知识的，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人，不仅如凤毛麟角，而且被他们的上司和同事所不认可，称之为“小知识分子”，“立场不稳”。特别在文革中，这些人处境更加困难，往往干了二十年还是个普通干事。而一个叫伍映堂的半文盲连读个报都错别字连天，“挑畔”读作“挑半”，“迫击炮”念作“迫击炮”，“吹捧”念成“吹棒”。他一边拿着一条蒸红薯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又在给囚犯“训话”，以至吐字不清，丑态百出，但由于人家“阶级立场坚定”，开口“死右派”，闭口“死反革命”，对人凶狠，不到三年就“荣升”为中队指导员。

五

21

近年文艺界有人爆出历史“猛料”，说“反右”后不久，毛泽东在一次与文艺界人士会见时称：鲁迅如能活到1957年，他要么不开口，要么进监狱里去继续写(大意如此)。清楚表明专制必须扼杀任何不同的声音。至于监狱里，就比社会上要“更上一层楼”了。不但不许“说”、“写”，连“看”也有严格限制。报纸只准看《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刊物只有《红旗》杂志，书只准看毛著。马、恩之作，不禁止但也不提倡，其他的则一概斥为“封、资、修”，每隔一、二个月，就要来一次名曰“卫生大检查”。名为“卫生”，实则对政治犯是要检查文字，从每个政治犯的身体到衣物翻个遍，哪怕一个小纸条也要细细查看，牢房里更要细细搜查，只差没像电影上“皇军”说的“挖地三尺”了。要是鲁迅在这种环境里，他能“继续写”吗？能有中国版的《绞刑架下的报告》问世吗？

不过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几个知心的难友之间，仍不时传递着小小字条，互相鼓励，这在当时，那是百分之百的“反革命活动”，可以招杀身之祸的。当然长篇大论的东西无法写，都是小诗短词。先后和我有这种文字交往的有作家晓风、教师颜思尧、李仲言等人，大家都明白现实的残酷，但也从不放弃对未来的憧憬。“黑夜漫长亦有边，春风不日到江南，冰山颓作千重浪，江海翻波谈笑间”、“隔墙欲问荣枯事，笑指楼台夜半钟”、“我有壮怀当许国，愿君妙手可回天”……这些文字都是看后即付之一炬，但却永远刻在了心里。

最危险的一次是在文革中，其时红卫兵喊叫着“语录”，满街打砸抢烧，接着武斗之火更势若燎原，面对这罪恶燃烧的岁月，“左家庄”的英雄好汉们，硬要将无耻进行到底，我的一位难友写成一首《满江红》词，开头是“独倚危栏，风吹雨，心潮若决，凝目处，愁云万里，烽烟辽阔”，正当我读到“遍地腥云飞血雨，一街狼犬诵马列”时，也许是我太入神，竟没注意到一个劳改干部走到我面前！“严家伟你看啥？”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就凭这首词我和那位朋友都可被送上“绞刑架”。好在这位张干部是个“大老粗”，我断定他不可能懂什么诗词。于是我也不知从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勇气，干脆把纸送到他面前说“我正在学毛主席伟大的诗词满江红”，并特别把“满江红”三个字指给他看。这三个字他大约也认得，也许是“满江红”三字充满革命的色彩，而且又是毛的诗词，谁敢说三道四？于是他便说：“好嘛！要好好学习主席的伟大教导改造你们的反

动立场。”说罢扬长而去。我怕他再回来，连忙将纸丢入口中吞下了肚。若干年后我与这位难友重逢，怎么也回忆不起这首词的全文了，也不愿去编几句来凑。就像维纳斯的断臂也是一种美一样，我们就留下这带着遗憾的残缺美吧！

但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有这么侥幸。特别是在那大力提倡告密、检举，在出卖人已变成一种“美德”的氛围里，有的刑事犯杀人放火，品质本就恶劣，有的人本来并不坏，却在这个“大气候”里学会了“靠近政府”，以求立功减刑，也是在文革中，我和滕友泉、郑清三人一起在煤井巷道里推车，下一轮煤车未到，我们就在巷道边坐下等。日复一日，免不了闲谈几句。那天也许是合该出事，滕友泉是个农村善良的青年学生，因家庭是地主，又有些不满言论，便成了“反革命”犯。郑清原是部队退伍，回乡作社队干部，胡作非为，强奸妇女被判刑。那天大家讲到自己过去的事。郑清便大肆吹他在农村搞了好多个女人，还有十几岁的处女，说他“判刑都值了”。滕友泉这时突然冒出一句：“我才不值，爷爷、父亲是地主，枪毙了，我又是反革命，真是三代血泪仇了。”我一听，知道要出事，又不敢制止。便说“我去解个小便”。煤井巷道里是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小便的，等我“小便”回来，煤车就来了，这事我以为就敷衍过去了。谁知十多天后，中队办公室叫我去，一进屋只见“周中队”、“王指导”还有前面提到的“张干事”，分别坐在三把椅子上。看见这“三堂会审”的架势，我知道出事了。他们先是和颜悦色地说“我们认为你近来还是有进步，学习主席诗词，这好嘛！你还年轻，要好好靠近政府，将来才有光明前途……”我知道这些都是鬼话，一边唯唯诺诺，一边打主意如何对付他们。后来终于“言归正传”，问我：“你近来听见什么反动言论没有？”我知道是那回事了，却故作苦苦思索，“哎呀，都是些说劳动太累，伙食不好……”不等我说完，“大老粗”老张就吼道：“哪个问你这些球不能疼的事？我提醒你，你们三个人在井下推煤车歇气时说些啥？”真是“图穷匕见”。我也明白了，这肯定是郑清告的密，满腔怒火，却不敢发作。于是便想来个“围魏求赵”。我说“张干事提醒我，我想起来了，郑清近来极不认罪，经常吹嘘他的犯罪行为”，于是便说他如何吹嘘，玩弄了好多个女人，还有处女等等，我想让他们知道，郑清就是这么个坏种，他的话能信吗？可人家才不这样认为。老谋深算的王指导，冷笑着对我说：“你检举的这个问题，我们要追究，这也是你靠近政府的表现嘛！但我要告诉你，有人说极端反动，反动透顶的话，你是听见了的，这就看你靠不靠近政府了。”我说我没听见，我解小便去了，就这样在逼供和抵赖中僵持了两个多小时，这时，那位“大老粗”张某发怒了，连骂带吼地说：“你这个家伙不老实，你当真没听见？你赌个死人咒给我听。”我抓住他这个低级失误说：“我不但敢拿我自己赌死人咒，还敢拿全家人来赌咒，不过共产党好像是不信赌咒的吧？”弄得他满脸通红。当时，“我”就是“全家”，全家就剩我一个人了。家中其他亲人都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非正常死亡了”，我还怕赌什么“咒”啊！就这样“拉锯式”地搞了将近半个下午，最后“周中队”想了个“收场”的办法，他说：“你没听见他二人在说什么，至少看见他们二人在一起说话。”于是叫我写个所谓“旁证材料”，写明时间、地点看见他二人在一起说过话，至于内容，我推说解小便去了，没听清楚。

没隔多久，滕友泉便被送入单人牢房单独囚禁，一年多以后，滕友泉竟被判处死刑，其中一条“主罪”便是“在改造期中公然叫嚣要报我家三代血泪仇，实属不堪改造的反革命分子”。郑清因此记一大功，我则记一大过。

滕友泉被杀之前，我被调到监狱医院“劳动”。因为当时监狱里有个干部叫柳文生，此人有一定文化修养，心地善良，特别喜爱学习，也尊重知识，所以不时和我谈些文学之类的问题，在那个年代真是太少见了。因为他和医院负责人私人关系较好，就给我和作家晓风说了个“情”，把我们二人调去医院学当“护士”（而那时监狱医院也确实缺少有文化的人），使我摆脱了矿井下非人的苦役。也使我捡回了一条命，否则很可能就死在不堪重负的苦役中了。劳改场所像柳文生这样的人，在那个年代太少、太少。这不知是囚徒的悲哀，还是当局的悲哀？

死囚的遗物一般交医院洗后封存，如有家属来领就给他。滕友泉的几件衣服和一条被单是交给我清洗的，我仿佛还能触摸得到难友的体温，依稀看得见上面的血痕，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因为那么一句话便消失了，我悲愤，更有几分自惭、自责，甚至在心里骂自己不该去写那个什么“旁证材料”，你虽写的是没听清楚谈些

什么，但至少证明滕、郑二人谈过话，加强了郑清“孤证”的力量，滕友泉的死，自己也有帮凶的责任。尤其使我钦佩的是，我和滕友泉平日私下二人间，还说过不少在当时也是不得了的“反动话”，他至死不吐一字，真是坚贞不屈的人啊！

“人们，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这是伏契克的一句名言，读中学时，就读了他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我当时对这句话似懂非懂，这件事终于使我品出了话中的份量。

六

法律给别人定了刑，人家服满了刑期，这件事就完了。这还是指一般刑事犯，真正有罪的人而言，至于政治犯，他出狱后，竞选议员、总统都大有人在。比如曼德拉、金大中，还有现在被中共迎为座上宾的台湾的李敖不都是如此吗？

1972年在文革喧闹声中，我终于把“牢底坐穿”，但事情却远没有完。“法”外施“威”又来个戴上“反革命帽子”，强迫“留队改造”，称为“就业人员”。实际上除了能拿少得可怜的几个工资外，一切几乎与犯人差不多，他们内部甚至叫“就业员”为“劳改释放犯”，把囚犯与“就业员”合称“两类人员”，甚至进出劳改场所大门，就业员必须立正、脱帽，放下手中东西，向站岗的武警兵喊“报告公安员，就业员XXX请求出去”或者“进来”，那兵叫你走，你才敢走。遇到个别的兵，偏要捉弄人，他看见门口站了一大堆人时，他就要摆“威风”，叫你一次、二次重新报告，等大家像看“稀奇动物”一样“欣赏”你，他在上面洋洋得意地笑了。更有恶劣的是，遇到毒日当头，或下大雨时，你站在那里既不敢戴斗笠，更不敢打伞，把你晒个够或淋个够，他才放你走。甚至“就业员”要想找对象结婚，也要受到种种刁难，我妻子和我结婚前，干部把我妻子和丈母娘叫去说：“你们知不知道严家伟是反革命，现在还戴有帽子，也就是四类分子、管制分子，你要是和他结婚，你家里人今后想要参军都不得行，你们一辈子都伸不到皮。”这一切对于已进入法治文明社会的人听起来，真无异天方夜谭上的故事。如果说那些人可耻、卑鄙、不算刻薄吧！

23

我就是这样在被侮辱、被折磨中，像牛马牲口一样地活了下来。“沉沉百忧中，一日如一生”，终于来到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正在一个所谓“老干部”的家里给他作静脉注射，刚把药注完，他叫我给他打开桌子上的半导体收音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还不知电视为何物，就这个半导体收音机，比今天的什么电脑、数码、高档手机都更能炫耀自己的身份。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旋钮，谁知传来的是一片哀乐声，他瞪我一眼，“你收的什么台？”我说“我根本没动调频”，我当时真害怕要是收音机里冒出一句“这里是美国之音”或BBC之类，那我就“死定了”。好在不是，而是我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紧接着它就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消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我们永别了！

这位“老干部”真不愧是老干部，我还没反应过来，他的政治敏感性就充分地发挥了出来，他一边顿足捶胸、一边嚎啕大哭，边哭边叫：“我的妈呀！这怎么得了啊！天呀，我也不活了呀！”我正在莫名其妙地望着他，看那只有哭声没有眼泪的表演时，谁知他老婆走了进来，问我：“怎么回事，你把针打错了呀？”真是天大冤枉，有口难辩。可当时谁敢说“毛泽东死了”这句话，那还了得？！我只好沉默。我这一“沉默”，更引起他老婆的怀疑，以为我真利用打针，整得他老公又哭、又叫，便一把抓住我“死右派”、“死反革命”的骂了起来，我进退无路，急中生智，也来了个“即兴表演”，于是我也如丧考妣般地放声大哭（不过因为尚未达到明星的演技水平，所以只是干吼并无眼泪），我边“哭”边喊：“哎呀，不得了啦，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离开我们走了呀，这怎么得了啊？”谁知我自作聪明，反而越弄越糟，激起了他老婆的“革命义愤”，顺手就给我一巴掌，破口大骂道：“放你的狗屁，你这个死右派，还胆敢攻击我们的红太阳！”骂着，又准备对我进一步采取“革命行动”时，我的“大救星”终于出现了，这时上面来人通知“老干部”快去开会，并说“伟大领袖逝世了”……

我提着诊疗箱从他家里走出来，听着那阵阵传来的安魂曲，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一个时代结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这最黑暗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

这时屈指算来，我成为政治犯已二十年，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啊！我当然是最大的冤枉与不幸。但与我相

同遭遇的人，有被杀害的，饿死、病死的更不计其数。有的虽生命尚存，却已半傻半痴，甚至精神失常，相比之下我又是幸运的一个。更幸运的是，我的头脑还清醒醒，没有人把我的思想“改造”得了一点，没有人能动摇得了我对民主、自由、人权的信念。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保持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判断也是正确的，我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看到了柏林墙的倒塌，看到了苏联大帝国的瓦解，看见了东欧走向民主，看见了昂纳克、齐奥塞斯库这些暴君终于被绳之以法。真是：“眼看他盖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我们今天的社会，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还有严重的腐败、社会不公与歧视，离民主宪政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我们毕竟能公开谈论民主，毕竟不再称人权是“资产阶级的货色”而写入了宪法，在国内毕竟还能有如焦国标、刘小波、余杰、戴晴这样不同的声音。但这些进步，决非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个“大救星”恩赐的，而是人民的觉醒所推动才取得的，也包括我们那一代人所作出的牺牲。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公正的结论。它比任何“平反”、“改正”更重要、更光荣，更足以让我们自豪。更可以让我理直气壮地大声说：“我当年无悔、青春无悔！”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仍然作同样的选择！这大概也就是孔老夫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

因此我愿将这首小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生逢劫难避危机，空度英年亦觉惜。
白发无情书老态，青梅有趣忆儿时。
浮生烟雨五更梦，乱世沧桑百首诗。
目击妖氛渐入土，终能闻道莫嗟迟。

2006年2月于四川宜宾（此稿2006年8月首发于《中国观察》。）

24

两次走出鬼门关

王开泰

火烧埂劳改营

中川钢铁厂离乐山城西南40公里路程，地处峨眉山支脉的三峨山麓中的大渡河畔，离近代名人郭沫若的故乡沙湾镇3华里。中川钢铁厂散落在周围几十华里的山区里，是四川省乐山专署公安局办的一个劳改和劳教合为一体的劳改营。

这里有5000（也有说一万）余劳改和劳教人员，分编了若干车间，车间下面又分编了若干劳改队，这些劳改队散居在远近的一些山头、山腰间，只有厂部附近是块山间平原，有一条直通沙湾镇的大道。

正值“大跃进”年代，我们的任务是大炼钢铁，劳改营的人被分为采矿、冶炼、运输、基建、烧砖瓦、种菜等不同的工种。队长由公安人员担任，还有少数劳改刑满释放后的就业人员，协助队长工作，本来这是个很大的劳改营，“大跃进”开始后，这里便挂出了“乐山专署中川钢铁厂”的牌子。据说，西面离这里百里远的峨边县，也有这样大的一个劳改营。

我从1959年4月24日被押送到这里劳动教养，到1960年9月5日解除劳教，为期一年零四个月零九天。这时候，全国正处在极左路线愈演愈烈的时期，“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等等狂热的运动层出不穷。紧接着，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批老百姓饿死的年代。

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的劳改营，将是何等情况的呢？

我们先到厂部，只见到处张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改恶从善，唯一出路”等触目惊心的巨幅标语。还看到一些由持枪民警押着的犯人，这些犯人正在担运矿石，气氛恐怖，这对我精神上是一个极大的威慑。我的神经高度紧张，认为我这辈子完了。

我们被分配到火烧埂采矿四队，四队离厂部八、九里路，要翻越一座大山。

此时，已是黄昏，细雨不停地落，大家背着行李，拖着疲劳、饥饿的身子，跟着带队的公安人员，沿着泥泞崎岖的山间小路，摸索着爬上了火烧埂山顶。到达住地，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举目四望，这火烧埂是万山丛中的一个山岗，远近山峦层层叠叠，茫茫群山里，人烟稀少，满目荒凉。我好像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顿时，触景伤情，想到历代那些得罪了权贵，被发配到荒凉不毛之地的历史人物。我只有仰天长叹无可奈何！

在山上背风的地方，修建了几排临时茅草棚。棚子中间，有一条人行道，两边搭了两排长长的大通铺，上面铺了些稻草，我们就睡在这四面透风，还漏雨的草棚里。夜里，人挤人地睡在这两排大通铺上，外面阵阵山风夹杂着野兽的叫声。室内两盏油灯，阴森森的，灯光黯淡，长夜不熄，一个大尿桶就放在门背后，臭气熏天。

我们的任务是露天开采铁矿，后来，改为运输矿石到化铁炉。

全队大约有300余人，都是从成都、重庆两地送来的劳教分子，另外，有两三名劳改刑满就业人员，协助公安干部做些具体管理工作，如：管伙食、生产、工具等。在编班时，刘队长（刘丙仁）指定我为一班的班长，我那个班大部分人员是从重庆来的，有40余人，共分三个小组，并选出组长，指定我当班长的原因是刘队长事先知道我的历史身世，因为我原是共产党的南下干部，有一定的领导经验和信任度。劳改单位有个特点，就是除队长是公安人员外，班组都是利用劳改人员管理劳改人员，我成了被利用者。

劳教人员之间的称呼一律称“同学”，见队长讲话时，要立正，规规矩矩地洗耳恭听，要绝对服从。每天早晚两次全体集合，由队长点名训话，个人活动范围在警戒线内，严禁超越，否则以逃跑论处，哨兵就可以开枪射击。吃饭按工种定量，每月36斤粮（矿工是最苦最危险的工种）。

刚开始，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7点，共劳动12个小时，包括中午吃饭在内，不久以后，每人都发了劳教服穿在身上，以示区别与众不同的罪犯身份，这是对我人格的极大侮辱，在一个好人身上披上一张“罪犯”的画皮，叫人心何等的痛苦难受！但既然落到这般地步了，也只能忍受。反抗是徒劳的，只有死路一条；逃跑也行不通，那些被抓回来的逃跑犯人，在全体劳教分子的面前，被吊在树上，由犯人来鞭打犯人，那凄惨的哀叫声，令人心惊胆战，即使侥幸逃出警戒线，改名换姓，也是徒劳。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汪洋大海里，谁敢收留你？此外，没有户口和粮食关系，根本无法生存。比如，另一个队的一个劳教犯逃跑后，被山里的农民剥光全身衣服，只穿条短裤，五花大绑捆着送回来……

在此绝境中，只有想办法改变自己的处境最现实，要做到这一点，唯有咬紧牙关拼命劳动，同时，老老实实地认罪服法。这样，才能争取早日解除劳教，离开这个鬼地方，“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当时，“回到人民队伍”是最打动囚徒的口号。

为了活命，为了我的后半生，我横下一条心，要从绝境中闯出一条生路来，“回到人民队伍”中去。

瞌睡坝的“死亡队”

我们这批人，刚来时，都还有一股猛劲，大家都想好好劳动，争取早日解除劳教，“回到人民队伍”中去。因此干劲很大。然而，随着“大炼钢铁”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劳动强度也越来越大，除了夜里睡觉，吃饭、大小便以外，全部时间都在强化劳动，后来，连夜里睡觉的时间都无法保证了。

那时，有个非常时髦的名词，叫“放卫星”，而且，“卫星”放得要更多、更大，最后到了无限度地拔高。我们这些劳教分子就成了争取放“大卫星”的牺牲品了。

白天大家劳累了一天，半夜里，常常突然被哨子叫醒，立即起床，每人担100多斤重的铁矿石，冒着风霜严寒，在漆黑的夜里，沿着崎岖小道，紧急向厂部炼铁炉运送去。山区的气候反复无常，有时候，半夜里冒着寒风阵雨，向高炉运矿石，来回20多里的路程，回到宿舍后，疲劳得脱了湿棉衣，

钻进被子就睡着了。正在这时，突然又是一声高喊：“赶快集合运矿石，高炉掉料啦！快！快！”于是，大家又急忙爬起来，冒着风雨担上矿石，翻山越岭向着炼铁炉奔去！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美其名曰“几天几夜不下火线”。

虽然劳动强度无限拔高，但每个人吃的粮食定量却固定不变，36斤粮的定量和超强化的体力消耗的差距越来越大，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亏损也越来越大。不少人的身体很快就拖垮了。即使这样，那36斤定量也不能完全吃到，因为除去硕鼠（劳教营的工作人员和炊事人员）从中克扣，真正能吃到肚子的粮食早就打了八、九折。另外，蔬菜不仅很少，里面还看不见点油花儿，甚至有时只有咸菜和面酱下饭。

我们队里有个劳教分子平时爱说俏皮话，有一次，他唱歌时，哼出一句：“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肚子吃不饱……”结果被人打“小报告”反映到队长哪里，全队马上召开一次斗争大会。在斗争会上，这个人跪在地上，一个犯人对他一陣猛打，因为是他的嘴巴唱的歌，直打得他满嘴是血。

每次开饭时，每个人舀一盅开水，里面撒上些盐，先用盐水把自己灌个半饱，然后，再吃各人的那罐饭。这种方法只能解决一时之急，一旦撒几泡尿把这些盐水排出体外，肚子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反而更饿了。后来，大家想了个办法，利用有时在离队较远的深山里开矿的机会，上班时，班里选出两个做事老练，大家信得过的人，到半山腰或山脚下的农民家里去，买农民喂猪的红苕叶子，或晒干了的烂菜叶子，装在洗脸盆里，就地拾柴在山洞里煮熟。然后，利用工休时间（上午10点左右），工地上留个人放哨，以防队长来工地视察，其他人则全部去狼吞虎咽地大吃一顿。

这个办法比猛灌一肚子盐水好多了。然而人的生理机能与猪不同，用清水煮的烂菜叶子既无营养也不卫生，有人说肠子里的油水都被烂菜叶子刮光了，但我们还是狼吞虎咽地吃。久而久之，年龄较大的和身体素质较弱的犯人先病倒了，以后生病的犯人越来越多，这些病人的共同特征是：混身浮肿，四肢无力，气喘，拉肚子，只想吃东西。这种病只是饿病，许多人就这样病（饿）死了。

病得轻的犯人，留在队里，专门集中在一个临时搭建的草棚子里，落雨时，棚子里四下漏水，地下也四处流水，棚子里的病人，只好用脸盆接漏雨水。这种饿病除了吃饱饭，减少体力消耗外是无药可医的。有的人病情则愈来愈重，最后，队里把他们送到一个名叫“瞌睡坝”的医疗队去。被送去的犯人十有八九有去无回，因此人人都叫它“死亡队”。后来，重病犯太多了，医疗队承受不了，只好将这些人留在队里面。许多重病人，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去“死亡队”。

我们班里有一个名叫方田的同学（安徽省人），他被送进医疗队后就不行了，临死前他要求见我。在方田未被送到医疗队之前，他多次恳求我说：“王班长，我不行了，我恐怕回不了重庆了。以后你回到重庆时一定要到我家看看我娘和我老婆张琳。”我答应之后，他还叫我记在笔记本上：重庆沙坪坝区化龙桥黄角堡小学语文教师张琳。写完后他向我一再道谢。他被送去医疗队时拉着我的手依依难舍泪流满面。当时，我在班里人缘关系好，另外我又是班长，很多难友把我当亲人。不久，有人带来口信告知我说方田不行了，盼望我去看他。那天，我请假去看望方田。一走进茅草棚子里，一股屎尿臭气扑面而来，令人恶心。只见地上横七竖八，东倒西歪躺着许多面容可怕，快要死去的病人。我看见了方田，他已经成了一个还活着的骷髅，十分可怕。他听见我来了后，突然清醒过来，欲哭无泪。他想拉我的手，但手只微微动了一下，已无力抬起。他很吃力地说：“王班……长……，你……你……回到重庆后，……一定要见……我爱人……张琳，……说我……对不起……她。”说完这话他一下子就断气了！

我目睹了他的死亡，心里非常悲痛，同时也非常恐惧，说不定哪一天死神也会突然降临到我的头上。

后来，我看到了埋葬他的那片荒山，阴风惨惨，到处是一堆堆新坟，令人触目惊心！

在“瞌睡坝”，我的难友周革新（“右派”，重庆长航局干部）亲眼目睹了大量右派的死亡，他告诉我，当时死的人太多，无处可埋，因山上地薄，尸体埋了不久就被大雨冲出来，有的地方埋了几

层死人，后来实在埋不下去，只好把死者用他自己的铺盖卷起来，拖到一个山垭口处，抛到山下。不久，山下死尸成堆，臭不可闻，下面几户农民不得不搬家，但是，当局不准他们说出去。又据我的难友李志田（原重庆市民政局科长，“右派”）后来对我说，他从有关方面得知，当时中川劳改营有劳改劳教犯一万人，其中饿死了30—40%，也就是说约3000—4000人死在那里。

我们班的副班长王松桥（重庆黄沙溪人）已年近50岁了，我们两个为了夜里睡觉能彼此增加体温，把各自的铺盖和在一起合铺睡。不久，他也病倒了，两腿浮肿，四肢无力，气喘吁吁，他怕被送到“瞌睡坝”的死亡队，一再对我说，他的病不重，不用去集中，可以留在工棚里看管一下宿舍。

1959年8月22日早上，我把他的饭送到他铺前，连叫他几声他都没答应。我把他的被子一拉，大吃一惊，他已直挺挺地死去多时了。我吓得浑身瘫软，他什么时候死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和死人睡在一个被窝里！

他那双可怜而又恐怖的眼睛给我刺激太大了，我终生难忘！

王松桥死后需要掩埋，因为我要带队出工，队长叫我从班里派几个人去埋，据田一年（“右派”，湖南人）回来告诉我说，山坡上到处是石谷子地，他们挖了几个地方才找到了一个山坡，费了好大的力，挖了一尺深就挖不下去了。王松桥人高马大，只好将就着把尸体弯曲着硬塞进去，上面掩盖了一下就算完成了。我听了后心里很难过，王松桥生前和我关系甚好，他很尊敬我这个“老革命”劳教难友，一个人就这样像条死狗一样埋了，甚至连狗都不如，爱犬死了主人家还悲痛，他死了后，没有亲人的哭声，只有我们这些劳教分子的兔死狐悲，担心着自己也这样走向死亡。后来听说他的尸体很快被山上的野狗吃了。

我们那个班，原有40多人，仅半年的时间，连续死了九个人，现在我还记得名字的有：方田、王松桥、刘克彬、马正仪（大学毕业，长寿八角中学语文老师，“右派”）、伍加林等五人，其他人的名字就记不清了。

死亡人数在继续增加，死神在向每一个人招手。

恶梦中死神的狰狞

一天，全队在集合开饭时，别的班里有个劳教分子因精神太痛苦，买了一瓶烈性虎骨酒（那时买不到酒，就只有以虎骨酒代酒），一气喝了下去。喝完不久，他酒性大发，坐在地上放声痛哭，刚吃进肚子的饭菜呕吐了一地。我们班有个叫董永泉的同学（“右派”，原成都市公安局的干部），见到呕吐出来的那些饭菜时，立即趴在地上，用双手捧起来就往嘴里送。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见到人变为狗的行为，可见那时犯人饿到何种程度。

有一天早上，轮到我和另一个同学天不亮去厨房打稀饭，炊事员正准备分稀饭，突然一声巨响，装稀饭的大木桶爆裂了，稀饭流了一地。那些等着分饭的同学顿时不约而同地扑上去，用双手捧起地上的稀饭就往嘴里送，我犹豫了片刻，也跟着扑上去……

在那个年代，一个人只要被投入劳改队，就没有什么人格尊严可言，不管你过去是个英雄好汉，还是儒雅的文化人，都得像狗一样地活着。写到这里我顺便举两个例子。我的一个难友名叫王猛（1938年的老革命，原重庆中梁山煤矿党委书记，“右派”平反后，任重庆市参事室主任），有人怀疑他偷吃了别人的一罐米饭，他死不承认，结果被大绳五花大绑地捆在电线杆子上由犯人斗打，手臂被打成终身残废。那副惨相是我亲眼看见的。另外我班里有个从峨边劳改农场来的同学，他告诉我，他亲眼看见原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右派”董时光（留美归国）狼狈不堪的样子——为了抢到桶里剩下的稀饭，把金丝眼镜和帽子都挤落在稀饭桶里。我还亲眼看到原国民党的上校军官黄××捡烟屁股吃，这些都成了见惯不惊的事。有人说“劳改营中无英雄”，这句话我深有体会。

那时，吃点猪肉难于上青天。盼了好久，听说因为上面的大官要来视察而沾光终于打了一次“牙祭”。每人只有老秤（16两算一斤）3两肉。此事成了队里的特大新闻，作为鼓动大家放“卫星”的动力，消息传开，人心激动，一片欢腾。

肉从厨房打来后，各班、组的人员都蹲在地上，围成一个圈，每人面前摆着自己的盅或碗，班里分菜的值日，拿着筷子一块块地根据肉块的大小配搭着，往每个碗里夹，周围的人一个个眼睛鼓得大大的，死死盯着每块肉的大小。肉夹完后，再把盆子里剩下的肉汤，用小汤匙平均分到每个碗里去。分完后，分菜值日当众声明：“谁认为我自私，可以端我那碗肉吃。”

一般情况下，大家各端各的那碗肉，遇到有人认为分得不公平吵闹起来时，只好把肉碗摆在地上，顺碗的次序编成一、二、三……的数字，然后把数字写在每一张纸条上，拈成一个纸团，每人抓一个纸团当众打开，按上面的数字对号端肉碗。这种吃肉的方式，即使在“叫化子”中，也难以找到记录。

我们班里有一个名叫马正仪的同学，病重躺在铺上，临死那天，正赶上队里吃肉。他一听说吃肉，忽然间清醒过来，用手指着嘴，口张得很大，有人问他是不是想吃肉？他已说不出话，只是点头。开饭时，一位同学把他分得那碗肉端上来，一块块地用筷子夹进他的嘴里，他吃了几块肉后，才断了气。

除了饥饿，还有其它死亡的威胁。那时候，露天采矿的工地上，经常开山放炮，有时几处工地上同时点火，以敲锣声为警告，一时间，炮声隆隆，山崩地裂。有一次，排炮过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我向工地走去，突然附近工地上，一眼瞎炮轰隆一声巨响，一块巨石从天而降，刚好落在我面前一公尺远的地方，把我吓出一身冷汗，如果我向前多走一步，那么我也就变成了火烧埂山上的野鬼了。

在火烧埂的日日夜夜，真是一言难尽！它是占我劳教时间最长（约占四分之三），最残酷，最恐怖的日子，同当年我随军南征北战的战场相比，其险恶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有，性质完全不同。

在战场上死得壮烈死得光荣，而在这里，死得屈辱死得卑贱。在战场上，虽然生活艰苦、紧张、险恶，但有同志间的友爱和温暖，但在这里，是暴力强压下的苦役、饥饿、精神上 and 肉体的残酷折磨和对“人格尊严”的侮辱。更使人痛苦的是，我还不es敢喊冤叫屈，必须装成一个真正的“阶级敌人”来接受这种所谓的“改造”，来扮演这场人间难演的戏。

从火烧埂死里逃生

我能从火烧埂劳改营死里逃生，得力于三个因素：第一，我才30岁出头，正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再加上早年在军队的锻炼，身体素质较好；第二、“韬晦保身”的“活命哲学”使我在生死关头面对现实，把平反冤案、思念老婆孩子等等，一律抛之脑后，什么也不想，也顾不得去想这些了，人性的本能活命第一，只顾自己如何生存；第三、有一位暗地里保护我，为我创造了生存条件的人——我们队长刘丙仁。

刘丙仁是山西人，一位三八式的老革命，外号“刘大胡子”。此人很有政治斗争经验，据说他当过县委书记，因在私生活上犯过错误，由川东行署下放来到这里。

刚到火烧埂时，全队300余劳教分子中，我原来的共产党员、南下干部、身上有战场伤残等历史身世，引起了刘的注意，在编班时，他指定我当班长。

一天，我俩偶然相遇时，他主动向我打招呼，态度很和气地叫我到他的屋里坐坐，进屋后，屋里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当我受宠若惊地坐下后，他像老首长见了老部下似的，很慈祥地笑着说：“王开泰呀！怎么你也被弄到这里面来了？”

他的表情和这句话触痛了我，我顿时泪如雨下，说不出话来。

他笑着说：“不要难过，想说什么你就尽量说出来吧。”

在这位革命老前辈的真诚面前，我决定冒点风险说真话。我喊了声“冤枉啊！”，便声泪俱下把我的冤情向他诉说了一遍。他听了后许久默不作声。半晌，他像有所感悟地说：“你一来我就听说你了，我还看了你的档案材料，你千万不能再上诉了，你这种情况，越上诉，就会被整得越凶。既然到了这般地步了，就不能再想别的了，你要痛下决心，接受这种改造的考验，争取早日摘掉‘帽子’，改变现实处境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这是最根本的根本……”

他还推心置腹地说：“我们公安部门，只是一个执行机关，无权改变你案子的结论，你这案子

非要你原呈办单位认为搞错了，才能给你平反……你千万不能再想法去改变这个结论了，只有痛下决心，面对现实，经得住真金不怕火炼的考验才行。”接着他又说：“关键在你主观上努力，以后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帮你创造条件。”

在危难时期，刘队长给我的帮助令我终生难忘。记得有一次，在突击运输矿石的时候，我精疲力尽，眼看就要倒在地上了，他立即叫我去掌握过秤，并在全队点名时向大家说：“王开泰的腿是为共产党打天下负伤的，不同一般……”我听了以后，泪流满面。妻子马如兰来信，找当地部门起诉，要和我离婚，刘队长和中川钢铁厂驻厂法庭史庭长（也是位老干部，他与我多次谈话中，流露出对我的同情）表示坚决反对，并以单位组织的名义向对方所在单位联系，希望他们做我妻子马如兰的思想工作。

后来，我在火烧埂采矿队，甚至在中川钢铁厂的劳教分子中，成了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劳教分子。1959年，在“大战八、九月，迎接国庆十周年”的生产突击运动中，我因成绩优异，受到了王厂长亲笔写的通令表扬，当时全厂的高音喇叭，一直广播了三天。

1959年9、10月，我又被评选为好人好事的典型、个人积极分子，那时候，厂里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是相当出色的。刘队长有意把我培养和树立成为火烧埂采矿队的“标兵”。

1959年11月7日。我被评为“大跃进”中的先进生产者，劳教积极分子的代表，出席“中川钢铁厂先进生产者、劳教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厂部授予我“先进生产者、劳教积极分子”光荣称号，还得到物质上的奖励。随后，我被大会当场推选为8名代表之一，出席“乐山专署劳改劳教先进生产者，劳动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但这个会，后来没有开成，不知何故。

这些，是和刘队长对我的帮助分不开的。

另一道“鬼门关”

1960年4月15日，上面突然通知我去厂部参加“支农”工作。

我打好背包，告别了班里那些与我共患难的难友们，下山去厂部管教科报到。从此，我离开了火烧埂采矿四队，我庆幸能活着走出这个“鬼门关”。

走出“鬼门关”的我，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刚进劳教营时，有人说我还有一副青年领导干部形象，但现在，面黄肌瘦，头发、胡子长得很长，衣领上，头发上爬满了虱子，两眼痴呆无神，两腿浮肿，四肢无力，走路气喘吁吁。总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1960年4月16日，魏副书记和管教科的江科长作动员报告。主要内容是谈毛主席《关于工业支持农业》的重大意义。他们说：“这次抽调全厂50多人，组成支农队，由管教科邓副科长亲自率领，去乐山县七区轸溪公社支农，时间最少一个月。”还说：“抽调上来的人都是下面选送的改造表现比较好的人，希望大家积极努力搞出成绩来，这是争取早日摘掉劳教帽子的大好机会。”

我们背着行李，顺着公路，沿着大渡河向上游方向前进，逐渐走出了山区，进入了风光优美的丘陵地带。我们这些劳教分子的身体都被拖得不行了，我背着行李，好似千斤压顶，两条腿简直不听使唤。下午4点钟，我们到达轸溪公社和平管区，全程9公里，我们整整走了4个半小时。

“支援农业”是个新的任务，也是我进入劳改营后，第一次接触外部世界，感到很新鲜，如同从地狱回到人间。我们的任务是锄草、种苞谷、担大粪积肥、挖田坎、割麦子、打麦子等等。上面有规定：我们这些犯人不准和农民接触，但有时和农民配合在一起干活。可能是上面事先向农民也打了招呼，不准和劳教犯接触，因此，我们相互之间都不说话。

这是我参军以来，第一次和农民一起干活，四川和山东的农村农活有很多地方不一样。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人民公社”这个新鲜名词。报纸上大肆宣传它的优越性。但社员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并不是宣传的那样“被调动起来了”。我们所见到的农民实际情况和报纸所宣传的大相径庭。

这些社员本该早上8点钟上班，但直到9点钟，才稀稀拉拉来到工地上集合。有干部守着他们干活还可以，干部不在时就在田里“磨洋工”了，他们收工时间比我们早，收工后，回到家里就干自留

地，常常干到深更半夜，干得非常起劲，其实这才是他们的积极性。我们这些劳教分子早上6点钟起床，6点半吃完早饭就出工，干劲比农民高，这并不是我们的觉悟比农民高，而是因为我们之间相互监督，谁要是在工地上说了一些埋怨话，谁“磨洋工”，内部便有人会暗地里向上面打“小报告”，作为自己改造好，靠拢领导的具体表现。另外，我们每次上班，由队长（公安干部）跟着，严格监督之下，谁也不敢“磨洋工”。

我们队的队长叫邢国志，山西人，是个转业兵，此人文化程度很低，政策水平低下，管理方式简单粗暴。他对劳教分子开口就骂，举手就打，或者不给饭吃。在那个年代里，劳教犯就靠这点吃了半饥不饱的饭来维持生命，用扣饭作为惩罚手段太惨无人道，是要命的。

邢国志经常在上工时借我的手表掌握时间，有一次，他把我的手表弄坏了，也不说一声就还给我。我有苦难言，不敢吭声。过了几天他装作不知又来借。我说：“上次你借去弄坏了，不能走了。”我话音刚落，他对我一顿拳打脚踢。这是我跟着共产党十多年第一次挨打，我痛恨自己失去了人身自由和做人的权利、尊严。邢国志只是一个转业兵，如果过去在军队上，让他给我当通讯兵，我都不会要，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右派”分子不如狗，狗还有主人的保护，我无可奈何地仰天长叹，天啊！我的祖宗三代没有做伤天害理的缺德事，我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连狗都不如！

“支农”不同于“大炼钢铁”，季节性强，为了抢季节，不分白天黑夜打“突击战”，有时候，夜里打着火把干到天亮。对此我并不感到可怕，可怕的是饥饿。劳教犯们长时期高强度劳动，外加吃不饱，身体很虚弱。那时，一天到晚只想吃东西，人的七情六欲中的其它“欲”都没有了，只有“食欲”。为了填饱肚子，大家向房东买了一些晒干了喂猪的老白菜叶子（每斤3角钱），或在田里干活时，顺手挖点野菜，用洗脸盆煮了吃。这样越吃，人浑身越无力，生病的人也越来越多。

我们班有一个名叫郭铭新的教师“右派”，我们俩的关系较好。有一天，他流着眼泪对我说：“老王啊！这样下去，我恐怕活不出来了，与其活受罪，不如死了算了。”他上气不接下气说完后，两只泪眼一直盯着我。不久他病倒了，因为吃烂菜叶子，又拉肚子，甚至拉在铺上……

我也生病了，有一天在工地上我突然晕倒在田里，邓科长见我实在不行了，叫我回宿舍休息，并告诫我说：“王开泰呀，不要再乱吃东西了，这样要死人的！”后来，邓科长指定一位年轻的，身体较好的同学廖明俊来接替我当组长，并把全部老弱病号临时集中起来，叫我负责，能干多少就干多少，不强求。在我的生命危急关头，我听了邓科长的告诫不敢再乱吃东西了，加上又降低了体力劳动的消耗，那时我年轻，生命力强，身体慢慢恢复了。邓科长减轻了我的苦役，还多次表扬我，说我带病积极改造，后来还评选我为全队的劳教分子“标兵”上报厂部。在我危难时刻，邓科长救了我一命，至今难忘。

农民中有人知道了我过去是南下的老革命，被打成了“右派”。一些农民把我看成是个“大官”，因为他们的县长和县委书记等大官，才是南下的老革命。他们对我有点好奇，一些男男女女见到我时互相交头接耳，指指点点地望着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同时也感到很羞愧。

有一次，一位青年农民悄悄对我说：“我对你恨不起来，你是因为提了意见而被打成‘右派’的。”我听了这句话，大吃一惊，感到不可思议，一个普通农民，竟能说出这种很有见解的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农民为“右派”喊冤，很受感动。

我说：“你们总比我们好吧？”他回答：“我和你说老实话，我们主要是吃不饱，你们吃的是国家‘商品粮’，每月几十斤供给有保证，我们那点口粮，根本不够吃，只有靠自留地的那点菜来当家。”难道我们劳教分子还比农民生活好？我难以理解，后来，我的亲身经历回答了这个问题。

6月1日，我们离开了和平管区，去二十几里以外的新华管区“突击收割麦子”。

初夏季节，我们沿着大渡河进发，一路上青山绿水，风光十分美丽。

上午10点半，我们到达了新华管区的一个生产队。在休息时我有幸第一次见到了久慕大名吃饭不要钱的新生事物——公共食堂。引起我的好奇心而注意观察。

11点半钟，食堂的钟声敲响了，农民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食堂涌来，有的人从几里远的地方，拖儿带女，提着篮子前来吃饭，有的人就地吃了后，还带着饭罐回去给家里的老人、病人吃。粮食的分配是按照大人、小孩定量，每人一罐饭。一时间，食堂里里外外，到处是吃饭的人堆，场面十分嘈杂。从人群面孔上的表情来看，对这个“新生事物”没有欢乐的气氛。

下午，我们在离生产大队几里路远的一个农民家住下。四川农村与北方农村不同，无论是在山间还是平原，零零落落的三、五家或一、两家人就是一个村落。

在新华管区劳动期间，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一件事是母子争饭吃。

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天不亮就被房东大嫂的吵骂声和小孩的哭喊声惊醒。弄得大家心里很烦恼，后来一打听，原来房东大嫂每天派她的约八、九岁的小男孩去几里外的公共食堂把饭打回来，哪知小孩在路上，拿着这两罐饭，一路走，一路用手抓着吃，到家时，只剩下两个空罐子，气得她把小孩痛打一顿，打得小孩又哭又叫，当场认错，下次再也不敢了。可是第二天早上，孩子在路上照样又把饭偷吃光了。我很可怜那个小孩，也很可怜那位大嫂，这到底是谁造成的？

另一件事是一家一天饿死两个人。6月5日中午，在另一个工地，当我们收工回来时，一进院子听见屋里传出哭叫声。原来是房东两兄弟同时在这天上午饿死了。院子里很多人，只见有两个大队的干部，带着鸡蛋、糕点前来慰问。他们刚走进屋去，院子里一个青年农民怒骂说：“他妈的！这顶他妈个迷用！人都已经饿死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一家人在同一天饿死了两个人的悲惨情景。

但那时，谁也不敢说“饿死”二字，因为社会主义“没有”饿死人的这种事情，只能说是病死，这和我们劳教队里的情况何其相似！通过这次支援农业，我发现农村也是所到之处，民有饥色，野有新坟。我很不理解我目睹的一切，可报纸上和广播里的宣传却是：人民沉浸在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的幸福中。

我仍然担心，这种悲剧哪一天会落到我的头上。

7月1日，上面宣布“支农”工作结束，全体劳教分子返回厂部。

我庆幸又活着走出了第二道“鬼门关”。

在76天的“支农”中，我最大的收获是能接触到厂部有关领导，加深了厂部管教科邓副科长对我的了解，因为他是决定我能否解除劳教最有发言权的人。

（节录自作者长篇回忆录《我当右派22年》。现题目是本刊另拟的。）

阎简弼老师受难42周年祭

倪艮山

4月22日是阎简弼老师受难的忌辰。转瞬间他已逝世42年了。多年来，虽然我的人生跌宕沉浮，但阎师的音容笑貌仍时常浮映脑海，已成为无尽的思念。

阎师1911年11月10日生于河北正定。在家乡读完私塾、小学后，负笈北平，先后就读四存中学、公立四中。1935年8月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成绩优异，连续三年获哈佛—燕京奖学金第一名。本科毕业后，1939年考入研究院，师从陆志韦，读硕士生。1941年得硕士学位。1945年燕大复校后，在燕大中文系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留北大任中文系副教授。1958年调往沈阳，先后在沈阳师范学院、辽宁大学任教。

阎师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学养深厚。教书育人，业绩斐然。他是我国著名文史学者、书法家、诗词评论家。著有《唐诗选注》、《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等；此外在《燕京学报》、《文学年报》、《文学遗产》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还有译文面世。

我与阎师相识、相知，并建立深厚情谊，始于国家多难之秋。1945年我考入燕大。当年入学新生多，分几个班。大一国文由数位老师执教。我的国文老师是刘子健先生。我的室友张世樑同学，国文巧遇阎简弼老师。他说，同学们对阎师的课很感兴趣，他授课开放，涉及范围广泛；善解学生心理；有时也谈到时局形势。当时国共内战方酣，他心情沉重，有一次曾痛陈国事不可为了！在同学面前潸然泪下。同学们无不为之动容。当时我虽尚未接触阎师，但已心仪仰慕。

那时，我虽对燕大已有很深感情，但因家庭经济困难，能否读完四年，毫无信心。有时情绪波动。一些同学在贝公楼张贴个人心事意见，我也以“征”为题，写出自己想闯“大西北”的小字报，这引起了阎师的关注。他按文索骥，找到我与我谈心，表示愿尽量设法帮助我解决经济困难。我从此开始了与阎师的交往。

1946年寒假，他给我安排一项自助工作，用毛笔誊写陆校长的《五方元音》书稿。我每天去他的办公室抄写。他阅卷备课。师生共处一个寒假。其后他又安排我为其女儿肖曼补习中学数学。煞费苦心为我缓解经济困难。也使我更多地接触阎家。当时我在平津报刊发表小稿后，有时也拿给阎师请教，使我获益匪浅。

当年正值内战趋紧，关内外铁路中断。我无法回沈阳探亲。寒暑假只好留住学校。赶上农历新年，阎师总要邀我去其家吃年夜饭，待如家人，得享亲情温暖，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在张秀珍等同学创办的晨光义校中，我任中学部主任。我组织学生在四楼食堂北，修建小操场，命名“劳动广场”，特请阎师用木板书写题记，钉在场边树上，以志纪念。

大三时，赶上阎师开《词选》课。我和许多同学选修，得以亲聆教诲。阎师对国学和古典文学有渊博功底，自编讲义，油印发给同学。讲课时，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不时穿插一些历史逸闻趣事，妙语连珠，引人入胜。我不仅读了词作，还获得许多相关知识。期末，每人交一份心得报告，代替刻板考试。他对我的报告很满意，给了9分。

1949年夏，我毕业离校，分配到沈阳东北计委工作。从报上看到，燕大通知领取毕业证书。我即写信求助阎师代领。他把毕业证书邮给我，珍藏至今。

1953年初，我调国家计委后，即去燕园看望阎师。在海淀买了一些食品，作为见面薄礼，略表弟子之情。到阎家后，看到阎师和师母身体还好。但感觉阎师精神悒郁，话语不多。可能由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对他刺激过重，尚未缓过来。师母做了炸元宵相待。饭后他流露了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看法，透露校长、教授受批斗的点滴情况。有的学生在批斗会中野蛮嚎叫：“陆志韦！我揪掉你的脑袋！”解放前尊师重道和燕大一家教育精神熏陶过来的人，无法忍受这种粗暴斗争。他谈及这些，倍显忧伤而歔嘘。我未经受这一运动，听了不胜惊骇。

以后，我又到燕园看望阎师两三次，总感觉他心事重重，一扫过去那样开朗直率和感情奔放，显得深沉持重，时常欲言又止。看来精神压抑，似有难言之痛。我不便过细打听其心事。在危机四伏的年代，人们之间已难以坦诚交流和互相沟通了。离燕园归来，仿佛心头压上沉甸甸铅块。想不到，这竟是我与阎师最后相处的时日，而成了永诀。呜呼！

1955年反胡风之后，我在肃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批斗，有一年时间失掉自由。接着1957年又在整风运动中落入反右陷阱。厄运如影随形，苦难缠身。虽然担心阎师的处境，但自顾不暇，又怕株连影响，从此就没再去燕园看望阎师。

1958年我被流放到黑龙江北大荒。后来知道阎师也在这年调到沈阳，先后在沈阳师范学院和辽宁大学任教。1961年我重新分配到辽宁阜新市新邱露天煤矿工作。这时我和阎师同在辽宁，咫尺天涯，互不知情。

有次我回沈阳探亲，在中山路经过一处书法展，顺便进去观赏，竟发现一副阎师手书对联，字迹苍遒挺拔，使我倍感亲切，如睹吾师，留恋不忍离去。以后又在辽宁日报“鸭绿江”副刊上，读到阎师几篇诗词研究文章。我有种预感，阎师可能已转到辽宁，也许就在沈阳。但考虑政治环境险恶，自

己又是摘帽右派，自惭形秽无颜寻索探访阎师。

文革中，我从牛棚幸存下来，旋被下放彰武县矿办农场走“五七道路”劳动。有天放牛时，在林荫下独自偷读英文版《毛主席语录》，不料有人从背后上来拍我肩头，我吃了一惊。回头一看，是公社中学的张老师。我听说他是辽大毕业的，顺便向他打听，是否知道阎简弼老师，他说阎师在辽大执教，是先秦文学权威。我这才知道阎师的下落。然而时值文革恐怖年代，相互间如隔条政治银河，我没有勇气和阎师联系。

直到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我的右派已被改正，我才敢于写信问候阎师。过了两个多月，信被退回，上面批条，有四个歪歪扭扭字迹：“此人已死”。我如受到沉重一击，颓然瘫坐炕上，久久缓不过神来。这个噩耗是否准确，虽有疑惑，无法查证。我曾仰天浩叹：“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

1979年，我调来京畿，与母校校友会取得联系，从《燕大校友通讯》上李嘉熙等校友回忆文章里以及其它方面资讯，才了解一些阎师在辽大的最后岁月。阎师到辽大后，不幸师母病逝。阎师又续弦一位宋医生。在教学上以博学多才，赢得校方器重，深受学生欢迎。然而英才遭嫉，树大招风，在文革被批斗凌辱，心灵受到重创。内心郁积许多难以向人倾诉的委屈和痛苦，曾在冬夜去北陵（清皇太极陵）哭陵。在严寒中昏迷过去（有一说吞服了安眠药片）。待被家人寻到，人虽苏醒，但手指严重冻伤坏死，截去八指，落下严重残疾。

在1968年的群众专政中，阎师又受到残酷迫害。于一次批斗大会上，有个辽大学生狠踢阎师腹部，几个打人凶手蜂拥而上，群脚乱踢，致肠子被踢断（一说阎师看大字报时，表态不慎，被身旁学生狠踢重伤）。送到医院后，又得不到及时认真医疗。于1968年4月22日在沈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含冤惨烈逝世，时年仅57岁。一代学界英才大师，魂断辽大，惨死于文革。壮志未酬，遗恨难消。阎师辞世后，其生前重金收购珍藏的《四部丛刊》、《知不足斋丛书》等典籍，据闻存于辽大中文系资料室。阎师生于辛亥革命之年，迎接民主共和而来；卒于文化大革命之期，受难于极权专制而去。代表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和悲哀。呜乎！吾师在燕大时期，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教书育人，业绩卓著；惜乎好景短暂。迨1949年国家易帜，从此苦难缠身，迭遭乖舛；前程遽毁，惨死关东，家破人亡。恨黑夜何其漫长！想燕大时期，政治民主，学术自由；吾师如鱼得水。其后则极权专制，罢黜百家，独尊马列；师道辱没，教育陵替；吾师终难逃浩劫。吾师何其不幸而生不逢时！我为吾师一哭！

呜乎！吾师经纶满腹，学富五车；治学严谨，勤奋刻苦；诚为不可多得的学者。如果毕生处于燕大环境，或任何民主进步社会，必将著作等身，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然而不幸身陷野蛮社会，蔑视知识，仇嫉学者，视文明如粪土。致吾师多年学术积累毁于暴力，无果而终。吾师何以生不得其所！？我为吾师再哭！

呜乎！吾师人品正直热情，慷慨好义，行善积德，索取少而奉献多；不愧为世人楷模；应有善报善终。然而竟不见容于“新时代”，被践踏于野兽之群。不幸惨死他乡。吾师命运何其乖蹇！天道何以仇善媚恶，不公不正一至于此！？使我承师恩而不及报答，遗憾终身！我为吾师三哭！

余音。据悉，辽海出版社的马千里先生，系中年学子，与阎师未曾谋面，但景仰阎师学养与人品，刻意收集整理阎师著作，拟出版其文集。经探访国内几家出版社，均以效益为由婉拒。他决心到海外出版，或自费出版。马先生的真知灼见与义举，令人无比钦敬。我多年来即有此心愿，但无力进行。今由马先生玉成其事，使我铭感至深。如果阎师的文集能够出版，其心血结晶与学术成果得以留传后世，充实丰富华夏文史遗产，阎师在天之灵有知，可以欣然告慰了。安息吧，敬爱的阎师！阿门！

2010年4月22日于燕郊

右派·老干部·艺术家

——缅怀父亲宋清涛

宋晓涛

想为父亲写篇回忆文字，真拿起笔来，还有点犯难。不是笔力不逮，而是算起来这辈子我和父亲朝夕相处的时间不到十年（1953年我从上海迁转重庆来到南下的父亲身边，父亲1960年下放劳动改造三年，我1964年初中毕业离家下乡一去就是三十年），而那又是我不太记事的中小学时代，担心对父亲生活和经历的回忆不完整、不精确留下遗憾。我也看到不少和我同样经历的子女们以严谨的态度采访友人、搜集资料后对父辈生活很详实的记述，我十分钦佩，但我肯定达不到这样的采写水平。后来想了想，既然回忆不完整、不精确，那就写点零碎的真实的——我爸有句话“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刻在他的墓碑上——既然是真实的，就不会对不起老爸的在天之灵。

（右图：宋清涛遗照）

我细细回忆了一下爸爸这辈子给我的印象，脑子里老蹦出“右派”“老干部”“艺术家”这样三个词儿。这既是不同时期社会赋予他的几个称谓，也是他人生遭遇的统一体，很能概括他的历史。那就让我细细说说这些词儿和印象是怎么印刻于我心中的吧……

右派

为什么先说“右派”呢？因为我爸被打为“右派”时，我稍稍懂事有记忆。加之我们家庭作为“右派家属”一直受到社会的监视和歧视，全家人背负着这个名份数十年，身心受累，烙印深重。我小学毕业就因为“家庭问题”而被拒绝进入公办中学，只能去半工半读的民办中学就读。若干年来，我在学校或农村因为“政审”而填报《履历表》时，在家庭成分或父亲“政治面貌”这一栏中，我只能填写“右派”这个词，所以它给我的印象和刺激特别深。

父亲是怎么成为“右派”的呢？我若干年前是不知道的。

我生于南京，长于上海，一岁的时候，被全托在上海的中国福利会幼儿园。听我奶奶说，那是新中国最好的幼儿园。宋庆龄是我们的名誉院长，宋奶奶还抱着我合过影。

我父母在上海是国立剧专剧团的演员。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7月，我爸参军随二野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解放大西南，后来就留在了重庆，组建了重庆市文工团。几年后，父母因感情不合离异，我和二姐晓慧离开了在上海的妈妈和大姐，随奶奶乘船抵渝，跟了爸爸。

爸爸那会儿春风得意，我和二姐自然成了全团的宠儿。那会儿谁会想象我们日后竟会坎坷大半生？

1957年反右那会儿我9岁，刚识字，不谙事。家住枇杷山公园山顶的蓄水池旁，往下两层台阶是一幢偌大单独的室内排练场，我第一次看见大鸣大放的“大字报”就是在这排练场的室外墙上。那天我放学回家，忽然看见很多叔叔阿姨围在这排练场的外面，墙上齐刷刷白纸黑字的大字报，有人贴，有人看。人们议论纷纷，我们几个小孩很兴奋地在这些情绪激昂的大人间穿梭，像过节一样。我至今还能回忆起我爸那张大字报所贴的位置，在排练场背后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是我好不容易寻着我



爸名字找了半天才发现的。我完全看不懂文字内容，多少年后听我爸说，大概是说“领导应该学习成为内行”。

反右斗争的过程和内容对于我们小孩是没多大记忆的。有印象的是，当时叫“整风”，不叫“反右”，说“大鸣大放”就是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出来帮助共产党整风，早些年在延安的时候就帮助共产党整过风，共产党欢迎群众提意见。结果，后来不少提意见的人改称“右派”了，大家唱歌，有一句“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知道右派分子是反社会主义的坏蛋。

我们家和坏蛋是不沾边的，所以“整风”的当年我家没有事。第二年1958年也没有事。这一年，位于解放碑保安路的西南人民艺术剧院话剧队迁往成都组建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将自身的歌剧队与重庆市文工团的歌舞队合并，组建新的重庆市歌舞剧团。原重庆市文工团的话剧队，单独组建重庆市话剧团。我爸以前在市文工团搞话剧，也搞歌舞，这样，既然要组建歌舞剧团，就让他带着歌舞队合并过来，并担任艺委会主任，把握艺术质量。于是我们搬家来到了保安路（后改称八一路）。

我爸喜欢导演歌舞剧，过去在市文工团时排过苏联的儿童歌舞剧《小白兔》，这次来到歌舞剧团首先就排了新潮歌剧《小二黑结婚》，1959年5月参加全国歌剧调演还拿了奖。

始料不及的是，我爸命运会在顷刻改变，家庭前途会在霎时断送。

1959年7月，我爸被划为“右派分子”，我们一下子成了“右派家属”。

本来，“反右运动”在1958年夏已经结束，他原本没事儿。1959年5月他带团去北京参加全国歌剧调演，因获奖还评了全团标兵。但谁料想人缘特好的他忽然间就被定为“右派分子”。

这年我11岁，我亲眼见到对我父亲“组织处分”时的张榜情形。

一天深夜醒来，身边的奶奶不见了，忽听单层木板相隔的爸爸房里传来奶奶和我妈压低的哭泣声。二姐猜测说，家里肯定出了事。

第二天清早，我拎着饭锅去市歌舞剧团食堂打早饭，路过院子里的公布栏时，见二人正将一张“……撤销艺委会主任职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降薪三级处分”的白榜，换下了那张“……因导演歌剧《小二黑结婚》在全国调演中获奖，被评为全团标兵”的红榜。

我当时脑海轰然一下成了空白：我爸“标兵”怎么顷刻就成了“右派”成了坏蛋？“红的”怎么立马就变成了“黑的”？

这个疑问涉及的层面实在太多，当时没人能回答我。

之后，我爸被送到百里之遥的南桐矿区和长寿湖渔场“劳动改造”3年之久，收回团里之后“戴帽”洗厕所拉板车长达22年。

事后，听说我爸是被补划的，原因是在审看剧目时他顶撞了文化局局长，说了句“不懂不要装懂！”当然，在中国的官场，公然顶撞上级领导是要吃大亏的。但我爸最大的悲剧还在于：22年后获得平反，而在各类组织档案里竟然找不到任何一纸有关对他“定性右派”的组织文件！

后来平反的工作组说，很多迹象表明这是个奇冤：宋清涛既不是党员也不是领导，1959年的党内“反右倾”应该与他不沾边。而全国在1958年夏就已经结束划右派，当年秋天中央内部提出开始给部分右派分子摘帽，这“摘帽”同1959年十年国庆特赦战犯一起是作为当局的重要形象工程的，那么在1959年7月也就是十年大庆前还来“补划”给他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就绝对是局长泄私愤的个人行为而非组织意见了（让我难过的是后来知晓这位局长曾经是他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的带队领导，他们曾经作为战友生死与共。这位局长曾经著文说“我文化太低，只上了五年小学。而西南服务团政治部副主任说，我们在带民工团的干部中找来找去，你的文化还算高的，又不是叫你去长期干那个工作，反正是带队嘛，把文艺大队这些文化人带到重庆你就算完成了任务。我当时还有点不通，没有办法，只得服从。”既然这位后来担任团长和局长的大人完全有“文化不高”的自知之明，那人家说你一句“不懂不要装懂”也是有理有据，何以因此泄私愤将同志视为敌人、置于死地？简单的解释只能是权力膨胀、心胸狭窄。后来我知道，这是一场灾难，是中央的“扩大化”，该负责任的不是

下面这些小人物。)

由于没有组织处分文件，因此，平反落实政策也无从谈起，22年的不白之冤（从38岁到60岁的整个人生的黄金壮年被耗掉）就不了了之。

而我呢，从早先在上海中国福利会幼儿院被宋庆龄奶奶时时搂抱的幸福记忆中，一下子跌落到“右派分子狗崽子”的惊悚里，天堂地狱，翻覆于顷刻之间。

两年后小学毕业，我因“家庭问题”没能进入公办中学，而是被分配到半工半读的民办中学。

我爸1959年底—1963年送去“劳动改造”三年，先是在南桐矿区两河公社坪上修筑堰塘，后又转送长寿湖渔场的采石场生产队。这三年正值国家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天灾人祸，物质匮乏，好多地方都传出全村人饿死的可怕音讯。我们一听到这样的消息，马上就会联想我爸“劳动改造”中也正在忍受“饥饿之苦”。当时居民口粮定量每月22斤；中学生吃“长饭”，定量30斤；我刚读上民办中学，因是半工半读，国家政策规定我们要比普通公办中学学生定量高出2斤，吃32斤，以满足我们劳作之需。家里担心我爸会饿垮，所以每月我们要为爸爸省出20斤粮票寄给爸爸，其中我个人省出10斤，其余的由奶奶妈妈和姐姐凑足，这一切都由奶奶和妈妈操办。这样一来，我经常是早上喝一碗稀饭去上课，当临近第三课时，早已是饥肠辘辘，有的时候因饥饿竟然耳鸣眼花，看着老师讲课，却觉得老师飘飘欲仙不知所云，已经饿得有了虚幻之影。还有深夜在印刷厂半工半读缝制笔记本，心慌意乱只想着早点天亮能吃到工厂食堂的稀饭馒头。我中学时代非常瘦弱，人称“干豇豆”，就是因为饭量不够营养不足。

1961年春，我爸“劳动改造”两年被允许回家一次。当时爸爸已经全身浮肿，胳膊和大腿一按一个窝，都知道是缺乏营养和食盐过多（以盐当菜）。这次爸爸偷偷去相馆照了张像，后来问他都这模样了为何要照这张像？他说为“历史”存照。我现在更愿意相信是他见到身边死人太多而为自己提前留存的“遗照”（见题图照片）。

爸爸是1962年被收回重庆歌舞剧团团部的。最近听妈妈说，是团长吴毅作好人，在文化局里力排众议，以团里没有人办宣传专栏和修理水管的理由，把宋清涛调回了重庆。从此他干起了办专栏和拉车修管扫厕所之类的活计，也许这才让我爸脱离困境免于一死，因为与他同去“劳动改造”的人员因各种原因死了不少。我一个同学的父亲就死在那里，连尸骨也不知埋在何处。我爸爸回团一年后被解除了“劳动改造”，但是依然干着辛苦的劳作，不会允许他参与艺术活动。

1964年我初三的下学期，除了备考，就是为升学考高中作准备。

准备之一，就是报考前填写《履历表》，其中，“直系亲属的政历”、“个人的态度”等栏，每次填写，都需要杜撰。为一个小小的报考志愿去“痛说革命家史”，这是最让我难受的。

我填写的所有文字内容，都是我奶奶口述的。

我奶奶从小在南京金陵兵工厂捡煤炭花，15岁出嫁，没文化。让人敬佩的是，她在解放初期新中国妇女扫盲运动中，硬是靠刻苦努力，仅用半年的时间，达到了小学四年级的识字水平，创造了新中国妇女学文化的奇迹。她因此被《中国妇女》杂志选作1952年2月号封底人物（那一期杂志武汉杂技团的著名演员夏菊花为封面人物），后又因此被选作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长安兵工厂和市歌舞剧团的家属主任委员，因此练就了她的口才和文才。

我爸被打入另册，我奶奶也入了另类，她的口才和文才，仅仅体现在指导我填写履历表上。

她说，你爸出生工人阶级家庭，早先在金陵兵工厂技校当学徒，16岁在引信部做工。1937年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全家随金陵兵工厂（后改称456兵工厂）迁往重庆。当时国立剧专正在重庆招生，你爸你妈都以同等学历考上，在剧专学习三年后毕业并留在了剧专剧团。抗战胜利后我们又回到南京和上海。你爸1949年参军南下又来了重庆。

她还说，虽然你爸出生光荣，但我们家现在是“右派家属”，没法抬头，但说话填表，要站在批判“右派”的立场上，用“批判”把你和你爸隔离开，因为你的前程还没有开始啊！在填写你爸解放

前接触过的单位时，必得加上一个“伪”字，如：伪金陵兵工厂、伪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伪剧专校友剧团……在谈及你爸的“错误性质”时，要用“忘本”、“资产阶级思想”、“反党反人民”、“与人民为敌”……在谈及组织对你爸的处分时，要说“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奶奶的话语在我的笔下慢慢变成了文字。我填着填着，忽然听不到奶奶说话了，抬头一看，只见长长的泪水在她老人家苍然的脸上流淌……

我轻轻问，真是“罪有应得”吗？

奶奶一下子抱住我的头，哭出声来。可是，三两声后，她又断然打住，惊诧的眼神四下探视，唯恐被人发现“不满的情绪”（不敢哭啊）……

她轻声抽泣说，几千年了，一人有罪，满门抄斩……

我奶奶是一个小脚的旧式妇女，一肚子旧时代的故事，她特别担心我会因我爸的“株连”而断了前程。

正是因为奶奶的思绪，我每每在履历表的填写上，总是把她的过激的批判、尖刻的断语统统纳入其中，俨然一篇向我爸声讨的檄文。

奶奶说，只有这样，才能向组织证明你与你爸划清了界限，你才可能得到组织信任，你才可能有前途。

但是，每次填写，都是一次心灵的颤栗。我不敢让我爸看见我填写的内容，老远听见他的脚步声，我会慌忙藏起履历表，当他离开后我再次提笔时，我会发现我的手抖个不停——心在战栗啊！我感觉我在出卖父亲，像叛徒出卖灵魂保命那样保自己的前程，我心虚呀！可久而久之，填写多了，形成定式，心灵也就麻木了。到后来，我已经分不清哪些是奶奶的、哪些是我的，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违心的了。

可是，尽管经历了这样痛苦的心灵炼狱，1964年，我收到的依然是《不录取通知书》。后来才知道，当时早有暗中下达的政策将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打入另册，不得升学。

其实，我早有预感，因为早一年的1963年，我二姐就收到《不录取通知书》。

二姐晓慧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重庆十九中学广播站站长（广播站就她一人），那会儿学校没有唱片，一部《洪湖赤卫队》歌剧，是她每天三遍亲口清唱让师生一饱耳福，至今她母校的老师提起她，谁不是啧啧赞誉？她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打击？于是她索性当月就向街道申请，到云南省最边远的个旧市“支边”去了。全校高中部就她一人远走高飞，可以想见她心灵的痛楚。

不得升学，还必须下乡。我在江北我伯父家排遣我心中郁闷时，我爸给我写了封信，因为动员我这个应届的落榜生上山下乡的居民代表就坐在家里等待我们的表态呢。

“去吧，跟你姐一样，没法子的事儿！”“劳动改造”已回歌舞剧团扫了两年厕所的爸爸说这话时，我第一次见他在我面前揉擦湿润的眼眶，他甚至弯下腰佝偻着身子，让我猛然觉得他仿佛要给我跪下，弄得我热血冲顶，跳荡的心像要堵住嗓门了。

我心底清楚，我是“五类分子子女”——“没有继续上学的权利”，“必须上山下乡离开城市”。

这样的安排对“五类分子”家庭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当局正在贯彻强硬的阶级路线。

阶级？我们家以前祖祖辈辈可都是光荣的无产阶级啊！

只是，一顶“右派”的帽子改变了这一切。

实在说，我下乡时没有那么多的愤愤然，我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二姐在我头里也上不了学，我能不一样吗？况且，二姐走得那么远，而我只到大巴山，算幸运的。

再说，还有那么多“同类”，一大拨人，这是“黑五类”子女的命，我认。就这样，我打小从上海来到重庆后，和我爸相处不到十年（其中他还去“劳动改造”了三年），就背井离乡去了大巴山偏僻农村的社办林场当知青，这一去就是三十年。

1966年“文革”中，因为动乱，年底我曾经从农村回到重庆家中呆过一段时间，其间见识过我

爸的一些生活。

我们家庭自从我爸划为右派后就被逐出剧团家属院，在排练厅后门的一个车库旁格出了两件木板房，每间9平米，爸妈住一间，我们5姊妹加奶奶6人共一间。邻居是炊事员谢师傅一家，每每还受到他们家的鄙夷——人家可是工人阶级呀！

但是这房子当街，人员进出不必避人耳目，进出自由。于是，我们家就成了歌舞剧团右派们常来常往的地方。有书法极棒患肺结核的青年人赖飞；有给舞蹈队练功弹钢琴伴奏的娇小玲珑上海人邱令贻；有满腹牢骚、口无遮拦的郑波文；有小心谨慎的歌剧演员王文浩和龚巴邨。还有一些其他文艺单位如川剧团、出版社的右派们也都来过。他们都是聚集在爸妈那个房间闲聊，我听不到也不在意他们都说些什么。只有那么几次，我还有点印象。

一次是这拨右派要外出劳动在我家集中。郑波文本身就是五大三粗的不修边幅，穿得破破烂烂的。而青年人赖飞好面子穿得抖抖抖抖不愿掉身价。郑波文嘲笑赖飞说，别穷酸了，你小子穿这一身人家革命的会不高兴。赖飞说我不为谁穿，干干净净我自己高兴。两人你一句我一句争执不休。我爸原本也是一个好面子穷讲究的人，在着装的审美上一向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和高见，对美与丑从不苟合。他突然插话说，“这年头，干干净净说你小资产阶级，破破烂烂才是无产阶级，劳动改造当苦力，生活就是一部戏。”于是我爸把他自己的一条皱巴巴的毛巾给赖飞脖子搭上说，“过去提艺术要生活化，现在生活也要艺术化，我来艺术化一下，你看，这毛巾一搭，小资产阶级就变成普通劳动者了。”而我爸呢，则将另一条我妈使用的花头巾系在腰间，一副怪相。我当时说了一句“这太不伦不类了”，没想到我爸陡然吼叫起来：“不伦不类就是当今的时髦！如今社会的美与丑是颠倒的！颠倒的！！颠倒的！！！”他的高言大语，突然让我感到惊愕，我猜想，郁愤在他心中压抑太久了，心态已经扭曲，他难得发泄一次。

那会儿造反派经常要批斗靠边站的“走资派”（单位原领导），要命的是，原“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作为“牛鬼蛇神”要陪斗。陪斗的时候，所有人脖子上都要挂一块牌子，注明谁谁谁是哪类分子，陪斗完毕，还得一块儿游街示众，让这些人“斯文扫地、颜面尽失”。我爸那会儿因为“改造认真”已经“提升”为“牛队”领班，即由他召集、点名、检查挂牌，还“一二一”的念口令踏齐步赴杀场，可以想见这些羞辱对于这拨人灵魂的折磨。批斗完毕，这一群右派来到我们家，对“陪斗”议论纷纷。这一年，中国在沿海打下了美国的U2型高空无人侦察机，人民日报登载了消息，解放军三总部颁布嘉奖令。忽然听得我爸说：“要是我们这拨人哪天也打下这么一架U2型飞机，那我们就出头了！”大家哈哈笑笑，只当笑话听。我无意间看了我爸一眼，却发现他在揉眼睛，仔细看时，他却是在流眼泪。我当时心中一颤，无言相对——我爸此言的潜台词不外是：我们怎么可能打下U2飞机？我们怎能有出头之日？！此言道出人生的迷茫和失望，我爸心灵的痛苦，我感同身受。

沉重的政治帽子，不仅压抑着我爸这些知识分子，还咬噬着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幼小的心灵。背负着父辈的原罪，我们自认“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无时无刻都在用“改造”扭曲自己的灵魂。1964年上山下乡后，我发誓要好好“过三关”，三年不回重庆家里，以表明革命的坚定性。

已经过了两年半了，尽管家里也曾让我回家过年，我都拒绝了。1966年2月10日晚上，我突然接到爸爸的一封紧急信件，说奶奶病了，要我火速赶回重庆。我开先有些怀疑和犹豫，追问再三，连夜把紧急信件送上山的干部拿出了我爸写给公社党组织给我请假的信，另有一封云南发给重庆我奶奶的电报。

我一看，顿时天旋地转，瘫软在地——

电报说，宋晓慧同志（我二姐）已于2月5日死于云南东川的大地震（她当时在东川小江农场任技术员）。

第二天，我在摇晃的返渝汽车上神情恍惚。车上，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首诗。今天我又翻看它，真该为当时扭曲的心灵而深深忏悔：

姐姐，你睡吧！
还有什么事儿心中挂？
只要我当弟弟的力所能及，
我一定给你作解答。
是不是穷白没抛掉？
是不是理想未到达？
这个你千万放下心，
几辈辈以后保证是个新中华。

.....

我失去了最最爱我的胞姐，我恨云南，我恨东川，我恨支边，我恨上山下乡。我心里这么想，可笔下敢写吗？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是，什么时候了？什么样的心境下？我居然“化悲痛为力量”，大写特写“革命打油诗”。

奶奶已经因悲伤倒床不起。爸爸申请赴云南奔丧被组织拒绝，只能在家里点上两支蜡烛，为姐姐写了一张灵牌，他跪在前边，我跪在后面，重重地向姐姐灵位磕头。爸爸号啕大哭，打头捶胸，不能自己，我知道他在自责，他把自己认作是全家的“罪魁祸首”。

只待了一周，我就急急回到了林场。不少知青为了给我安慰，半道上来接我。可我“坚强”得像没事一样——我心里暗自说“我战胜了自己”，“我成熟了”。

罪孽呀！这“右派”帽子，不仅扭曲了我们的命运，也扭曲了我们的灵魂。不仅是我们的父辈，还有我们儿辈。我们的大半生都笼罩于这罪孽的阴影里。

我爸是不幸的，但又不幸中幸运的一——因为他没有在这场灾难中丢命。而我后来知道，五十五万右派分子中丢命的不少。现在人们说，反右是把一切发表过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人，通过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并剥夺公民权利的方法，实施群众专政的手段加以管束和迫害，它使几百万人的尊严丧失殆尽，使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备受煎熬和摧残，使他们中许多人夭亡。作为经历者，我们感受了。尽管现在的党史依然称“反右是正确的，只是后期扩大化了”，但我相信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随着民主进程的深入，终会有对它全盘否定的那一天。

老干部

我知道我爸南下参加二野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是演员、导演、艺术家，搞宣传的。我压根没有把他和“老干部”挂过钩，在我心中，“老干部”指的是“当官老党员”、“部队老革命”啊！

我爸1980年摘了帽（实际上因没有组织上给他“戴帽”的文件，“摘帽”也无从谈起，但可以算“平反”，恢复了政治和工资待遇），也到了六十岁退休年龄了。那以后的许多年里，我知道他在辛勤笔耕，创作剧本，但也没有感觉到“老干部”与不是党员不是官的他有多大关系。我远在大竹县，一般一年回家一次，与我爸相处不多。

好像就是那个时候开始，一些人和一些单位，对他开始以“老革命”、“老干部”相称，因为此时他被告知享受离休干部司局级待遇（在中国退休待遇是分级的，在不少人眼中似乎级高一档人高一等）。同时因为他著作较多，特别是他和诗人梁上泉共同创作的那部第一次介绍九寨沟瑰丽风景的电影《神奇的绿宝石》被北影厂摄制公映后，名声鹊起，有很多罩有一定光环的头衔向他送来：如江北区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工民主党江北区文艺支部委员等等。真应了那句“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老话。

开始感受他和“老干部”真有点密切关系的事由是：他开始撰写与己有关的“解放大西南”剧本和文章了，同时也听到他讲述的他们“南下的故事”了。

今天我重翻厚厚的《宋清涛剧作选》，看到那部电影文学剧本《路在荆棘中》，形象生动地讲述了

他们这一拨当年的进步青年如何在党的领导下一步步走过来。剧中的许多场景，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队队史》里记述的一样：上海外滩白渡桥、交通大学、市委大楼、大夏大学、天蟾大舞台、莘庄车站、京沪线火车、南京中山陵玄武湖、常德街头、茶洞山区、武隆公路、白马山、乌江、重庆。当年他们这样走来，现在我爸就这样写来。唯一不同的是，这部四集 143 章节的电影文学剧本运用的是今昔两个时空，第一、二集均名为“二百一十个日日夜夜”，明确讲述的是“南下故事”。第三、四集均名为“二十二个苦涩的春夏秋冬”，也明确地讲述部分南下干部是如何受到不公正待遇和如何度过的，我爸“右派经历”正好是二十二年，与故事完全契合。所以我爸在这部作品《路在荆棘中》名字后，显眼地注释一句——自传体电视小说，也明确地告知是根据他自己人生故事而编写的。编写的目的无非是还原历史、铭记历史。让我感慨的是，尽管作品中不乏对那段苦难岁月的描述和控诉，但主导精神却是：在党的抚育下走过来，并永远跟党走。充分说明他们这一代人是信奉共产党、忠于共产党的，而他们自己却不是共产党员。

我爸在《宋清涛剧作选》的篇末，以他写于 1996 年 3 月的一篇文章——《党指引我们一代青年前进》，代结束语。这篇文章主要回忆他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我将其有关内容抄录于下：

正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我想通过自己和我同龄人的切身体会，说明我们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及党的干部指引下前进的。我的祖籍是江苏南京，1937 年 12 月 13 日，在那潮湿阴冷的寒冬，我的家乡南京，被以华中方面司令官松井石根及侵华日军第六师团谷寿夫为首的日本侵略军占领了。紧接着日本法西斯又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我中华民族无辜的同胞，被杀害达 30 万人以上。鬼子在南京烧、杀、淫、掠，其凶残野蛮令人发指，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惨绝人寰、举世震惊的大惨案。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对我中华犯下的滔天罪行，它同纳粹德国一样，是世界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耻大辱。无论今天日本右派政党如何为自己暴行辩解、粉饰，那“美丽”的谎言，是永远也掩盖不了这一尽人皆知的血的事实。

当时我才 16 岁，是一兵工厂“技工学校”的学生。我于南京沦陷前三天，随师傅押运机器部，向大后方重庆进发。可是我的家人没有走掉。祖祖因拒绝给日本人挑鸡蛋被枪打死在大门口；同窗女友才 15 岁，遭日军轮奸后还惨无人道地用啤酒瓶插入下身阴道而死去。我全家逃至离南京九十多里的彭山躲避。听说那地方是新四军游击队区，小日本不敢去。后来家中房屋被烧，全家失去生计，不得不变卖家里一切财物，从上海乘船到香港，找到兵工厂办事处。因为我家是工厂老家属，这才辗转越南经昆明、再乘汽车来到重庆。从此一家人才得以团聚。

我到重庆后，在厂里遇到我第一个带路人，他是我表叔吴俊良、中共地下党员。他向我指出，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的抗日中坚力量。他还给我订了《新华日报》，当时订报非常便宜，工人只几角钱就可以订一个月。这时，我面临考什么学校深造的问题。我表叔给我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现在各地大专学校纷纷迁到内地重庆，可由你选择。如像机枪厂张主任侄子考入中央军校，那又怎么样呢？他以后充其量是可以成为一个师长或者军长吧，也不过才拥有三、五千人。你有戏剧方面的天赋，你小时候就为学校在电台演讲、唱戏还得过银盾的。我认为你应该考上清寺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尤其现在抗日需要宣传，亟需这种人才，你可以拥有千千万万的观众……”我就是在表叔语重心长的引导下，才考入国立剧专，它奠定了我一生的戏剧道路。

我进入剧专是该校第四届学生（重庆是第一届），正值第二届老大哥毕业之际，我有幸与进步同学王大化、骆文、万流、冯金同寝室。他们非常喜欢我这个小小弟弟，他们让我读苏联文学，给我讲《大众哲学》的意义。更有幸的是介绍我参加了当时生活书店“读书之友”。在这里我认识了无数有名的进步老师，如邹韬奋、曹靖华、戈宝权等先生。后来，日本飞机轰炸重庆频繁，老师们迁川南白沙，我暑假还专门去看望他们。后来，王大化，骆文老大哥都去了延安。

更值得提到的是我这班，在 1938 年夏，成立了当时大专院校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它是受南方局川东特委、上清寺区委（校址就在上清寺）直接领导，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安排工作。当时书记就是

我同班同学方琯德。那时我这个班就有六位共产党员，其中一位葛文骅大姐姐是我南京小老乡，对我关怀备至。她介绍我参加了党办的“读书会”，教我阅读马列书籍，引导或抵制反动派的要挟。因为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流亡学生很穷，全靠申请国家教育资助的资金生活。可学校个别反动主任，非让你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才发放贷金。在党的领导下，全体进步学生都进行抵制，最后，我们这些学生终于胜利了。我一生清白历史，在旧社会从未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这是党对我教育影响的结果。1938年10月10

日，重庆在南方局领导下，剧人们组织了25个街头宣传队，我编在第5队，由我自编自演的《流亡曲》（后阎哲吾老师改为《新十八扯》）在重庆中央公园首演，我自拉自唱，观众达6千多人（该街头剧照片如今仍留在中央戏剧学院内）。那天，我同时还参加了《抗日小调》、《重整战袍》、《募寒衣》等戏的演出。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全国各地知名剧人全集中在重庆，可谓精华荟萃。由我老师曹禺等写出了大型话剧《全民总动员》（又名《黑字28》），于10月28日至31日，在国泰大戏院上演。参加的名演员有白杨、赵丹、张瑞芳、舒绣文、顾而已等。我的校长余上沅都在里边跑龙套，我既当演员又管理效果。当时真是人山人海，连铁门都挤弯了。荣誉券高达每张20元（那时公务员月薪伙食才4元），全部收入都捐献给抗日战士制寒衣。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这一代热血青年，都是在南方局周副主席直接领导下进行演出的。如《屈原》、《南冠草》、《天国春秋》、《法西斯细菌》，我校的《从军乐》、《蜕变》、《凤凰城》、《古城烽火》、《岳飞》等戏，全是在这个阶段演出的。尤其《岳飞》一戏，当时全国驻华大使都来看了，当最后天幕上现出“还我河山”岳飞手书那四个大字时，全场起立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把剧情推上了高潮。历史证明：抗日战争期间重庆的抗战文艺，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而且都是由周恩来同志亲自抓。党当时的政策是：“要在文艺界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站到党的路线方针上来，进行抗日工作，进行对反动派的斗争，和一切青年交朋友”。因为有党的正确路线指引，所以我们不会走错路，眼睛就能识别好坏。比如，1938年11月，蒋介石、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会在“社交会堂”召开，叫我们学校出“堂会”。在中共支部领导下，我们就抵制了，举行了临场的罢演，把宋美龄气坏了，因为美国顾问瑞纳也在场。我们罢演，丢了她的面子。常言说：“老虎屁股摸不得”，何况是蒋介石、宋美龄天字第一号人物！可是我们“初生牛犊不畏虎”，就是敢摸蒋介石、宋美龄的屁股。

1939年重庆遭日机轰炸，母校迁到川南江安县，我们的老师同进步学生，全受江安地下党委的保护。当时生活书店寄了大量书籍给我，我就收到过邮局地下党同志“请你警惕、注意！”的纸条。后来皖南事变，白色恐怖席卷江安城，我收藏的书籍，又被我校地下党彭厚范大姐帮我藏在城墙根下。我毕业后经中华交响乐团李元庆引见，在曾家岩两次见到周恩来先生。那时李元庆同他的爱人李肖、我和妻子丁惟敏都欲去延安。后因妻子有孕，终未去成，成了终生一大遗憾。但我们在这次1985年的“重庆雾季艺术节”中，老同学又会面了。那时全住在杨家坪“雾都宾馆”，我们还向过去周恩来先生的秘书张颖要了小车子。我到宾馆时，正遇到文化局孙局长去车站接回朱平康同志（我的同班同学），他一眼就认出了我。聚餐那天，我与老同学骆文、张瑞芳、朱平康、张逸生、金淑芝、凤子坐一桌。张瑞芳记忆真好，我们在一起唱那时《凤凰城》一剧中的主题歌（该歌就是当时朱平康唱的）。朱平康向我解释：1942年他坐车去延安前见到我，因当时纪律不准对熟人打招呼，所以请我谅解。凤子也谈到她去香港时，也是周恩来先生安排的。大家都感到那时我们重庆戏剧界一代青年，全是在党的指引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后来大家还会影，签名留念。

抗战胜利后，我随母校剧团回到上海。不到三年，1949年3月上海解放，听党的话我又参加了二野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进军西南来到重庆，协助党创建文工团、话剧团、歌舞团。我们这一代青年，就是永远跟着党走，在党的抚育下这样走过来的。

我爸的这篇旧文记述了他的成长经历，他们这批进步青年基本上是在共产党领导和教育下成长起

来的，他们的主流价值观是：爱国、为民、忠党，即便是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也没有抛弃既有的价值观。我在不少其他南下干部身上都看到这一点，也许，这就是他们这一代人身上的“南下精神”吧！

艺术家

一同南下的战友，都知道我爸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琴棋书画、吹拉弹唱、编剧导演、服装舞美、摄影洗印、种花养鱼，他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人称“全才”。

父亲1937年考入国立剧专第五届，研习的是导演和舞美。后留在剧专剧团里走南闯北近十年，参加演出、导演和舞美的机会应该不少，实践锻炼了他。1949年他参军南下的时候28岁，我在《文艺大队队史》文章里看到一段文字：“我们创作由田广才执笔、宋清涛导演的话剧《同志，别掉队》，由奚骅、陈欣演出，当时影响颇大，坚定了同志们南下的决心。”这段事情在很多老同志过后的回忆录里都提到，可见印象很深。后来到了重庆，在市文工团他又导演了歌舞剧《小白兔》，在歌舞剧团导演了《小二黑结婚》，还有不少歌舞节目。

我至今还记得他在红旗剧场导演歌舞剧《小白兔》的情景，那时我五六岁刚能记事儿。他除了作导演，还为《小白兔》的角色画服装设计稿，我爸见我观看他画水彩图稿饶有兴趣，也就教我画小白兔、小黑兔和红毛狐狸的形象。在画老猎人时，他说，最难画的是人，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熟悉人，你稍画得不准确人们就能感觉到。我问什么最好画，他哈哈一笑说是魔鬼，因为谁也没见过，你胡编乱画没人说你。后来他作导演都同时搞服装设计，他也让我帮着画人涂色，顺便讲点绘画造型和色彩的常识，那是有意给我以美术的启蒙。后来我进入文艺界也搞舞美和服装，都得益于那时培养的兴趣

我爸具有很好的想象力和表现力，本来可以为社会留下更多的好作品。没想到我爸在《小二黑结婚》获奖的当年就被戴上“右派”帽子，被剥夺了导演的权力，一抹就是二十二年，从38岁人生的鼎盛期到60岁退休的这一段人生黄金创作段，全给抹掉了。

不过，在他退休时，也给他评了一个“国家一级导演”的职称。这是安抚，虽然他不愧这个职称，但从他一生导演的作品数量来看，实在有限、有愧。

退了休，就不能作导演、搞服装、做舞美了。作为艺术家，还能干什么呢？那就写剧本搞创作吧，编剧是单干的，只要能写能编就可以一直干下去。编剧创作，其实也是他很早就具有的一种能力。

见识到我爸的写作能力也是在我小时候。1957年我九岁，看到爸爸发表了一本以单行本在新华书店出售的电影文学剧本——《仙珠》，讲述的是四川一个传统神话故事《望娘滩》：儿子在河里捞到一颗大珍珠，后发现这是一颗可以呼风唤雨的仙珠。地主知道了凶暴地前来抢夺。为了不让宝物落入地主之手，儿子将仙珠吞入腹中而化变为龙。后来在入水离家的时候，眷念母亲而一步一回头，于是在河边留下了高高的浪滩沙堆，这就是“望娘滩”的来历。爸爸拿着这本新书给我讲这个故事，让我觉得很新奇。肯定也是爸爸有意培养，这一年，他把我拉在身边，让我也参与故事的构思，又写作整理发表了另一部儿童文学集《红毛狐狸的故事》，二十多篇，其中有三篇是让我天花乱坠胡编的，我妈和奶奶也编了不少。编撰写作这事儿，有时开初只是一个想法，最后七嘴八舌添油加醋就凑成了一篇故事，很好玩。后来爸爸说，编故事首先是“异想天开”，然后为所有的情节找到“合理性”，让故事“顺理成章”，这就叫“文艺创作”。这件事让我“茅塞顿开”，悟到了创作的真谛。

《宋清涛剧作选》收录了我爸两个大型话剧，一个歌舞剧，一个大型京剧，一个诗剧，8部电影文学剧本，厚厚的586页，可以说是不小的艺术结晶。而且还有没发表演出的剧作至少十多个，没有收入集子里。

翻看他的创作年表，感觉被“解放”了，他创作精力旺盛，成就斐然——

1980年：被摘帽平反的当年就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芳香的白玫瑰》，与苑鲁、何蜀合作，由长春电影制片厂筹拍，王家乙导演。

1981年：将美国电影《魂断蓝桥》改编为八场歌剧，由重庆市歌舞团排演。

1982年：创作电影剧本《神奇的绿宝石》，与梁上泉合作，由施光南作曲，峨嵋电影制片厂拍摄。

1983年：创作电影剧本《格达活佛》，与梁上泉合作。

1985年：电视文学剧本《没有消失的幽灵》，与我继母高雨蓉合作。

这一年，我受邀为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创作导演广播剧《小侦探智破皮球案》，在县里请了假回重庆呆了一个月，恰逢“重庆雾季艺术节”戏剧观摩，我参加了，也看到了我爸创作剧本的情况。当时由于重庆市歌舞剧团又划分为歌剧团和歌舞团两个文艺团体，我爸随歌舞团的搬迁从市中区搬到了江北区。因为原来市中区的一间小房子没退还留给我弟弟住，所以我爸在江北只能分到一间27平米的一室一厅。卧室8平米，客厅摆了沙发和橱柜就塞满了，加一张书桌都不可能。我爸写剧本搞创作，就只能在室外3平米的小阳台上，在凳子上搭一块写字板来操作。那几年，我妹妹在云南工作和读书，将她3岁的儿子带回重庆交外公外婆照顾，拿出一笔生活费补助爸妈的经济。就是在这样三个人挤在一起的狭小空间里，我爸创作出几部较有影响的电影和歌剧。那一年，市文化局的干部王行本到家中采访，才发现剧作家的创作环境居然如此糟糕，非常感慨，于是写出了《阳台上的剧作家》一文发表，在重庆文化艺术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后来我爸及我妈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他们分别担任江北区文艺支部和教育支部的支委，平常更多了一些民主党的闲事。那两年，我爸为了创作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邓演达的艺术形象，不辞辛苦跑了很多地方搜集素材，也花了不少精力创作出电影文学剧本《邓演达》，但不清楚为何这部作品没有发表。

1986年：四场舞剧《母之情》。

1989年：创作改编六场歌舞剧《卖火柴的小女孩》，由重庆熊猫儿童艺术剧团演出。

1990年：写出六场童话歌舞剧《七彩梦》，熊猫儿童剧团排演。

那两年，我欲调动工作在重庆跑联系单位，我爸正在为其创办的重庆熊猫儿童艺术剧团写剧本、导戏，他也就拉我为他的儿童剧设计和绘制舞美。我爸一向热衷于儿童文学，童心不泯，这可以从他一生导演和创作的剧目中明显感觉出来。这个儿童艺术团是他们几个退休老同志自办的，没经费来源，就大家凑，所以我搞舞美和服装设计也是自己动手，花钱很少。我爸说重要的是扩大影响，打好基础，日后再把重庆的儿童戏剧弄成一番事业。我在那个小小的家里曾经看到那些老艺术家们的艺术讨论和争执，感觉到我爸高言大语地脾气很急躁。后来他们干了几年没有继续弄下去，原因应该很多，但我想，我爸天生耿直、急躁、不善妥协也应该是原因之一，这或许也是艺术家的共性。

1991年：儿童电影文学剧本《带血的鸽子》，与高雨蓉合作。

1991年：独幕剧《洁白的白玉兰》，与高雨蓉合写。

1992年：独幕剧《风雨中的邮递员》。

1993年，通过我爸农工民主党的组织的影响（公函），以“照顾父母”的缘故，我从县里调回了重庆。这一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我爸创作了诗剧《蝶恋花》，抒写的是毛泽东的爱情故事，他写作时很动情、很投入，作品发表于农工民主党的《前进导报》。当时见到我爸在翻阅一本地摊买的小书《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参考素材时掩卷感叹：“毛泽东，真男人！”我因为没和我爸讨论过，不知所云。但记起小书上一句话“好女色的未必不是大男人；但一味好女色的一定是小男人”。也许，他是由此感叹。

其后他一直忙于大型无场次话剧《一个美国将军在重庆》的创作和排演，这个戏讲的是中国人民抗日的伟大朋友——约瑟夫·史迪威在中国和重庆的故事。在这个戏的创作中，倾注了我爸的激情和智慧。史迪威刚直不阿的军人秉性，战争和外交的双重中国使命，使他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国共两党的关系中情感纠结、命运跌宕、惊险壮烈、好戏连篇，我爸较好地塑造了“这一个”立体丰富的人物性格。同时，“无场次、多时空”的跳跃情景设置，也为导演的二度创作提供了极

大的想象空间。这个话剧于1993年由重庆市话剧团排演，导演赵镔（他既是剧专五届、我生母的同班同学，又是我爸南下战友）运用了声、光、电影、多媒体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段，将那段戏剧性历史演绎得惊心动魄，又妙曼无限。这个戏公演多场，得到了观众和专家的一致好评，中国剧协也给予极高的评价，成为我爸剧作的代表作。

1994年：影视剧本《河水流、泪水流》，与高雨蓉合作。

1996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他熬更守夜地创作了两部作品。一部是写上海日韩慰安妇悲惨命运的电视文学剧本《代号一〇一》，另一部是揭露日本南京大屠杀的现代革命京剧《喋血金陵》。特别是后一部作品，我爸在创作时常常泪流满面、抽泣哽咽、不能自己，那是因为触及到震撼中国和我们家那段南京大屠杀的惨烈经历。

也就是在这一年，有天半夜我爸上厕所，忽然咳嗽咳出一口血痰。第二天上医院检查，医生就让我爸住院了。接着我妈瞒着我爸召集我们子女开了家庭会，她一说就哭了起来，告知我爸已是肺癌晚期，让我们大惊。我知道过去我爸抽烟厉害，日均两包，心肺有损。1983年与梁上泉同赴西藏创作电影剧本《格达活佛》时，就喘得厉害，他也知道这不仅是高原缺氧反应，也是多年抽烟的恶果，于是这一年回来就戒烟了，再也不抽。但没料想，肺心病转肺癌了。而让我难过纠结的还有：我爸刚刚分配了新房子，住上了三室一厅，终于有了他自己的独立书房，本还可以再创作发挥余热几年……

那时我爸刚刚花费数千元安装了一部家庭电话，号码为XXXX814。我弟弟有点迷信，闻知父亲病情后感悟到电话号码尾数不吉利，马上去电信局更改号码。我是唯物主义者，认为说“814”不吉利只是臆想，但也理解弟弟的心情。

我爸住进了重庆三院高干病房，为了瞒着他，我们也只是隔三差五地去看看，唯恐去勤了引起他的疑心，给他增大精神负担。肺癌杀人过程并非急速的，每天的常规治疗也并没有让我爸惊惶失措。年底，仅与我爸在1958年和“文革”中见过面的大女儿（我的大姐），也与丈夫专程从北京来重庆看望爸爸，爸爸也回家专门与大家合影。往后一拨一拨老同志去医院看望他或许已经让他深知就里，但他自己依然镇定不显于色。他陆续抽空回家画了一批国画，满满地贴了一墙，那是有意留给妈妈的爱信物。其中一幅题字“老牛自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道出他要与生命争时间的意念。他开始整理几十年来的创作手稿，有意要出版他自己的专集。他还刻意地清理他青年时代拍摄洗印的剧照和人物照片，并分别挑拣装入信封，让我帮着赠送给剧照主人，这让那些人倍觉惊喜和感激。而那几册业务影像集，他则送给了歌舞团资料室。其后，他在病床上垫一块木板继续他的剧本创作，还搬了一批书籍边阅读边记创作素材，等同于将他的书房搬到了病房，每天下午可以写作数小时。

就这样，1997年他与我妈合作，创作了反映“希望工程”的电视剧《杜鹃啼血映山红》，由重庆电视台筹摄。

1998年，他重新修改自传体电视小说《路在荆棘中》，整理编撰自己的作品集，并和母亲筹备款项，在剧协陈飞叔叔的鼎力襄助下，出版了《宋清涛剧作选》。

1998年7月25日，这天，我遵嘱在爸爸的病榻前，按照他的授意，一本一本地《宋清涛剧作选》扉页上题写“赠与某某、某某指正”等，而落款则是他自己亲笔签名，我在签名处钤盖了他的名章。然后，爸爸让我一本一本地按照通讯录寄给了他的恩师、同学和朋友。显然，他在准备和安排“身后”的事务。

7月31日晚，我看望父亲离开他的时候大概是晚上8点多，此时我爸身体已经很差，需要注射吗啡来缓释疼痛了。那会儿我在单位负责重庆电视台《人口方圆》栏目的编导工作，第二天要去江津市拍摄一个重要的专题片，我是来与爸爸作别的。他点点头努努嘴，意思是“知道了你走吧”。出门的时候我们静静地对视了好一阵儿，我至今仍能感受到他慈爱关注的目光。

8月3日我们终于在江津蔡家镇拍完了镜头，准备第二天先去四面山风景区看看，然后傍晚返渝。当晚与蔡家镇的领导们小酌一番告别后，就在供销社旅馆简易的竹床上倒头便睡。将近天亮时，我朦

胧中听见脚步匆匆，一个女人轻声问“宋主任睡哪间房？”我应声撩起木格窗户问什么事，那女人说，江津市计生委刚有电话打到值班室，说你父亲去世了，要你往回赶，一会儿有车接你。我问，昨晚去世了吗？那女人说，今天凌晨。今天？！我猛然记起今天是8月4日！霎时间，那“814”和“84”的数字箴言惊得我目瞪口呆。你不迷信吧，可我爸去世时偏偏应了“84”这神奇的数字，我无言以对。

一位“生命不息、创作不止”的艺术家走了，他同时是西南服务团南下的一位老干部，还曾经是一位“划为右派、无帽可查”的右派分子，他就是宋清涛，我的父亲。

忆清涛爸二三事

宋 濒

我们姊妹六个，我行五，是爸爸宋清涛三个女儿中的小女儿，生于1955年。我爸1959年划为“右派”那会儿我只有四五岁，少不更事。但是，那几年正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缺吃少穿、生活艰难的情景还颇有感受。那时候虽然孩子多，生活苦，但好带，哪像现在这样百般呵护重金伺候？添一个孩子你添一双筷子就成了，孩子是自己在摸爬滚打中盘大的。在儿时的记忆中，我们没有多少欢乐和温馨值得玩味，有的只是一些酸涩的片断。

比如，我比较“嘴馋”，我哥回忆说我3岁的时候（那会儿还住在枇杷山公园），有次在厨房“偷嘴”被撞见，只见我张嘴呼气、满脸通红却一声不吭，细看时才发现红油辣子罐的陶瓷盖子还攥在我手里：原来我趁大人不在，偷偷舀了一勺“油辣子”塞进了嘴里……以为是琼浆，结果是上了大当不敢吭声只好吃“哑巴亏”。但是，在我记忆中没有“得逞”的印象，因为我开始记事的时候我爸就被打成右派被降薪，经济吃紧，家中孩子多，难得给子女们买零食和水果，一年中能吃一两次西瓜、粗梨什么的就已经很不错了。偶尔爸爸买了一点点心，那也是犒劳辛苦的我妈而藏在他们床头柜中独自享用，难得有与我们“分而食之”的时候。数量少，易清点，大人有数，小孩可不敢去“偷嘴”。哪像我们现在为人父母后把好多心思都放在儿女身上，唯恐儿女缺吃少穿缺少爱。

1960年我们被赶出歌舞剧团的家属院，搬到排练场后门临街处。这里没有公厕和自来水，生活极不方便，奶奶和我们几姊妹轮换挑水、倒马桶和涮罐子。先是哥哥姐姐们干，后来待我姐去了云南我大哥去了大巴山，这活儿就交给了我们更小的。我9岁时就开始了倒马桶、挑水（水桶有我一半高，一挑水五六斤，路途还不近），同时还搓洗一家人的衣物，现在城里的孩子谁做得到？但那时我爸也在歌舞剧团干着扫厕所、拉板车、修水管的杂活儿，穿得脏兮兮的一副下水道工人的打扮，不辞劳苦，随叫随到。后来我们几个子女上山下乡当知青都是不怕苦不怕累不嫌脏不嫌臭的，因为当初在城市自己家里早已如此。

“文革”中的1968年，我上了中学。当时的“红领巾”少先队组织已经被“红小兵、红卫兵”组织替代。但是我们“黑五类子女”没资格加入红卫兵，那种被歧视的滋味是非常咬噬一个少年心灵的，这种低人一等的感觉折磨我们许多年。而且，政治运动还要求家属子女“揭批”自己“罪恶的爸爸妈妈”。经常上朝读课时，我被红卫兵点名上讲台搞“揭批右派父亲”，我经常是拿着批判稿读着、哭着，若是批判不深刻，放学后不准回家吃饭。还好，我们数学老师经常帮我脱困解围（那时我是班上数学尖子，以至我在上大学时高等数学是全系第一名），少了不少屈辱。

“文革”中批斗“走资派”时，我爸作为“五类分子”是陪斗的“牛鬼蛇神”。有一次批斗，我悄悄跟着去看，只见我爸他们一行人个个跪在地上好不可怜。我看着难过悄悄流泪了。爸爸远远地瞧见我，强装着笑脸轻轻向我招手，那意思是“我没事你回去吧！”也许，爸爸是最不愿意在他受磨难时让家人看见为他担忧的，这也是一切爱儿女的家长的责任心。

还有一次去红旗剧场开批斗会，我爸陪斗，我也跟去了。我在剧场门外看见押送“牛鬼蛇神”上台后，红卫兵用皮带抽打他们并喝问是什么成分，成分不好的被打得更利害，郑波文叔叔被打得当时大便都失禁了。我爸因为是“带队的”加之回答是工人成分，就没有被抽打，那红卫兵骂道：“你是

工人阶级的败类，丢他妈工人阶级的脸！”我当时看到我爸他们挨打挨骂心里难受，不停地流泪还不敢哭出声来。

我奶奶和我爸从年轻时就开始抽烟，早些年抽“三六”“飞马”“大前门”品牌烟。命运改变后家里经济不宽裕，加之“文革”中物资匮乏，只能买一点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烟”，这种烟是利用烟草的下脚料打碎用白纸裹起来（不印刷品牌）就卖的，很劣质的，但就是这样也常常消费不起。于是我爸就自制了一个简易的“卷烟机”，其实就是用一条松松的布，在凹处放上烟叶末，然后用两根筷子在布下轻轻一滚卷成香烟状，用浆糊连上纸边，就“制造”了一根香烟。烟草来源有两个，一是我妈找农民买“叶子烟”（大匹烟叶）然后切碎来卷制；另外就是我和弟弟经常到茶馆或街上捡拾人家丢弃的烟头，拿回家撕开纸头取出烟末，重新铺在“卷烟机”上卷制。当年我们一家人在卷烟时还挺有乐趣的，觉得自己可以造烟很有成就感的，但现在回忆起来只有满腹酸楚，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爸爸是个毅力坚定的人，记得八十年代初年我爸去四川九寨沟、西藏高原收集素材归来，咳喘得厉害。医生告诫说，如果不戒烟就要舍命了。后来听我妈妈说，他思量了很久，觉得还是要留住性命干点事儿，这陪伴一辈子的抽烟嗜好该告别了。就在他60岁的那天晚上，他一只一只地接着抽烟，时钟指到24点那一瞬间，爸爸将心爱的烟斗一掰两段，从此再也不染指香烟，戒了个彻底。我想，那戒烟的过程一定不轻松，但他有毅力，想到做到。

我爸最亡命刻苦的那一段时光，应该就是他戒烟后的这十几年。他创作了一大批作品，有的还拍成电影。我那时在云南边境上工作，为了进大学拿文凭，1983年我将3岁的儿子带回重庆，交我爸我妈抚养。我呢，每三个月补助父母1千元钱。当时这1千元是什么概念呀，了不得的！这些钱是我在每天下班后自己种菜、养鸡、卖蛋辛苦半年才攒起来的。我还从云南托运回一批木材，为我爸制作了衣柜和书橱。但这钱只给了两次，孩子带了三个月后就被送回云南我自己抚养了，原因是我爸一头扎进创作工作中，基本没有精力来照顾外孙了。我有次回重庆家里一看，儿子长着“对口疮”高烧不退，打针输液七天七夜，才把小命捡回。这以后，我知道我爸视创作比儿孙重要，于是我只好将儿子带回云南。我们兄妹觉得我爸有时儿女心太轻，不重亲情，太自私。当然，从另外角度看，他是事业重于亲情。

我一生中最爱最敬佩的人是我爸爸。他在那么艰难困苦及饱受屈辱的近三十年中，没有颓废沉沦，没有厌世轻生，没有怨声载道，对人生充满希望，对生活无比热爱，对重现艺术人生满怀期望。

爸爸言传身教常嘱咐我们兄妹：“爸爸的状况（右派）给你们带来了许多伤害屈辱，但是你们心里不要仇恨社会而自弃自暴，一定要爱祖国，相信共产党。一定要好好地读书学习，知识是任何朝代都需要而不可取代的”。我一生都铭记爸爸的谆谆教导而照着去做并受益匪浅。

因为是“黑五类狗崽子”，我15岁就当知青到农村劳动。但我的血管里流淌着爸爸的那股不认命、不服输、不屈服、永远自信向上的热血。在大部分知青都忙着贪玩、怎么好偷懒、怎么与贫下中农作对时，我却老实认真地与农民们一起下田栽秧、上坎犁地，暑天除草收割挑送公粮，寒天挖土积肥播种麦苗。第二年公社在两百多名知青中挑选发展第一批共青团员有3名，我是其中一名。17岁我就交了入党申请书，大队党支部曾讨论过两次，都因为爸爸是“右派”出身不好不能通过。也因为这原因，我3次被公社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中的典范推荐上大学都被淘汰，其中一次哈尔滨工程学院的录取通知都到了区里，却被公社武装部长的女儿硬给顶掉了。当时，我怨、气、哭、悲愤呼喊：苍天啊，还让我活吗？我的路在哪儿呀？！

因为“右派”，我姐姐不能考大学而去支边，1966年遇东川大地震在云南亡故。大哥品学兼优绝顶人才，但却不能上高中，1964年去了农村。1971年，二哥16岁我15岁，本该在上高中的年纪范围，却被迫去了农村。后来祖母病亡、弟弟的早逝都与“右派”相关相连。是啊，就因为当年重庆市文化局长的个人自尊及怨恨，将我爸爸补划为右派（无组织认定），从而残害了我们做儿女的一代，真的是“家破人亡”呀。

可我们兄妹真的遵照爸爸的教导“热爱祖国，相信党，努力学习，自信向上”，我们不沉沦不自卑，好学发奋，自立坚强。我们实现了各自的人生价值，为家族也争了气添了光。大姐毕业于北师大；大哥自学成才，成为国家一级编导，是全才获奖许多（我引以为自豪的榜样）；二哥毕业于四川财经

学院；我毕业于云南财贸学院。我们都曾是单位骨干或领导者。

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爸爸是“反党”的“右派”，而我们幸存的4兄妹却都成了清一色的共产党员。不可否认我们入党动机之一，就是要颠覆“右派家属”给人固有的反面印象。

爸爸一生的经历，无数的成就，我大哥在缅怀父亲文章中已叙述。我爸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却仍然放着光彩，体现了一个革命者、老同志热爱祖国、毫不利己、两袖清风、高风亮节的崇高品质。那时他作为“离休南下老干部”、“国家一级导演”、“享受副局级待遇”的病危病人，他的医疗费是全部报销的。但我爸从不要求医院给他开具昂贵的药品。我爸离世的那天，我抱着遗体痛哭不止，其情景也感染了在场的医务人员。一位医生说：“有的老干部专门要我们开好药开贵药。我要给宋老开点好药及补充体能的氨基酸，宋老却说：“我就那样了，反正是要走的，别浪费药浪费国家的钱了”。后来结算医疗费时，账单上清晰地表明，我爸离世那天的医疗费是——3角钱的止咳药（他患的是肺癌）！

我爸的战友、同事、学生纷纷前来吊唁，深情称颂，由衷赞美。市文化局、市歌舞团在追悼会上拉的挽联是——两袖清风和谦共仰；一身才艺美德常昭。话剧团导演赵锵抱着拍着冰棺，泣不成声：“清涛啊，你怎么这就走了啊……”战友深情可见一斑。由于我爸在离世前半个月将他的《宋清涛剧作选》发寄给了他的师长和同学，后来在向这些友人发寄噩耗时，他们的唁电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话——“惊悉清涛兄逝世，却不敢相信，因为刚刚收到他亲签的作品集……”这也表明，我爸临走前已经安排好了后事，没让我们儿女过后为他操心，他用严谨的工作作风对自己和家庭担负了全部责任。

这就是我爸！我最爱最敬佩的人。今天回忆起来，爸爸的形象是清晰、慈爱、甚而高大的……
我亲爱的爸爸，女儿永远怀念您！

“三忠于四无限”运动忆趣

47

陶渭熊

在一片呜嗟呐喊的“唱红”声之中，我似乎又回到了“三忠于四无限”的年代。

对于这个四十多年前的造神运动，回忆起来，几多厌倦几多无聊，但也不乏趣事——你别说，还真有些好玩。

疯狂年代里的宗教仪式

“三忠于四无限”贯穿于整个文化大革命。但其鼎盛时期，则是1968年冬天到次年初夏，也就是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至九大闭幕这大约半年左右的时间。

这个对年青人说来陌生，老年人则已经记忆模糊的词语，其内涵是：

“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四无限”：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

具体作法是：

1、表忠心、唱忠字歌、跳忠字舞。表忠心是在每扇门上、每道玻璃窗上、每张大救星像前贴一颗红心，红心正中央写一个十分醒目的橙黄色“忠”字，家家户户一片红，到处成为“红海洋”。唱忠字歌是唱包括《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内的一切颂圣歌和“语录歌”，现在叫“红歌”。跳忠字舞是一边唱忠字歌，一边摆动四肢扭腰蹶臀，手之舞之脚之蹈之；哪怕你从没跳过舞，脚杆没得弹性、腰杆没得柔性、手杆没得灵性，也必须跳：“忠不忠，看行动”。

2、举行早请示、晚汇报和饭前请示仪式。过程如下：

由主持人（革委会成员、造反派头头、“活学活用”积极分子等）集合整队，肃立于大救星像前。

主持人：向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众人90度弯腰）；祝毛主席他老人家——

众：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主持人：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

众：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主持人：让我们用嘹亮的歌声高唱《东方红》（起音）。

众人高唱。

主持人：让我们学习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伟大教导，大家朗诵“老三段”——

众：“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主持人：大家再朗诵“新三段”——

众：“革命委员会好”；“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斗私批修”。

主持人：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请示）仪式结束。

众：毛主席万岁！（如果是饭前请示，还要高呼“吃水不忘开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以上仪式还出现在任何会议开始之前。整个仪式需要 20——25 分钟。

3、天天读。每天早请示之后就开始雷打不动的天天读（一小时），读“毛选”或《毛主席语录》。知道了上面的宗教礼仪，就好理解下面讲的这些故事。

周队长的报复

话说 1968 年冬天，正是“三忠于四无限”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其时我正在大巴山下一所农村中学教书，知道一些当地农村开展这项运动的真实情况。

有一个公社召开干部会议部署“三忠于四无限”运动，主要内容一是表忠心，把“忠”字贴到每家每户，造成全公社一片红；二是学习和演练请示仪式，要把这一仪式贯彻到社员每天出工前、收工后和三顿饭前。参加会议的社队干部们都明白，把“忠”字贴到各家门上，这个没问题，但是要把饭前请示推广到分散在七沟八梁的每个家庭，只怕是半天云里讲恋爱——空谈。他们都不在意，所以吃午饭的时候竟忘了饭前仪式，还是和往常一样一窝蜂涌进食堂。其中红旗大队的周队长腿长脚快，第一个冲入食堂……没想到被公社书记厉声喝斥：

“站住！像个饿死鬼一样只晓得抢饭！刚才布置的任务你就忘了？不请示就拿碗舀饭，你心中还有没有毛主席？你对毛主席忠不忠？……”

在众目睽睽之下，那周队长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脸上火辣辣的，好像被人打了一耳光。其他人则一阵哄笑。周队长的面子算是丢尽了。但他心中很不服气，悄悄地骂：“少装正经，肯信你书记做得到！”

不久，公社书记带领检查团到红旗大队检查工作。周队长带着他们挨家挨户查看全队一片红，又看了几户社员午饭前的请示仪式。这些都是周队长安排好了的，检查团很满意。公社书记还发了许多议论，作了许多指示——当然都是正确的空话。等到检查团员们肚子开始“闹革命”的时候，周队长才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家里。此时队长娘子早准备了酒肉饭菜招呼检查团入席坐定。而周队长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悄悄躲到了一边。公社书记们早已饥肠辘辘，闻到酒香肉香，一个个口水长流，毫不客气地举杯饮酒，提筷吃肉……

此时周队长走出来，叫了一声：“起立！向毛主席敬礼！……”事情来得如此突然，公社书记们全然没有准备；他们只知道是要求别人“三忠于四无限”，自己从来也没有饭前请示过。所以他们听到口令声，先是一愣，当他们反应过来迅速转身面向大救星画像时，周队长的口令已经到了“祝毛主席——”于是公社书记们一边吞酒咽肉，一边呼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有的被酒呛了打喷嚏，有的被肉噎了一阵咳嗽，喊出来的声音竟是“唔唔唔唔，唔唔唔唔”，喷嚏声、咳嗽声与万岁声搅和在一起竟分辨不清；公社书记尤其狼狈，因为别人请他坐上席，他也习惯了毫不客气、理所当然地坐

上席，这就必须起立后掀开板凳，再转身一百八十度才能面对大救星的画像，慌忙中他咽吞嘴里的酒肉时被呛得厉害，直到唱《东方红》、背诵“老三段”、“新三段”时都咳嗽不止，一时洋相百出。

善于教训别人，革别人命的公社书记，这一回被狠狠地作弄了一下，吃了一个哑巴亏。周队长算是报了一箭之仇。此事当时传为笑谈。

列车里的早请示

1969年寒假，我回家探亲，在火车上坐了一夜。早上6点钟的时候，沉寂了一夜之后的列车广播站开始播音。在播放了开始曲之后，竟是叫全体旅客起立进行早请示。经过一夜的颠簸奔波，大家都十分疲劳，尽管列车广播再三催促，却无人响应，都沉睡不醒的样子。不得已，列车员到车厢里一排一排地叫醒大家，无奈旅客们都不理会，一个个都像睡死了一样，有的伏在靠窗的茶几上，有的仰在靠背上，竟酣声大作……没有人把这个突出政治效忠大救星的伟大仪式放在心上。我眯着眼睛瞟了一下，全车厢一百多人，只有十来个人站了起来，而且多是军人。呼万寿无疆，唱《东方红》的时候，除了广播喇叭里的叫喊声，车厢里一片沉默，与报纸上轰轰烈烈的宣传相比，那是何等的凄凉！正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与我同在一个车厢格子里，坐在斜对面的一位工人模样的旅客，先前还在抽烟，列车员叫醒大家的时候，他却伏在靠窗的茶几上抱头而睡。当广播上叫喊：“全体起立，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礼”的时候，他大概以为所有人都站起来了，于是呼的一声站起来……当他看见左邻右舍都悄然无声地打瞌睡时，他可能有些失悔，又不好意思马上坐下，于是来了一个急病突然发作的样子：两眼发白向上翻，身体软弱无力地摇动了几下，脑袋晃了一圈，突然晕厥似地一屁股坐下，旋即又扒在茶几上，就一动不动了……我仰在靠背上仍眯着眼睛，看见他那十分滑稽的样子，不尽失声笑了。谁知同坐一排的好几位旅客也吃吃地笑了——由此我才知道，他们都没有睡觉，也不站起来向大救星表忠心，还和我一样在悄悄地关注周围。可见早请示之类的表忠心活动，在他们心中到底占了什么地位。

在单位里，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请示人人都参加，那是因为每个人都在书记、头头、政工干部的严密监管之下，没有人敢于不参加。但是在车厢里，在旅途上，人人互不相识，谁也管不了谁，头上的“紧箍咒”暂时地解除了，获得了一时的自由和自主，于是绝大多数人都按自己的真实意愿：拒绝参加。可见“三忠于四无限”之类的效忠仪式，不过是一种暴力对于老百姓的胁迫。

“毛主席万岁——三两！”

最烦人的就是饭前请示。在那个物质匮乏，人人饥饿的年代，许多人都以吃饭为第一快事。听到吃饭铃声一响，百米赛跑似地奔向食堂。而现在却要全部到齐、集合整队、鞠躬敬礼、山呼万岁、唱颂歌、背语录……对于饥饿难忍的人来说，那是何等的折磨！更何况有的人天生的疲沓，你急他不急。本来饭前仪式就得花二十多分钟，加上等人，非半点钟不可。所以每次饭前请示，都有人怨声载道骂不绝口。后来革委会作了决定，分批进行，抢饭先锋们一批，行动迟缓的又一批；个别有事耽搁的就惨了，一个人站在大救星像前，呼口号、唱颂歌、背语录。那个时候，吃饭，成为大家最大的精神负担，谁都不愿意受此折腾。想想看，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哪派宗教吃饭前把人折腾得筋疲力尽心烦意乱？我们算哪门子教？但是谁都不敢说，谁都不敢取消。对于这个精神枷锁，大家只有默默地忍受。

后来有一天，一位老师到县里开会，回来时还没传达正事，就告诉大家：“县革委吃饭前都不举行集体请示了！每个人在主席像前鞠躬，喊一声毛主席万岁，就可以拿碗添饭。”

大家热烈欢呼！

这是何人的决定？真是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功德无量啊！如果要选先进，评模范，我一定举双手选他。

从此以后，大家就各自为政了，在食堂门口的大救星像前鞠一躬，喊声万岁，就叫炊事员打饭。但是动作十分勉强，好多人都是一边小跑一边向大救星点头一边喊万岁；万岁声还没有结束，拿饭碗的手已经伸向了炊事员，说：“（打）三两”。整个动作一气呵成，不到一秒钟！

于是，每次吃饭，都会听到不停的叫喊声：“毛主席万岁——三两！”“毛主席万岁——三两！”

用忠字歌闹房

“闹房”是一种民间习俗，就是在入洞房前对新郎新娘及公婆等有关人员进行作弄、戏谑、玩笑。这是一种在乡间十分流行的娱乐活动。俗话说闹无大小，男女老少都可以相互玩笑尽情取乐。在山区，这种娱乐有时表现十分低俗、粗鄙，甚至野蛮。例如常常叫新郎新娘表演“踩蛋”——模仿公鸡扒在母鸡背上性交。而此时，“烧火佬”——老人公（公爹）也是大伙作弄的主要对象。

在四川民间，把老人公对儿媳的性侵害叫做“烧火”，这样的人叫“烧火佬”。但一般对娶了儿媳的男人开玩笑称“烧火佬”。并非实有其事。

话说大巴山下某小学的岳老师娶儿媳，参加的人很多。在酒足饭饱之后开始“闹房”。在尽情戏弄了新郎新娘之后，大家把目标对准了老人公岳老师。有人喊：“把‘烧火佬’揪出来！”于是大家便一阵哄笑欢闹表示同意。自有好事者把知道要被作弄，早就躲到灶房里的岳老师拉了出来。岳老师说：“找我做啥子嘛？”有人说：“唱《下定决心》。”众人拍手叫好大笑不止。大家都明白，在儿媳面前老人公下定什么决心？不就是“烧火”吗？岳老师自然也知道意味看什么，再三推辞，但众人不依不饶，他不得不有气无力勉强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大家通不过，要他再来。连唱了几遍，直到他扯开破嗓子唱出雄赳赳气昂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势，又把上述歌词当做口号呼喊了三次方才罢休。

接下来要儿子唱另一首忠字歌：《造反有理》。对“烧火佬”造反，理所当然，又是一条录计，大家同样欢呼叫好。其歌词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也是反复唱了几次，唱出愤怒、反抗的精神，末了还呼口号：“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到底，就是胜利！”

最后要媳妇唱“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老人公下定决心要“烧”儿媳的“火”；儿子愤怒反抗，造反有理；媳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自己的男人注意“政策和策略”。这些内容全部出自大救星的语录，全部是大救星的教导，算得上“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把“三忠于四无限”贯彻到了日常生活。这次“闹房”的策划者可算别开生面，独具一格。但是把大救星的神圣教导，作为行动指南和理论依据，去“烧”儿媳“火”，去干这种下流无耻的勾当，是对大救星及其思想的尊重、颂扬，还是亵渎、作弄？是对于领袖及其思想的虔诚敬仰，还是嘻笑讽刺？倒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造神运动。以唯物主义为信仰的共产党本来不信神，还反对神和打倒神。现在却要造神。这就必须愚民，搞一次大规模的愚民运动。不管是“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还是“活学活用”；不管是“红海洋”，还是“破四旧”；不管是“早请示晚汇报”，还是“三忠于四无限”……都是愚民的极至。但是古人说“愚民者，民亦愚之”。大救星也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老百姓就心甘情愿地被愚弄而没有丝毫怨言？在枪杆子面前，也许没有人正面反抗，但是如本文所述，周队长对公社书记的报复，旅客对早请示的不屑，“万岁——三两”的不和谐叫喊，老人公唱着语录歌去“烧火”……不正是老百姓以其智慧对愚民运动的巧妙反抗？

“愚民者，民亦愚之”，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